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DOCTOR OF MINISTRY

教会领导者之决策

——本于神学研究与圣徒典范的实践

作者：李宜虔

2020/05

Copyright ©2020 by Yiqian Li. All Rights Reserved.

摘要

决策科学研究人之期望，面对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境遇时，人在记忆、情感和直觉的作用下的种种决策偏差和决策风险，注重博弈技术和普遍性的经验数据，服务于各样的投资欲求；但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却是从人与罪来理解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矛盾所导致的失误；注重的是圣灵藉圣经启示的真理准则，并把人生决策机制的复杂性和风险性问题转化为“我是谁”（生命所是），及“我当作什么”（生命所事）的纯粹性和根本性答案；受造个体的决策功能（理性、情感与直觉）之不和谐及团体政治决策的善与伦理的相对化，亟需诉求于创造者的神圣“三”（多样性的秩序之爱）而“一”（崇高唯独性）的本体论；以基督之于生命的救恩来看待圣灵在教会决策引导中的原则性与灵动性。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3

一、研究议题的定义及宗旨 4

二、研究方法论和论文建构 9

第二章 决策论之综述 12

一、决策中的情感和直觉 13

二、决策中的记忆与期望 17

三、统计与概率分析 22

四、决策中的理性与道德 26

五、基督教领导学及决策理论 33

六、小结 37

第三章 教会领导者之决策的神学研究 39

一、 决策中的人与境遇 40

二、决策来自圣灵与圣经 56

三、 决策本于圣三一与基督 73

第四章 圣徒的生命决策 96

一、摩西的生命决策典范 96

二、保罗的生命决策典范 107

三、历代圣徒之生命决策典范 117

四、当代中国教会领导者 124

第五章 当代中国教会的治理决策 130

一、中国教会的治理决策 130

二、以一家城市教会为例 138

第六章 教会宣教之领导决策的研究 143

一、宣教决策与社会文化境况 143

二、宣教决策的本体论与教会教义传承 150

三、宣教决策的实践焦点：从复兴运动到教会模式 155

第七章 结论 167

参考书目 171

第一章 绪论

我是一位牧师，信徒常向我提出的问题是："我遇见这事情，该如何做决定？""我面临这抉择，如何做才符合上帝的旨意？""请牧师替我祷告，寻求上帝对我这件事情的旨意如何？"不仅信徒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对种种决策，任何教会的侍奉者在事工上也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决策。当然，教会决策是参与上帝国事工的神圣决策，牧者及同工在为教会做决定时，因教会侍奉日久而趋于事务的平常化，是否会掉以轻心而缺乏神圣感呢？其实，事件决策反映的不仅是事件之得失成败的结果，决策反映的是人性的信念动态及价值观；决策问题就是人性管理和境遇管理的问题。教会领导者和任何人的决策一样，亟需深究的生命议题乃是："我到底是谁？""我当作什么？"这乃是何烈山上的摩西与往大马士革去的保罗，当遇见生命的主时，他们向上主求问之生命决策的问题（参出 3：11；徒 22：10）。

基督徒相信上帝拥有统管万有的主权，基督徒的人生路由上帝所命定，"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 8:28）。但基督徒在纷纭复杂的人生境遇中，如何理解上帝的美善旨意，并遵照其旨意做出决策呢？教会领导者是蒙召的圣徒，担负上帝国使命，因此，从圣经中去查验上帝在领导者身上的作为，建立来自于启示的人生决策典范是本文的重点。有人常把上帝塑造领袖作一种不可知的奥秘来理解，以为上帝的命定，无需研究其中奥妙，作为人就莫名顺服便是。但圣经记述上帝与人的充分互动之可言说的事件，上帝所拣选的领导者，无一例外在上帝的主权引领下，也无一例外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被上帝嘉许或审判。

约翰·麦克斯维尔（John C. Maxwell）提出，领导并非依靠职位发挥影响力，而是在建立与人正确的关系上，并作出正确的决策。[1] 领导者不是机械式的被动者，而是在上帝主权下的灵活生命体。上帝赋以领导者去彰显上帝的主权，也经验着诸般境遇的磨砺和影响，上帝的主权并不剥夺人自身的自由意志，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对于世人来说，决策就是从一组可能的方案中选出一个自己觉得最好的、合乎利益的方案来。[2] 但教会领导者的决策，是关于上帝，也关乎人性本身及世上使命。领导决策根植于个人生命本质，且必要影响群体；决策就是生命本质的外显。

《圣经》显明上帝就是决策的上帝，他的创造、拯救、审判的主权性决策，圣灵之于信徒的重生、感动、充满、教导；圣经真理中立定对独一真神崇拜、公义与道德的原则；神权对人的心智与情感之接触、感化；在人的世界境遇中设定善恶政权、风云雨露等。总之，人之所以决策是因创造主的决策；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必然要追本溯源，认识造我们的主、认识他的决策，从而认识“我是谁”——“我之所是”、“我当作什么”——“我之所事”。

一、研究议题的定义及宗旨

本论文的研究主要针对教会的领导者之决策，尝试提供本于神学研究和圣经诠释的决策范式，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当代管理学与经济行为学方面的决策理论的成果；因为在教会管理和领导学的理论研究中，有关决策方面的研究文献甚少，在中文和英文领域的各大文献网络及图书馆的电子搜索上能找到相关书籍和文章寥寥无几；但基督教会的领导决策是极为重要且实用的议题，笔者尝试尽上微薄之力呈现一己的研究成果，以此抛砖引玉。

---

[1] 约翰·麦克斯维尔（John C. Maxwell），《中层领导力》，施轶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6—7。

[2] 大卫·亨德森 (David R. Henderson) 、查尔斯·胡珀 (Charles L. Hooper)，《决策的智慧》，侯君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38。

决策

经济行为学的决策理论是众多学科中的后起之秀，上世纪才成为跨越经济管理学与心理学的热门学科；甚至有学者认为当代经济学就是一门决策科学，它从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吸取研究成果，对人的社会经济及其消费决策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3] 其内容也越来越涵盖众多的学科领域，到目前为止，该学科的研究已经涉及数学统计、社会学和伦理学，但其特征主要是经济市场的价值获取和人性的行为选择及其心理。

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学研究重点并非仅仅在于人性的决策效应及方法本身，而是在乎创造主上帝本身，以及上帝启示的人性真理和世界观。当然，经济行为学的决策研究成果是值得认真对待和学习的，诸如种种决策启发性错误研究；对人的思维、情感与直觉与决策关系的研究；记忆与前景理论研究等；经济管理学和行为心理学对人性及心理的大量实践统计研究成果有助于神学决策研究上对世上人性及其决策困境有更加整全的理解；但经济行为学的决策无法确立的真理价值观，正是教会领导决策学要研究的根本。

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决策者来说，心理的欲求不尽相同，但基本是寻求人生的幸福快乐；或许是简单权利、物质满足和荣誉、事业的成功和身体的康健。世俗的决策研究是面对社会情景中不确定的未来状况，及纷纭复杂的社会因素，充分减少自我的思维偏差，衡量自己的所能，正确投资自我的时间、金钱和劳力，最大化的获取市场利益；哪怕是凭着情绪或直觉，但最终能让自我感到幸福和快乐，就是正确的决策。罗素的幸福理论是整理分析人负面的心理或身体的感受——烦闷与兴奋、忧郁、嫉妒、犯罪意识、疲劳，从而在生活、家庭、工作、爱情中去克服负面情感，而努力去获取幸福感。[4] 因此，人的所有想法

---

[3] N. G. Mankiw，M. P. Taylor，A. Ashwin，*Business Economics*，（Cengage Learning EMEA，2013），24-32.

[4] 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在其这本通俗读本中，谈说都不涉及伟大心志和深刻人性剖析，他在对宗教和道德家颇有微词乃这是对人性过分自我关注造成压抑感和责难，他完全是从人性幸福的感受作为追逐的目标，制造种种幸福理由以心理调适的技巧足矣。伯

和决策都围绕幸福感而所为。但对于理性与情感中的幸福感受及其判断却是复杂的，“决策”可以说成一种“技能”，是“人类拥有的一种特殊的能力，能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而选择合适的途径。”[5] 该情况下，人的决策乃何其迷茫的自我处于何其迷茫的情景中：

> “人类有许多偏见和特殊习惯，从而导致我们的决策与优质决策相去甚远。……我们依赖别人的主张，不考虑替代方案，忽略不确定，过于简单化，匆忙下结论，寻找确认性证据来支持我们的立场，对非确认性证据视而不见，混淆达成一致与实现优质决策的概念，……我们毫无系统性，不耐烦地草率行动，然后带出一种后见之明的偏见。”[6]

北京大学的马浩教授以行为决策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为理论基础，审视人无法清晰的明白自身的利益和人生的前景，人在这复杂多变的世界里，面对充满偶然和不确定的境遇，人无法拥有足够信息，亦没有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我们的行为和决策必然是在相对暗昧的自我和境遇中摸索。[7] 人生决策的困难的确是来自无法明了自己的内在实质，因而无法管理自己的欲求和外在世界的关系。但不管怎么样，人类社会运用理性知识寻找最符合自我预期的满意决策技术，并形成“决策科学”。在决策科学中，决策反应的组成因素：一是有多种行动方案可供选择；二是决策者对每种行动方案所带来的结果和未来事件产生预期，预期可能会以信心程度或概率形式呈现；三是与可能的结果相联系的后果可以在一个连续体上得到评估，而这一评估所依据的是当前的目标和个人的价值观。[8] 总之，“决策”的要素包含：自我的价值观、信心与预期构想；符合价值观的

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幸福之路》，傅雷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 雷德·海斯蒂 (Reid Hastie)、罗宾·道斯 (Robyn M. Dawes)，《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谢晓非、李纾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1。

[6] 卡尔·斯佩茨勒（ Carl Spetzler）、汉娜·温特（Hannah Winter）、珍妮弗·迈耶（Jennifer Meyer），《斯坦福商业决策课：如何做好一个决策》，张源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2。

[7] 马浩，《管理决策：直面真实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4。

[8] 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24。

多种行动方案之判断及选择。“决策”就是自我的欲求、前景展望、知识判断、并延展于外在的境遇中；决策是自我和境遇的互动关系，好决策就是相对比较正确的认识自我，及相对比较正确地认识延展变化的境遇。

“决策”的更为根本的定义，是位格主体有目的的行动；因此，人之所以作为“位格”主体做出决策，是因为上帝是一位决策的上帝。《圣经：创世纪》之开篇，记载至高上帝创造天地：“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 1：3）“上帝说……然后上帝就造出”成为整个创造过程的描述（创 1：6—8、9—13、14—19、20—23、24—25、26—31）成为创世过程之重复连贯的句式；正显示创造的决策及行动。上帝“决策”不仅在创造事件中，上帝“决策”贯穿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并达至终末的新天新地。上帝“决策”就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如何行动，是在整本圣经中的启示；上帝的“决策”显明上帝自身，因此，神学的决策研究必须回归圣三一在基督里的显明、圣灵与圣经的真理启示。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 33：9）“决策”的上帝不必有任何犹豫，他不受不确定因素的困扰，在他的内在生命中无欠缺和矛盾；无偏差或误解；他全知全能而非“有限理性”，他就是爱而非受情绪化驱动；他是弥合时空隔阂且富统一性的决策，而非人之片面经验性或莫名直觉的决策。

诚然，教会领导者不是上帝，不可能有上帝之全知全能的决策，但教会领导者必要依靠全知全能的上帝来做出美善的决策；上帝的“决策”要求其子民也做出来自上帝旨意的决策。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并非研究生活层面上趋利避害、寻求欲望满足的幸福，决策研究的问题也并非在于不确定的境况或繁乱的社会因素，其重点是在于是否认识上帝及认识自我。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和圣灵教他的子民得着生命，并藉圣经启示整全的真理原则，基督徒领导者便在这已确定的原则和必然的终极前景中做出决策。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在于“决策”的本体论，就是在启示中认识上帝的本性，从而认识人的生命所是，以及人在社会境遇中的使命。

教会领导者

本论文议题的决策主体是“教会领导者”，在领导力课题的普遍定义中，“领导”能力就是影响力。[9]“领导是指个人、团体或组织在某生活范畴做出长期或短期的指引，以致影响和赋予力量给足够多的人，去令该范畴发生改变。……从基督教角度看，唯有方向和手段皆与上帝的旨意、性情和做事手法相符，才堪称合乎上帝心意的领导。”[10]从教会的基督徒身份本质来说，任何真信徒都是要在教会中向世界发挥影响力，并行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因此，教会领导者不仅是指教会的牧者、长老执事等有圣职或行政管理的人士；而是指每位委身教会，有志于参与教会服侍，并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力的信徒。

“教会领导者”就是服侍于神圣教会的人。领导决策的意义不仅是针对于个人及其事件的决定，同时也针对于整个神圣群体的决定。“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就是每一位上帝的儿女在自我的人生决策中，以生命更新、崇拜侍奉、爱心共契、恩赐能力在基督的身体——教会中发挥影响力，从个体到群体共同见证创造主在世界上的决策。

本文的研究主体乃以上定义的“教会领导者”，但本文研究议题的重点在于“决策”；是教会领导者的“决策”。本论文必要综述且借鉴教会神学研究之外的决策科学的理论；但本文的理论必然建基于圣经与神学的上帝论和人性论之内核之上。以教会领导者的“决策”为研究宗旨，必然要结合基督徒的人生决策及教会侍奉决策。上帝旨意的个体生命之任何目标都无法剥离于上帝国及教会使命的目标；正确的人生决策之所求乃要服务于上帝国和上帝的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 6：33）。

教会领导决策的本质性研究必是寻求对人性、圣灵和圣经、圣三一和耶稣基督的本质认知，因为“教会领导者”不仅要重新在圣经真理中唤起创造与

---

[9] 约翰・麦克斯韦尔（John C. Maxwell），《领导力 21 法则》，萧欣忠、林静仪译（台北：基石文化公司，2000），27。

[10] 班克斯、莱德贝特（R. Banks、Bernice M. Ledbetter），《领导学大检阅》，吴丽恒译. (香港：天道书楼，2006)，14。

堕落的真确记忆，在基督的救恩中更新自己，还要担负上帝国之于世界的使命，走向上帝旨意中的确定性的终极前景。因此，本文的“决策”研究之宗旨不仅希望促进教会事件决策的本质性思考，且在乎每位寻求“上帝国”的基督徒之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借鉴反思。

二、研究方法论和论文建构

当代决策科学的方法论基本是以人及社会群体为本，其目标是为个人或团体的经济经营和消费理念而服务，富有浓郁的博弈论和市场气息，但其理论研究包含了大量对人性心理及行为事件的调查研究，甚至对人的非理性自信和无意识直觉的决策都有理性的可量化的数据分析。但对于教会领导决策理论的方法论来说，笔者认为不应该重点放在当代教会领导者的实践调研；而有必要以神学研究和圣经启示及圣徒人物的典范为研究主旨，原因如下：

首先，世俗决策科学以人为本的心理行为及群体的数据调查已经非常充分，教会领导决策之人及团体的普遍化的、技术性的层面之决策方法论无需另辟蹊径而可借鉴、学习其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教会分明缺乏建立本于圣经和神学的决策研究理论基础；其次，本文是以中文写作，主要服务于华人教会，华人教会的信仰传统是持守“唯独圣经”的基本信仰，而对于以科学调研为证明持排斥态度，如果能得出圣经研究及其神学的重要结论，对华人教会是富有说服力的指引。最后，本文并非是纯理论的圣经或神学的研究，在后半部分的篇章中，主要是研究圣经人物和教会圣徒的决策典范，伴随着神学教义和释经研究；并呈现笔者与华人教会领导者的访谈结论，以及城市教会的决策建构范例，作为本文主题学术研究的实践见证。

本文前面的文献综述部分，主要论述经济心理学的决策科学以“有限理性”、“博弈”、“风险”、“陷阱”、“赌注”、“过度自信”、产生于记忆、经验、情感和直觉的“启发性”偏差……充分揭示人性决策的主权性之“无主权性”；有目的的“无目的性”；寻求确实性的不确定性；建构记忆偏

好的写意前景。团体（政治）决策在历史现实的争执不公，随着真理的解构和善与伦理的标准被相对化，决策科学从而抛弃人性本体论和人生定向的真理诉求，转向其经济目的的技术性研究及其数据分析，而极度技术性的决策科学势必解构社会道德而促进打破法则的无底线竞争。或许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认为这就是人世间的游戏法则，人类应该享受其中，但有何人能理所当然享受历史中不断发生的个人蒙冤和群体杀害的残酷呢？本文的信念是建立在上帝是一位智慧心智之“决策”的上帝，并以基督教神学的经典本体论来建构神学的决策理论，尝试对此疑难加以回应。

论文的主体部分是教会领导决策的神学研究，一方面，从个体生命的神学本体论来解答决策科学之人性心理学的内在功能（理性、情感、直觉）的有限和其中凸显的不和谐因素；教会领导者的决策恰恰不在于现世得失算计的技术性手段，其前景建构并非与现实人性的个体记忆处于同一局面中，乃是在宏大既定的永生里，因此，决策目标不受有限和割裂的决策人格的制约并产生迷思。圣灵以圣经真理的启示消除了有限理性和情绪化及直觉的决策偏激；基督救恩新造的人格很大程度上在今世弥合了生命内在功能的不和谐，并把人生决策塑造为围绕生命身份及其使命的单纯作为。

决策研究在基督教神学中必要成为本体论研究，其解答了人性论的决策根本问题：“我到底是谁？（生命所是）和“我当作什么？”（生命所事）。基督徒要拨开种种繁杂欲求的决策迷雾，朝向神圣的“生命所是”——儿女身份，生活的一切乃是以“生命所事”——天国使命为核心的确定性决策。因此，经济心理学的决策科学在神学研究中转化为本体论研究的“人性论”（上帝的形象及其堕落）、“基督论”（新造的人及其称义），“三一论”（生命本源），这是决策之源、决策主体、决策结果的研究。但这并非仅仅“形而上”的哲学，而是活生生显明于圣经及教会历代的圣徒生命中（摩西、保罗、奥古斯丁、路德），并延展在群体（教会）和社会。

另一方面，“教会领导者”的决策研究要从个体生命的研究及其见证出发，回应“群体政治”（历史的教会）的决策难题——尽管从个体生命到群体性都普遍深受“有限理性”决策（如律法主义、圣经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误区）和“情感直觉性”决策（如灵恩及神秘经验主义误区）的严重影响，从人性自身的功能性关系、人与世界境遇的关系到群体间的关系，为何处于向善却暴孽、公诉却谋私、自信却失误、求和却战争、取利却损害、多元却无序、法则却禁锢的决策陷阱中呢？论文尝试从人与境遇、圣灵与圣经在教会中的神学研究呈现其多元之灵活决策朝向的“统一性”，以基督论谈论人要从自我偏离和禁锢中拯救出来，实现自我关系、自我与群体、自我与世界、自我与时空的和好，人之决策主体要和决策环境及决策前景和平相处，并共建为上帝创造的生命工程。且必要最终荣耀创造者——神圣“三”（多样性的秩序之爱）而“一”（崇高唯独性）的本体性，呈现自由且富有原则性的真理关系性。

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是针对经济行为学的决策理论，尝试建立神学本体论的决策理论研究，并以圣经及教会历史的人物为决策研究的典型案例，同时，也对当代华人教会的牧者进行访谈，得出相对应的教会决策之批评性反思。

第二章 决策论之综述

经济行为学的决策理论主要研究人性及群体如何做出抉择，结合了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关切的是人性论，如人的动机及行为、理性与情感、价值观判断并道德等。决策理论普遍为个人或团体的经济经营和消费理念而服务，虽然带着浓郁的博弈论和市场气息，但也为个人及群体发挥生活中诸多方面的效用。要探究人性的非理性自信和无意识直觉在决策中的驱使作用；也对人的决策因素及环境关系进行可量化的数据分析，决策树模型和数学函数在决策理论中普遍应用。决策理论典型的普及范式是要借助思维的力量，判断价值和争取目的，探究机会和变量，尽可能的剔除偏见和误导，规避风险并采集信息，制定最佳方案及行动。[11] 近些年来，决策理论倡导人性论的结构性研究[12]；托马斯•萨蒂（Thomas L. Saaty）的层次分析法（AHP）中提出感知、感觉、判断和记忆组成决策框架。[13] 几位国际著名战略决策专家提出六项优质决策的要素，组成不可或缺的六大决策环节，要求每一环节都要高质量的完成并链接在一起，才能确保最终做出好的决策，他们认为优质决策是战胜环境的关键，明白自身的局限，确认所知和所信的、及所要达到的目标，必要论证可行性并付之行动。

---

[11]大卫•亨德森 (David R.Henderson) 、查尔斯•胡珀（Charles L. Hooper)），《决策的智慧》，侯君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12] 参看哈佛商业期刊中把直觉感知、量化数据和理性判断结合起来的决策理论研究文章，如 Thomas H. Davenport，Make Better Decisions，*HBR's 10 Must Reads ：On Making Smart Decisions，*（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3），133-143.

[13] 托马斯•萨蒂（Thomas L. Saaty），《创造性思维：改变思维做决策》，石勇、李兴森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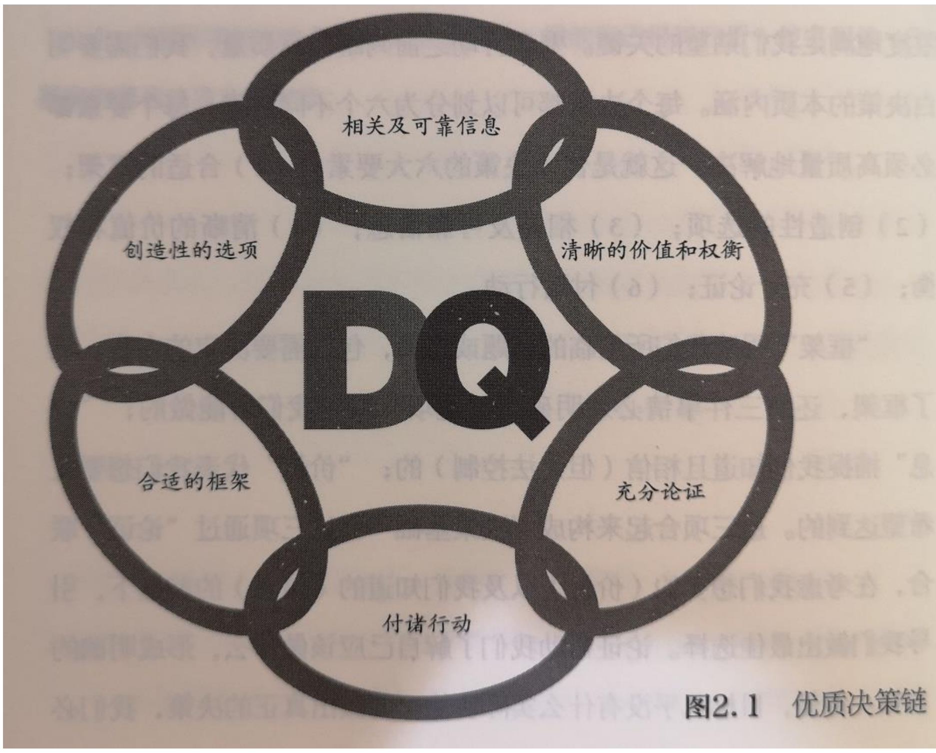


图2.1 优质决策链[14]

无论从决策理论之专门的单项研究，如对有限理性和直觉与情感研究，还是倡导综合性的结构研究，决策理论是针对人生中做抉择的重要研究。那些驱使人生做出决策的要素，不仅在于外在的境遇熏陶及留在人记忆深处印象，也在于人性的本质上的情感和欲求。主要考虑到决策理论一般研究的三种向度：人性内在结构；人之外在的情景和时间；及群体性伦理或政治的决策，因此，以下主要对决策理论进行三部分综述：情感与直觉；记忆与期望；道德与判断；另外，从中也有必要加上一项对决策科学的统计与概率分析的论述。

一、决策中的情感和直觉

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人有快或慢两种决策方式；人们通常善用于无意识的直觉来做决定，就是依赖选择性记忆及情感经验的快速决策方式；而不太习惯于调动有意识的理性思维及做出缓慢的审

[14] 卡尔·斯佩茨勒（Carl Spetzler）、汉娜·温特（Hannah Winter）、珍妮弗·迈耶（Jennifer Meyer），《斯坦福商业决策课：如何做好一个决策》，张源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22。

慎判断。[15] 快速无意识的直觉性决策带给人更有满足感，其效用有时似乎比深思熟虑的判断和决策更为有效。[16] 人性的情感及其作用下的直觉反应，是对消费时代中高涨的物欲心理及体验的描述，在社会经济和消费主义中的人性论决策最切实际的写照，因此，习惯思维、经验记忆、自信偏好、直觉感知、潜意识、情感依附、“超理性”成为决策理论中的研究热门。加里•克莱因（Gary Klain）是自然决策方法的发明者之一，他认为人只要学习案例分析，总结经验，善于运用直觉、洞察力、读心术和团队力量，就可以建构一套决策模式，并教导自身在困难条件下做出高效的决策。[17] 这是决策理论对心理学经验及人与境遇、个人和群体的交互复杂关系偏向于感受性的知识梳理。

心理学家戴维 • 迈尔斯（David G. Myers）提出直觉是一种无意识思维，虽然能表现意料之外的技能和创造性效果；但直觉却常常带来更多有害决策的因素：如误导信息效应、错读自我、错误的预感和错误的行为误判等。[18] 悉尼 • 芬克斯坦（Sydney Finkelstein）的决策研究团队引用当代神经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在人脑结构中，大脑的情感管理的边缘脑部分要比思维认知管理的新皮质层部分更加影响人的决策行为，情感反应的丰富性和综合性（如恐惧、愤怒、悲伤；喜悦、欢愉、快感）很容易促动人进行直接行动。[19] 在人的决策中，经验的情感感受要比理性分析更富有强烈的驱动力。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研究表明，人往往违背“期望效应最大化”原则，没有合乎逻辑地追求目标，

[15] 这是一本涉及消费心理学与决策科学的畅销书，Daniel Kahneman，*Thinking, Fast and Slow*，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1.

[16] M. Gladwell，*Blink: 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New York: Little，Brown，2005）.

[17] 加里 • 克莱因（Gary Klein），《如何作出正确决策》，黄蔚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18] 戴维 • 迈尔斯（David G. Myers），《直觉：你所不知的潜力与危害》，章崇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1-79。

[19] 悉尼 • 芬克斯坦（Sydney Finkelstein）、乔 • 怀特海（Jo Whitehead）、安德鲁 • 坎贝尔（Andrew Campbell），《避开错误决策的 4 个陷阱》，景婧、郑赛芬译（北京：后浪出版公司、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43—45。

系统地表现出非理性，这与人类自动的、有限的思维习惯有关。[20] 正确的理性分析要求人有整全的知识储备及具有克服情绪化能力的人格塑造，但决策偏见恰恰暴露人之知识视野的短浅和心智学习及分析中的懒惰，在人的决策中，因理性判断能力的缺失，唯有让位于情感的直觉性模式。

约瑟夫•勒杜克斯（Joseph E．LeDoux）的脑神经研究模型中，进一步提出人的情感、思维与决策行为之关系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情感的外在刺激直接作用于脑部的感觉丘脑，然后直接在杏仁核激发人的行动本能及其肌肉变化；第二种是情感的外界刺激在感觉丘脑然后通过新皮层（思维认知），再作用于杏仁核激发人的行动。[21] 有关于人的脑部科学研究确认人在通常情况下表现着强烈的情感依附，人的惰性惯于绕过思考而由情感主导直觉决策，情感是人的欲求的直接表现，或本能的避损趋利的结果，这在人的消费心理或经济博弈中最为典型。对于常以直觉和情感驱动的决策者来说，其更加关心目前的得失哀乐，把历史时空浓缩在自我感受的小天地中；因此，千万的人构成的人类社会中，有着错综复杂的人的关系，建构或真或假的故事，人的情感生发着种种的合理或不合理的诉求，碰撞出团体中的利益的权衡分配之疑难。

在决策科学中，情感启发式是人的情感或情绪引发的决策冲动，人抛弃理智认知的判断筹划进行直接的决策。[22] 真实的人生是有诸多确实的元素组合成的缜密的、系统的事件集合，但人的情感无法触及人生的方方面面，更是无法把握那些广博且深刻的事实，人的情感记忆只是依附感受性的记忆，选择性的进行片段取材来塑造自我的故事和展开欲求，因此，人的直觉性选择就是根源于人生的琐碎或强烈感受及欲求程度。人的情感成为人性的无本之源，驱使着人进行社会性的博弈，争取自我的幸福。当然，人性的共情也显然常常发挥效

---

[20] 雷德•海斯蒂 (Reid Hastie)、罗宾•道斯 (Robyn M. Dawes)，《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谢晓非、李纾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20。

[21] 悉尼•芬克斯坦、乔•怀特海、安德鲁•坎贝尔，《避开错误决策的 4 个陷阱》，46—47。

[22] Daniel Kahneman，A perspective on judgment and choice：Mapping bounded rationality，*American Psychologist*（2003），58，697-720.

用，人能够本能的关爱自己的亲人，以及不经意的流露出对苦难者的恻隐之心，情感和直觉有时也绽放出人性的美善之花；但友爱的情感却是常常掩盖在人性的直觉性欲求中，一直成为社会中人性之难能可贵的情感表现。对于 20 世纪流行的直觉主义和情感主义的道德论来说，人性并不能用理性价值来分析判断人的正确（善）与错误（恶）的决策，而人的心理情感和直觉自明就是根本，人对于快乐幸福的追求就是人性的本然。[23] 对于进化心理学家来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群组动物竞争中，强烈的利己和欲望导致人本能的扭曲公平尺度向自我倾斜，且依然无意识的自以为是。[24] 塔勒（R. Thaler）提出人的决策的两方面有限性，一是意志力的有限，倾向给予目前利益的更大权重；二是人的利己主义的有限，表现为在理解竞争公平问题上明显倾向于自我利益的解释。[25] 人之情感驱动着人性散发着能力且无意识的直觉行动，但也暴露出人性在综合理性上的欠缺及意志力的疏懒，这就是人偏执依附直觉和情感导致求真的理性缺陷。

情感对人生决策有显著的影响，无论是乐观情感，还是悲观情感，都使人在决策上产生偏差。[26] 但人的自信却常常认为情绪导致的决策偏差是别人才会犯的错误。[27] 研究者们发现情感的基本功能是一种快速的紧急反应系统，是反映出非分析性的、认知的直觉。情感放映出人潜在的爱与恨的情绪，如后悔、喜悦、悲伤、厌恶等，情感不仅仅给决策者传达“好或坏”的信息，最主要是

---

[23] 凯利•克拉克（Kelly James Clark），安妮•包腾格（Anne Poortenga），《伦理观的故事：人性完善的探究》，陈星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127-134。

[24] 悉尼•芬克斯坦、乔•怀特海、安德鲁•坎贝尔，《避开错误决策的 4 个陷阱》，116—117。

[25] R. Thaler，From homo economicus to homo sapie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0，14，133-141；R. Thaler，Unrestricted teaching files, faculty Web site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School of Business：http：//gsb.uchicago.edu/fac/richard.thaler/.

[26] J. S. Lerner，D. A. Small，G. Loewenstein, Heart strings and purse strings：Carryover effects of emotions on economic transact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15（5），2004，337—275.

[27] 马克斯•巴泽曼（Max H. Bazerman），《管理决策中的判断（第六版）》，杜伟宇、李同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92。

指挥人的行为。[28] 情感或许在人生的习得性经验中帮助人以一种难以剖析的直觉模式识别情景并产生正确的决策；尤其在人处理即时危机和某些疾病护理上。[29] 但直觉的识别能力更多时候是扭曲人对风险概率的评估，直觉对情感的依附表现在人通常高估希望发生事件的概率，低估不愿意发生事件的概率。[30] 高预期判断的直觉决策是人的如意算盘所然，充分表现人内心中的情感欲求。人的情感反应在对行为结果的价值或效应之评价有着重要作用，人会直觉地预测并评价其对某种结果会有怎样的感受，并且依据这种预期的感受迅速做出决策。[31] 因此，情感不仅仅反映在人的无意识直觉决策和公平判断上， 情感在人生的记忆和期望上发挥重大的效用。

二、决策中的记忆与期望

决策学研究人的决策效应和预计效应，决策效应是在人的经验和观察产生的偏好推导出来的；预计效应是对未来体验效应的一种信念；决策的整体效应是体验效应的一个基于时刻的量度，它来自对生活情景的事后评估。[32] 人对快乐或痛苦的经验感受能产生一种体验效应的决策习惯，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认为决策效应是人对预期的幸福感的判断，而人的体验记忆和预期的幸福欲求相互关联产生人的决策。[33] 人的判断越是局限在自我和直觉，对历史的认知就越发短浅并产生偏见；个人的经验认知是何其残缺和片

[28] 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217。

[29] 加里·克莱因，《如何作出正确决策》，60—61。

[30] 斯科特·普劳斯（Scott Plous），《决策与判断》，施俊琦、王星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126。

[31] 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202。

[32]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体验效应与客观幸福：一个基于时刻的方法”，《选择、价值与决策》，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主编，郑磊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714。

[33] D. Kahneman，P. P. Wakker, R. Sarin, Back to Bentham？ Explorations of experienced util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112，375—405.

面，这也是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提到的“目光相对短浅的决策者的框架与眼光长远的历史学家的框架之间的紧张对立”。[34] 当人建立在对人性本质缺失深刻反思的幸福观之上时，个体的碎片记忆结合当前处境所产生对未来的设想和憧憬，或许只能在人生的境遇及竞争中孜孜不倦的寻求自我的“小确幸”吧，这是现世之人的普遍现实。

决策学向决策者的建议是，寻求自我的目标不应该仅局限于已被确认的情景关系中，而要展望未来的新情况，因那些没有出现的事实往往是关键的；决策是基于记忆或期望，记忆是自我对自我感受和情景的观察，期望是对决策所带来的结果的期待构想；在判断未来目标是否存在之前，决策者应该问自己，他们的判断是基于自己的观察还是期望。如果是前者，相关关系可能常被低估，如果后者，就可能常被高估。[35] 人的记忆系统并非完全的理性，而是富有情感化；人经历过的那些刺激情感事情最容易存入的记忆库中，这成为人最容易取得的记忆事件，并成为评估类似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基础，这就是一种决策的“易得性启发式”。[36] 个人的情感选择性记忆常常错失那些隐在或宏观的重要事情，个体自我的记忆不能给人生提供整全的人生视野，因此，个体经验产生的记忆并不能为决策未来奠定完备的记忆基础。而个人的记忆却在人生的未来期望中起关键的主导作用，人的情感记忆要求人追索曾经拥有过的快乐感受而逃避悲伤的感受；[37] 决策者使用的框架当然只能是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拥有的经验和知识，记忆中最容易唤起近期使用过的框架来增强目前运用决策框架

[34] 詹姆斯·马奇，《决策是如何产生的》，11。

[35] 斯科特·普劳斯（Scott Plous），《决策与判断》，施俊琦、王星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152。

[36] A. Tversky、D. Kahneman, A vailability: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Cognitive Psychology*（1973），5，207-232.

[37] 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215。

的技能，形成有合理理由的决策框架就在群体中形成相互影响。[38] 在决策的记忆和期待之间，由情感串联起来，形成人之面对未来的习惯性决策。

在人生的主权意识中，恰恰呈现在人的情感和直觉对有益的知识及理性判断的消减。人在决策时的想法和感受常被最初印象所控制，就是一种可得性经验，称为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或确证性假设检验（confirmatory hypothesis testing）。[39] 其原因何在呢？如果人生决策是人之无意识的享乐欲望的直觉驱使，伦理原则在人的决策中越来越变得没有分量并相对化了，人间的“爱”势必是人性倾注于快乐欲望和直觉感受上。[40]人依然无法消解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战争和苦难，无法维护个人和群体的真正和平的福乐。决策理论研究认为，人对过去重构乃决策的重要原因；但回忆以一定方式组织是为了理解现在，因此强化了人关于过去如何决定现在的信念，人正在编造关于生活以及现实世界的故事，人选择性记忆和严重利己的构建必然产生事实的偏差，为了使回忆与信念一致；人会倾向改变先前的记忆。[41] 记忆从本质上来讲具有重建性，并高度取决于情境因素。[42] 负面情绪的人常常习惯性的勾起那些伤害的记忆；欢乐情绪的情绪想起的却是积极的一面。[43] 而在人生中的波动情绪就建构杂乱起伏的人生故事。

---

[38] 詹姆斯 • 马奇，《决策是如何产生的》， 11。

[39] R. S. Nickerson，Confirmation bias：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many guise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1998），2，175—220.

[40] 著名心理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快乐是人生的最高意志；中国学者生动地描绘人之消费享乐主义特征：“一瓶可口可乐在手，我们喝的是漂亮的少男少女在广告上畅饮的那幅景象，我们喝的是瓶上那条‘令你精神百倍’的标语。”人们“在消费上，永远感到饥饿。购买最新发明的玩意儿、市场上最新式的任何东西，是每个人的‘梦想’，而真正的‘用’，相形之下倒是次要的了”，参陈学明等编，《痛苦中的安乐——马尔库塞弗洛姆论消费主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128；当今人热衷于购买最高配置的智能电子产品和奢侈品也是这般的莫名的心理诉求。

[41] 雷德 • 海斯蒂、罗宾 • 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136。

[42] 斯科特 • 普劳斯，《决策与判断》，34。

[43] 戴维 • 迈尔斯，《直觉：你所不知的潜力与危害》，68。

人生写入记忆的故事和对期望的想象大多呈现过分的自我美化。人对境遇的知觉和对期望的构想，经常以自利性方式发生偏差。[44] 人性的决策行为充满各种层出不穷的陷阱：就如追求前期快感，不顾后果的延期陷阱、对记忆和期望毫无把握的无知陷阱、以及投入陷阱等 。[45] 这是人的价值判断越来越呈现多样化或主观性时，人生决策表现出来的彷徨与错乱，人生的记忆缺失根本性的总结，未来的期望也就缺失实在的规划了。人们对未来的短见有着严重的普遍性，就如情愿在资金上进行短期的消费而放弃对养老的保险积蓄，肆意破坏环境而不顾子孙后代的福利；购买成本低廉、不环保的材料而到时健康受损害。这是人类生活的缺失长远预期的评估的结果，是对未来的漠视。我们如何知晓和预测我们喜欢的事物？假如个人价值观及其效用的心理研究仅仅局限于生理机能学研究，必然毫无出路，唯有塑造尊重生命的人格，透过物质层面的价值观，懂得评估人性精神层面的珍贵价值，才能做出明智决策。[46]

性格偏好导致某些具体的思维习惯，这些习惯会影响决策，以直觉和感觉来决定者将会产生“内容选择性偏见”，促使其关注那些迎合自我的习惯性看法的信息；情感人格会强调决策中人的因素，而思考型会依赖于技术、系统架构。[47] 决策学家列出某些众所皆知的大原则，人生要敢于直面风险；在决策时，要客观理性地评估未来的风险，风险的分担可以让人坦然；“大风险能消灭我们，小风险能让我们变得强大。”[48] 但社会上不存在真正的个体性强大，因个人根本无法抵御社会文化的浪潮而立足，正如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的两种决策系统，一是快速和无意识的直觉驱动；二是审慎、反思性的慢思考；因此，人无法靠自信克服潜在的直觉产生的偏差决定，唯有

---

[44] L. Babcock，G. Loewenstein，Explaining bargaining impasse: The role of self-serving bias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1），1997，109-126.

[45] 斯科特·普劳斯，《决策与判断》，210—220。

[46] 大卫·亨德森、查尔斯·胡珀，《决策的智慧》，54。

[47] 卡尔·斯佩茨勒、汉娜·温特、珍妮弗·迈耶，《斯坦福商业决策课：如何做好一个决策》， 162。

[48] 大卫·亨德森、查尔斯·胡珀，《决策的智慧》，178。

借助他人错失的经验并用第二系统常常反思自己的决策。[49] 行为心理学家研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模式的重大偏见，这些偏见造成决策陷阱；行为科学主要描述没有经过认真思考的无意识给定决策；以自己最舒服的行为和急于求成的心理制定狭隘的决策框架；并且以各种无证据理由说明自己是“天生的”的正确决策者；而团体的“一致性”同意并非可以真正产生优质决策，必须要多番检验这种一致性的内涵；群体的情境和动机、决策团队的认知专业性，偏见的可能性都需要严格反思和检查，这是必要的负责任的审批过程。[50] 商业决策的研究发现，如果仅仅把美好蓝图的长期规划来限制时局变化的灵活决策，将会导致企业运行的僵化和失策。[51] 理性的决策建立在对未来可能性及后果进行透彻评估的基础上。个人要反思自我的决策，可以从心理学分析的角度出发，先观察自己所要的选择，再推断自我的偏好，同样的，从行为来分析隐含的心理期望和信念。[52]

人生的好决策必然关乎人性要追忆自我及人类的真实本源，也关乎人性对自我及社会群体的永远未来的展望。当决策理论剖析个人与群体的矛盾时，在人的记忆深处亟需理性地追寻人类本性的实质性问题，并理性地构建个人和社会群体的共同期待。在社会中，普遍存在人在群体成功时产生邀功的决策心理，而在群体失败时却推卸自己的责任，同时，当自我成功时，总觉得自己的能力超群，而自我失败时，且怪罪于境遇，抱怨造物弄人；这就是人性决策中的一种自利性的归因。[53] 当决策科学被作为技术性手段与实用的功效性捆绑

---

[49] Daniel Kahneman，Dan Lovallo, Olivier Sibony，Before You Make That Big Decision . . .， *HBR's 10 Must Reads：On Making Smart Decisions，*（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3），24-27.

[50] 卡尔·斯佩茨勒、汉娜·温特、珍妮弗·迈耶，《斯坦福商业决策课：如何做好一个决策》， 180—191。

[51] Michael C. Mankins and Richard Steele, Stop Making Plans; Start Making Decisions, *HBR's 10 Must Reads：On Making Smart Decisions，*（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3），157-174.

[52] 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245。

[53] 马克斯·巴泽曼，《管理决策中的判断（第六版）》，82-83。

在一起时，决策的根本理由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喜爱”和“欲求”似乎不需要太崇高的理由。在短暂安稳繁荣的境遇中，人在自我记忆和期望的偏差构想中苟且偷生且满足快乐似乎无妨；但在罪恶肆虐的幽暗时，人何其需要认清整个人类及人性的事实（真理）。

不仅如此，个体的研究要全方位结合于社会与道德的研究，才能查验历史及未来的真相，从而正确地决策。记忆与社会判断从本质上取决于情境因素。[54]人类本质上具有社会性，他们的判断和决策很容易受到社会因素影响，即使独自决策时，他们也是根据他人会做如何评价的预期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与周遭的境遇也是决策正确与否的关键点，紧张的人事关系势必左右自我的情绪，叫人习惯性的偏向于自利性的斗争和自卫，从而丧失理性客观的判断；而融洽和好的气氛将会使人更多的共情与共赢，形成强大的团契生活。

三、统计与概率分析

人对于前景充满不确定的期待和想象；而风险的概率往往是不可估量的，更多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增加随意评估的情况，人就以记忆、情感和偏好进行权重决策。对于前景理论的研究，知名的决策学家们分析不确定性及其风险、赢取或损失的概率，效用值和偏好的决策权重，用函数及其数学图表做出精细的分析。[55] 也有决策科学家认为可以运用决策树方法帮助决策时有更完整的、确定性的思考，考虑潜在的种种因素和可能性，以及对情景的全方位理解及描述，是相当重要的理性决策基础。决策树来分析各种决策的概率胜算与利弊，对事情进行辨析力分析，分清不同立场的差异对错。[56] 决策学家结合数学及统计学，他们认为好决策必然要遵循逻辑学和概率论规则，因个人一般情况下的

---

[54] 斯科特・普劳斯，《决策与判断》，34。

[55] 在两位知名决策理论家主编的合集中，从第二章到第五章，收集了多位学者有关前景理论的专业性论述，主要以数学函数数学函数及图表表明前景决策的不确定性概率和人的决策权重的关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主编，《选择、价值与决策》，郑磊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56] 大卫・亨德森、查尔斯・胡珀，《决策的智慧》，29。

有限计算能力、信息的缺失，要面对混乱且“不稳定”的情景，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就显得无能为力。[57] 决策树和数学数据的分析，的确可以为综合性的决策理清头绪，决策方案就不再是个人心智中的情感的直觉造成的结果，而是进入由公式或图表所构成的理性判断中。当决策时，各种凌乱的思绪在脑海里跳跃，喜爱、担忧、不悦感，轮番出现，矛盾和左右为难……——拿出一张纸，用几天时间，分为两栏，两种或多种选择的理由，或者利弊写下，这便能得出正确的方向来。

但数学形成的理性是否构成真理性的决策呢？哪怕在严谨的专业人士的决策中，也无法以显着特征程度的概率运算来消除其直觉判断所援用的代表性启发式引起的系统性错误；而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以很高的近似度符合二项式定理（binomial law）的随机过程（如生男生女、彩票中奖，某些灾难遭遇等），是无法用数学概率来计算其可能性。[58] 统计数据随着决策市场的有意识需求越来越专门化，统计学的专业者可以为大多数领域的决策提供信息，他们可以按照客户的需要产生有用的、可靠的的数据结果，当然，任何数据并非万能，他们也要在决策建议时提交相关的假设和不确定性。[59] 因此，决策中的统计必须充分考虑变量，对于精明的投资者更须关心变量，并且探究这种变量是永久性还是暂时性的，这样才会有明显优势，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60] 首先要从内部观察每个变量，然后通过某种权重方案进行比较，这样的过程优于考虑每个选项而做出跨越各种变量的全局性直觉判断。[61]

---

[57] 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43。

[58]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主观概率：代表性判断”，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编，《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方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8。

[59] Victoria Cox , *Translating Statistics to Make Decisions: A Guide for the Non-Statistician* , (Salisbury: acid-free paper, 2017), xviii.

[60] 大卫•亨德森、查尔斯•胡珀，《决策的智慧》，60。

[61] 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240。

组织决策需要主动识别社会的形态和趋势——竞争、科技、产品、市场、规章制度等，并且注意必须解决的内部政策；最高管理层的决策与各梯队的部门决策保持协调并领先位置，管理层要确立“决策议程”，并对每个决策进行诊断及解决决策问题。[62] 在大数据与数据化时代，一切都被数字化了，在统计数据中就能清晰定义“不确定性”和“风险”，而有助于决策。[63] 大数据能够为人提供许多决策上的帮助，但也隐藏着危机，人的活动全方位的被充分记录使人成为裸露无遗的透明人，剥夺人性的尊严，被数据化了的社会和个人终将陷于更加集权的掌控的危险境地。当道德、爱与情感也成为量化对象时，难免更加功利的算计在社会市场化中泛滥。

概率统计学当然是处理不确定性的决策困境最有效的工具。[64] 概率范式是取决于，成员关系在事件中描述，逻辑分析、明确的情景，概率论是一种理性推理，而非对随机和偶然性的自信。是对偏差的尽可能排除。“通常来说，如果一切顺利，选择权就是未来获得某些机遇的权利，如果不顺利，选择权就是一条逃生路线。”[65] 人们只关注少数凸显的概率相应后果而忽视其他方面，导致不完整分析，客观体验纬度与从该体验所获主观价值之间心理物理关系，及其计算，获益、快乐、或伤害、惩治。

概念框架的客观方面（可见物质价值）和主观方面（效用与价值观）都能量化时，测量数量和用理论方程来计算是再简单不过了。——耶稣有关天国价值观的量化图式。——等待制作？忠实的信仰能够确保喜爱的坚定性，不会随意改变，因此，预期的决策效用和体验的实际效用之间有着很好的一致性。决策作为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加工理论发展出来的启发式过程，在经验中学习（摩

[62] 卡尔 • 斯佩茨勒、汉娜 • 温特、珍妮弗 • 迈耶，《斯坦福商业决策课：如何做好一个决策》，253。

[63] 道格拉斯•哈伯德（Douglas W. Hubbard），《数据化决策》，邓洪涛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64] 雷德 • 海斯蒂、罗宾 • 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134，163——167。

[65] 大卫 • 亨德森、查尔斯 • 胡珀，《决策的智慧》，145。

西和保罗，他们与情景的互动，得到启示的强度，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学习效能，“学习的考虑，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环境变量和任务结构上，因此，为了理解判断和决策行为，我们应该考虑诸如强化的数量和计划、试验次数（经验量）等变量”“人们将会通过与环境的互动学习最优规则”[66] 因此，决策陷阱——过度自信，解决方案是决策者要停下来思考自己的错误，重新校准，对自己判断的正确性充分研究了解。所有关于决策和判断的研究——都容易出现偏差和误差，奥地利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 之不完全法则（Incompleteness Theorem），他认为任何纯使用算术并规范化的逻辑系统，都存在内在矛盾。[67]

好的决策是在相同信息条件下，下次你仍会反复做出的决策，而不是恰巧在某一时刻带来好的结果的决策。[68] 决策不是机会主义的想法决定，不是投机，而是价值观和理性判断。但对于未知敬畏、概率、可能性和风险也是清晰的。没有懒惰人的运气，运气不是决策和选择，而是全然被动的命定。只有好的决策及其包含的管理技巧，并长远的眼光。在判断和选择时，人们常常使用自动思维。某些心理学规则（例如启发式）能用于这些自动的思维过程。相比于控制性思维，自动思维会让人做出较差判断和选择。但两种思维各有优缺点。[69] 决策时，信息量太大是对时间和金钱的双层浪费，信息量太小则容易导致鲁莽的决策。[70] 因此，决策使用的技术性手段做法是借助于数学统计和概率分析。

---

[66]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编，《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方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96。

[67] 斯科特·普劳斯，《决策与判断》，226—227。

[68] 大卫·亨德森、查尔斯·胡珀，《决策的智慧》，139。

[69] 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6。

[70] 大卫·亨德森、查尔斯·胡珀，《决策的智慧》，207。

四、决策中的理性与道德

人类大脑的思维模式充满着自负及偏见，这必然成为人生决策的陷阱；这些年决策科学研究表明，已经被分类的具体定义的偏见有 200 多种，而且每年还有更多人性的决策偏见通过学术研究被发现。[71] 倡导理性判断的决策学者亦承认，那些试图掌握全部情景以便准确预测或控制的人，依然无法减少不确定性，如若试图要理解所有事情，却往往会一无所获。[72] 就是经过高度训练的专业人士，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情形中，依然是无法把握十分正确的决策。人类所经受诸多决策的干扰因素，如团体迷思、社会压力带来的消极影响、众人错误的一致性暗示、无意识偏见、记忆中的“叙事谬误”、竞争者抛出的“锚固效应”、“易得性效应”、“光环效应”等。[73] 决策心理学描述了人在拥有和享受过后的通常性失望，人在欲望满足后所产生的知觉适应之厌倦感；人在苦难和贫穷中丧失决策的权力，而在自由和物产丰富中却产生选择的困难。[74] 这是人类决策在对抗着理性真理的真相。人到底如何做出合乎理性的决策呢？

好决策是在某一情境中选择可行的途径去达到决策者的目标——这就是合乎理性的决策。但有些决策中的常见因素是非理性的，如无理由的喜欢红色的习惯性选择；选大多数人所选之一致性跟随决策；模仿热爱的人或成功人士的做法；基于文化风俗习惯（如缠足、献婴儿祭等）。[75] 人的思维偏见是本能的认定自己原来的想法和好处，拒绝接纳与自我原有想法和喜好冲突的新观念及做法，以固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进行选择和决策，人要对自我进行改变

---

[71]卡尔 • 斯佩茨勒、汉娜 • 温特、珍妮弗 • 迈耶，《斯坦福商业决策课：如何做好一个决策》，155。

[72] 雷德 • 海斯蒂、罗宾 • 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192。

[73] 卡尔 • 斯佩茨勒、汉娜 • 温特、珍妮弗 • 迈耶，《斯坦福商业决策课：如何做好一个决策》，166—175。

[74] 巴里 • 施瓦茨 (Barry Schwartz)，《选择的悖论》，梁嘉歆、黄子威、彭珊怡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42—150。

[75] 雷德 • 海斯蒂、罗宾 • 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16—17。

时总有的“不适感”，就是心理学家称为的“认知失调”；[76] 人在决策时的安于现状，或对自己舒适期待的结果过分自信造成的人生决策误区。要尽可能戒除这些普遍的非理性决策转向理性决策，斯科特·普劳斯（Scott Plous）提出决策判断的建议是，检验动机与自身预期尤其重要，这是发现引发知觉偏差的认知和动机因素。[77]

当然，实用主义的理性决策可定义为：理性决策就是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期望效用理论，在理性决策中提出可以度量的公理法则，对效用进行衡量。[78]
在经济行为的决策中，对投入赌注的勇敢乃博弈中弄潮儿的刺激性乐趣，理性决策就是对非理性和不确定的拥抱，人生决策就是要“理性”接受这场“赌注”。认知心理学博士安妮·杜克(Annie Duke)分析说，人生决策就是要接纳概率与风险，决策不能有“结果导向”的自我加强的信念，人们天然倾向于能够证实自己信念的、与自身观点一致的信息来源，即使有许多理性的工具、方法和数据，对此仍然无济于事，理性决策就是对抗由信念产生的“动机性推理”和“自利性偏差”，而是接受人生中的不断变化和不确定性并享受在其中的反复勇于尝试的过程。[79] 而接纳错误决策便成为一门艺术和科学，当然是为了学习承担风险的策略，以及在普遍思维的边界之外寻找创造性的突破，其最终得到符合自己心愿的回报结果。[80] 对人生决策的博弈和试错心理的合理化理论当然有其合理之处，具有鼓励多元文化及创造性思维的意义，但必然需要为人类理清决策中的社会伦理原则，要么就会产生玩世不恭和赌博心理的人生态度。

---

[76] 卡尔·斯佩茨勒、汉娜·温特、珍妮弗·迈耶，《斯坦福商业决策课：如何做好一个决策》，159。

[77] 斯科特·普劳斯，《决策与判断》， 19。

[78] 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244。

[79] 杜克(Annie Duke)不仅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心理学博士，也是一位扑克高手；她用一本书写的基本论述就针对这个议题；安妮·杜克(Annie Duke), 《对赌：信息不足时如何做出高明决策》，李光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80] 保罗·休梅克（Paul J. H. Schoemaker），《做最好的决策》，王昭力译（中信出版社，2013），136-137。

尽管精神分析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不认为人类会谨慎地权衡不同行为后果并从中选择合乎理性的抉择，但当代大多数心理学研究都认同一个说服力极强的假设，就是思想和信念导致行为，认知理论是理解并改进重要行为的最佳途径。[81] 因此，某些有效的理性决策的普遍原则被总结出来，最优化的时间管理，对金钱合适的运用，驾轻就熟的把握人身自由。人生决策中，如果常常有抱怨说："为什么会这样？"或"为什么不能这样？"这是情绪掌控的人生，而理性发挥决策的主动性应该表现为：积极创新，发现可能的、更好方案。[82] 理性决策是确立清晰的价值及权衡，明确决策目标，在该情境下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在结果不确定和多种可能结果组合的情况下，就是权衡最佳的利益和诉求。[83] 权衡重要性当然取决于决策者，乃由决策者的价值观所决定。但要进一步确定价值标准和价值系统，尤其是了解我们如何比较与权衡互相冲突的价值；道斯（R. M. Dawes）关于线性模型的稳健表现研究表明，人之决策的洞察不需要完整深刻，但一个好的评估与赋予权重的做法，即使不完美、也能带来接近最优的结果。[84] 理性决策确定目标和价值乃是首要；而做出选择和行为才能紧随其后。

但理性决策理论依然要面对人性的矛盾，决策分析以为确立目标和价值观就可以引起人的情感或直觉的偏执行为做出改变，其实，认知不协调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的价值态度之改变也可能是行为改变所引起；人们为协调自我，愿意改变信念与行为一致，自动扭曲或忘却原有的目标和价值观。[85] 决策中的理性并非是不明白目标，而是无法认识宏大精深的真理。西门（H. A. Simon）在其因此获诺贝尔奖的研究中，提出决策中的"有限理性"，人只能

---

[81] 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15。

[82] 大卫·亨德森、查尔斯·胡珀，《决策的智慧》，132。

[83] 卡尔·斯佩茨勒、汉娜·温特、珍妮弗·迈耶，《斯坦福商业决策课：如何做好一个决策》，105—106。

[84] R. M. Dawes, The robust beauty of improper linear models in decision mak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34*(1979), 571-582。

[85] 斯科特·普劳斯，《决策与判断》，27。

解释现实，而很难适应系统建构的决策过程，个体决策者在认识标准和定义之有限，受智力、时间和成本上的有限制约。[86] 人生决策中，广博知识和宏大思想被机会主义和自利情绪所取代；远见被短浅欲望所占据。诚然，知识、理性和道德是社会群体及个人在决策中的必要因素，真知能使人做出正确决策，不道德的人在群体中终将丧失信任，导致决策受限。[87] 不道德不仅仅来源于人的极度自利动机及行为，更是源于人的无知。有关商业操守和道德行为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不道德行为是当时人的无意识中做出的，品行端正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实施不道德行为是认知的偏差导致的，人性很有可能无意识的在行为与自身奉行的道德标准相违背。[88] 人之理性决策的有限必然导致道德认知的有限，这是人类困境的根本所在。

当代领导决策研究虽然关切人性方面的实践，包括个人塑造，个人与团体的相互作用，还涉及文化环境、组织结构、关系处理等。早先领导学研究较多聚焦于高层管理人员，但领导决策的研究越发注重团体架构的任何层面，领导决策的意义被全方位展开，并贯彻到社会文化与人性的方方面面，甚至与人类心理学关联起来，如性格被强调为对领导力的具有决定性。[89] 领导决策研究必要从个体的经济心理行为向社群的道德与政治延伸，因人类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其判断和决策深受社会因素影响，即使独自决策时，他们也是根据他人会做如何评价的预期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社会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情景的作用。[90] 人对快乐、幸福和安康的感受和预期，乃是与社会情景充分互动的结果。

---

[86] J. G. March、H. A. Simon，*Organizations*，（New York：Wiley，1958）.

[87] 大卫·亨德森、查尔斯·胡珀，《决策的智慧》，198，237。

[88] 马克斯·巴泽曼，《管理决策中的判断（第六版）》，138。

[89] Ralph M. Stogdill, *Handbook of Leadership: A Survey of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e ,1974.

[90] 斯科特·普劳斯，《决策与判断》，43。

威尔斯（Garry Wills）研究历史上领袖决策的典范，包括政治、军事、学术、社会改革等，其重点是从社会政治学角度比较领导的各种类型。[91]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运用丰富的资料，从宏大、开阔的视野，以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对世界各国不同时代的领袖人物及其领导行为进行跨文化、跨时代的理论概括和实证描述，对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系进行了精辟分析，对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作开创性的区分，他强调道德对于领袖之决策的重要性。[92] 当今世俗领导力的研究分明在社会和人文中去寻找立足点，并发掘许多有关处理个人和团体的技巧，至于领导决策的价值标准，并没有论及其深层因素，就是道德的恒定价值的权威；换一句话说，世俗领导决策研究是在一种社会人文的封闭空间中进行。

在经济社会的消费主义盛行中，人生决策中的道德基础常被忽略，人们甚至用“道德过滤”（ethical cleansing）的方式，无意识的把道德原则转化为非道德的因素来处理，这是人性的自我欺骗的习惯性手段。[93] 如帕斯卡名言：“我们的心有着它自己的道理，而我们的理性对这种道理通常一无所知。”人的代表性启发式思维模式，体现人对人性或事物的判断倾向于应该具有与自己原先形成的刻板印象相一致的特点。[94] 而人的这种代表性启发式决策成为种族主义之决策的动因，这种知识上的无知或偏执在社群中可能构成了灾难性的燎原星火。心理学研究发现，人性倾向于认同与自己有相似之处的人，与他们在一起互助更能令自己感到愉快；但人们的内群体互惠互利的方式，却很容易转化为有意和无意的帮派建构，从而伤害到外群体的人。[95] 人性的偏见习惯在群

---

[91] Garry Wills, *Certain Trumpets: The Call of Leade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4).

[92]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领导学》，常健、孙海云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93] A. E. Tenbrunsel，D. M. Messick，Ethical fading：The role of self deception in unethical behavior,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7（2），（2004），223-236.

[94] R. E. Nisbett、L. Ross，*Human inference：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 Hall，1980）.

[95] 马克斯・巴泽曼，《管理决策中的判断（第六版）》，145。

体关系中形成的割裂趋势与政治斗争的问题内核如出一撤，充斥在任何的社会关系中。

人们在决策中极为容易导致社会性痛觉的丧失，表现于从众心理，或某种共同信念坚持下的少数派偏执，或来自于群体内部压力下对现实的检验以及道德判断的一种退化之群体盲思。[96]这般人性形成集体运动终将导致社会正义结构在极度欲望膨胀和为自利斗争中崩溃，群体的无知情绪化是滋生罪恶欺诈之利益集团的土壤。尽管人愿意社会的公平，但人的潜在的自利性倾向，总会过多评估自我的才能与贡献程度；因此，个人和团体就有意识的追求权力和有关权力的信息，并有意识的设计权力差异的等级制度以便控制群体的决策。[97]同时，大量研究也表明，人性的强大的无意识的内隐偏见，其中所产生的刻板印象深存于记忆中，因此产生于偏差的归类判断，就是那些审慎的道貌岸然的评论家，也会无意识的形成对某些事情的歧视言论。[98] 个人和社会的决策研究，亟需归回有根本、有原则的爱和道德。

世俗的群体决策伦理，主要是利己主义和效用主义、或存在主义伦理。[99] 无论是认为人靠自身可以追求本真人格和道德、并“听从内心的声音”的存在主义伦理观；还是以经济利益的自我中心利己主义、追求集体利益的民族或国家主义的效用主义——都相信以人之“分别善恶”作为伦理的主权者；自私和团体利益为重似乎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契约伦理”尝试在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冲突中寻求区分并产生相对公平的伦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论及马克斯韦伯对“责任伦理”（ethics of responsibility）和“终极目的伦理”的区分，决策的“领导者及其追随者都会在具体的、与自我有关的价值与更广泛的、与公众的价值有关的价值之间来

96 斯科特·普劳斯，《决策与判断》， 177—180。

97 詹姆斯·马奇，《决策是如何产生的》，102。

98 马克斯·巴泽曼，《管理决策中的判断（第六版）》，143。

99 K. E. Goodpaster，*Ethical Frameworks for Management.*，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 Services，1983.

回移动”；[100] 但过分尊重个人的“责任伦理”将会为高度自利行为、政治家的机会主义打开便利之门；而“终极目的伦理”却需要确立这种价值观具有不侵害个人尊严和社会公平的实质；因此，“对道德领导的最终检验，还是要看领导能否超越日常欲望，需要和期望的多样性要求，能否回应更高层次的道德发展，以及能否将领导行为——他的角色、选择、风格、承诺——与一套理性的、相对明确的、有意识的价值观念联系起来。”[101] 政治性决策需要研究政府行为的动机和诱因决策，在产生组织行为模型不应该是简单的程序化，这很难面对极复杂的国际变幻情形，在政治决策研究中，政治模型之参与方的感知、偏好、立场、影响力才是分析者所必须认真考察的。[102] 但不能忽略的是，政府决策与社群决策也容易落入某些启发性决策陷阱之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常被赋予高度的重视，而把资源分配于这些事件上，而更为严重事态却可能被掩盖而得不到援助。[103] 政府可以操纵媒体编造生动故事牵引人的情绪，误导人偏离理性分析及公义判断，社会政治及经济群体在终极伦理及真“爱”缺席的情况下，个人及团体的自利是强烈高涨并不择手段的压倒一切；群体的功利效用伦理更是权力利益集团利用为政治上掠夺的工具。

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就在国家主义极恶的历史境遇中，他强调爱才是人性的本质，真正的“爱”必然来自于上帝。爱要扭转人的错误情感，达至真正的理性；爱不是人的欲望和感觉，而是在耶稣基督里对上帝的真知识，“上帝本身就是爱，唯独知道上帝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爱。”[104] 因此，爱是神圣位格间的美善秩序、是伦理原则，爱使理性和情感统一，爱教人认识

[100]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导学》，34。

[101]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导学》，35。

[102] 格雷厄·阿利（Graham T.Allison），《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3] 马克斯·巴泽曼，《管理决策中的判断（第六版）》，92。

[104] 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伦理学》，胡其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2。

真理，唯有爱能在伦理上消弭了人性及社会的隔阂和矛盾。决策是位格性的本质所然，也是位格契合关系的见证。

五、基督教领导学及决策理论

基督教神学在决策理论上很少有深度和系统的研究，经常是出现在论及基督教领导力的书或文章上稍有涉及。回顾基督教领导力之研究历史，中世纪是以修道院作为培育领导力的重要基地，以最有影响力的本笃修会为例，信仰群体的领袖之塑造主要来自传统教义和律规，但也寻求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勤勉和修行是圣徒领袖品格形成的必经之路，修道院领袖深谙属灵牧养和行政，也精通各样的智能知识，并建构属灵生命上为父的使命。[105] 因此，中世纪信徒领袖的人生决策主要有赖于传统属灵导师的教导。信义宗认为教会领袖的生命塑造来自于以圣道、圣礼和圣徒相通为内涵的恩典中，领导者的生命决策来源于谦卑的委身于圣礼所拥有的生命确据，也透过信仰群体的彼此安慰、交通，领导者乃是选择作为信徒群体之祭司的代表。[106] 长老宗对于教会领导者之生命抉择的标杆，乃是基于效法基督的三层职分——先知、祭司、君王，祭司担待人的罪，是领导者“同理心”情怀的体现，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先知职分是向人传达神的信息，建立良好的沟通，传递神圣异象激荡人心，产生动力；君王进行有力的管理，建立整全的目标和行动机制。[107] 宗教改革后的教会领导决策一方面依然继承原有教会建构的领导规范，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更趋向于个人职分的彰显。

---

[105] Mark O’ Keefe, O.S.B, *“The Benedictine Abbot: Creative Tension in Leadership”*(unpublished paper for the De Pree Leadership Center, Pasadena, Calif., 1999).

[106] Timothy F. Lull, *“Underachievers Or Reformers Lutherans Exercsing Daily Life Leadership”*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Traditions in Leadership, De Pree Leadership Cemter, Pasadena, Calif., June 1999).

[107] R. J. Mouw, *“Leadership and the Threeford Office of Chris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Traditions in Leadership, De Pree Leadership Cemter, Pasadena, Calif., June 1999).

当代的基督教领导力研究，更偏向于生活化或商业化的实用性，主要集中于：上帝与玛门、爱与竞争、慈善与财富、忠诚与包容等议题上。[108] 另外，有关人性责能方面的研究，如领导潜能、权力分配和自我节制、个人魅力和性格塑造等、组织目标和异象建立……从这些热门领导力议题中可以看出，教会领导决策必然偏重于人性的价值取向。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领导学大师柯维（Stephen R. Cover）的《与成功有约》和《与领导有约》引领了一种新的领导学潮流，他结合了东方宗教和智慧文学以及自身的摩门教背景，倡导灵性乃是领导力的源泉，属灵引导是领导决策的原因。[109] 尽管柯维（Stephen R. Cover）的领导学看似超然神秘，但其理论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人自身的意志和努力，他认为人只要遵循某种天赋规则，势必做出正确决策。[110] 他把宗教的神秘超然性应用于领导力中，形成领导决策的重要因素。后来的领导学研究纷纷开展到了灵性研究的领域，如鲍曼和迪尔（Lee G. Bolman and Terrence E. Deal）的《心灵领导——心灵非凡之旅》从各种灵性传统中去研究超然的人性之灵在人之决策的作用。[111] 但这种对于灵性在领导决策的决定因素依然是从人文角度去衡量和理解。目前在领导力之灵性的研究，虽然有更广泛的拓展，提到了人的灵魂、信仰和人性本身之外超凡的能力，但这些灵性因素依然是把难以把握的超然能力作为灵性的内涵和意义，大多这般的作品并没有把位格化上帝的启示作为深刻研究的对象。泛灵化只给领导学增添了灵异和神秘的色彩，领袖的修行方式平添了宗教意味，但不等于领袖们能真正得到了来自真理和圣灵的正确引导。

最近的领导学研究在耶稣身上有了浓厚的关注，但依然是偏重于人本主义的角度。琼斯（Laura Beth Jones）以二十余年的领导经验写了《耶稣谈领

---

[108] Lanra L. Nash, *Believers in Business* (Nashville: Thomas Nelson,1994).

[109] Stephen R. Cover, *Principle-Centered Leadership* (New York: Summit books,1991).

[110] Stephen R. Cover, *Principle-Centered Leadership*，33一39.

[111] Lee G. Bolman and Terrence E. Deal, *Leading with Soul: An Uncommon Journey of Spiri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1995).

导》，她研究耶稣组织团队的方式、处理关系的技巧，个人的自我节制，尽管琼斯也谈及要效法耶稣，常感念神所赐的诸般恩赐，但书中充斥个人主义和成功导向的味儿。[112] 耶稣成为主角的领导学是研究的显学，但大多领导学研究把耶稣作为道德的模范和领导智慧的结晶来看待，但鲜有从耶稣在神性和圣三一的位格中来研究并探讨基督教领导决策之上帝和人的复合性因素及其所产生的神圣异象。当今教会领导决策要超越陷于缺乏深度的灵修神秘主义的无序或市场化影响之简约空洞的情况，就需要重新寻找神圣传统范式之领导决策规范，基督教领导力的核心主题还得回归两大根本主体：上帝与人。当上帝与人和好时，人被上帝拣选成为他的子民并担负使命，人在世的决策范式并非仅是道德行为和品格塑造，而是认知“上帝是谁？”、“我是谁？”——这深切的问题。

当然，基督教领导学也不乏有好作品。李顿福特（Leighton Ford）的《耶稣——转化型领袖》，他声明耶稣在世上有不可比拟的独特身份，但也从耶稣身上提炼出领导者必备的各种需要转化和师从的角色，如：策略家、异象者、仆人、牧者教练、奋斗者等。[113] 海波斯（Bill Hybels）则注重研究教会领袖的个人特征：异象型、方向型、策略型、管理型、激励型、牧养型、改革型、网络型等。[114] 这两位基督教领导学者清晰的论述了领导者之所以成为领导者所要决策的种种要素及其目标，但他们依然未能脱离领导学之实用主义的桎梏，其种种论述简明、可读性强，但缺乏来自于圣经诠释和教义神学的深厚基础，这些都不能为基督教领导者提供深刻的省思和对上帝旨意的整全认知，从而做出有力的、确定性的生命决策。按照简·基斯（Jane Kise）和大卫·斯塔克（David Stark）所撰写的《生命方向》中，上帝引导人做出决定包括几大要素：上帝的旨意，圣灵，圣经的话语，环境，人身上所具有的上帝之特殊设计。

---

[112] Laura Beth Jones, *Jesus CEO: Using Ancient Wisdom for Visionary Leadership* (New York: Hyperion,1995).

[113] Leighton Ford, *Jesus: The Transforming Leader*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1991).

[114] Bill Hybels, *"Finding Your Leadership Style: Ten Different Ways to Lead God's People ,"Leadership*(winter 1998),84-89.

[115] 其中，上帝的旨意是籍圣灵和圣经话语之引导表明出来，而环境是上帝为人所预备的境遇。巴刻（J. I. Packer）和凯奈斯（Carolyn Nystrom）的作品《保守我、引导我：在抉择中明白神的旨意》中，论述了上帝对基督徒引导的各种因素，如上帝的话语（特别引诗篇二十三篇作为例），圣灵的工作，人的心智和境遇。[116] 两位作者贴近基督徒的属灵生活，采用许多圣经例证和剖析神与人的关系，但本书也不是从基督论入手，并没有从基督论来深层次的分析神的工作与人的自由之张力。华理克（Rick Warren）的《标杆人生》成为华人教会的畅销书，内容紧扣福音真理，从介绍三位一体的上帝开始，到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见证，他的书也重点讨论生命的核心是：以神为乐、活像基督，神的旨意就是基督徒人生抉择的关键。[117] 华理克（Rick Warren）从目的导向来讨论人生态度和人生决定的方向，但其论述也不具有神学的本质性探讨。亨利 • 克劳德（H. Cloud）写了一本如何面对挫败的有关决策的书，他认为境遇的磨难而遭遇心中意愿的损失，可以说是人生树的良好修剪；是趋向成熟的成长之道, 在于存菁去芜，因此，当视“必要的结束”为常态；宛如季节的更迭，落叶凋零乃为了迎来春的发生。他把自然现象化作心理安抚的力量，人与境遇交织为得与失的通识，纳为世界观，教反常变成正常：“知其所以的痛苦”与“无谓的痛苦”为修剪时刻，从而拥抱伤痛、除旧布新。[118] 这本书的人生决策信条是：务实,、经历絶望依然要充满动力。决策的行动力是：盼望而非空想，要区分什么值得改进，什么是应该结束的，因此，人生决策能放映出三种人生：智慧人、愚昧人、邪恶人。而真正的智慧人是分辨谁值得你信任、创造急迫感、保持改变的渴望与动力、抗拒改变的阻力，永续经营。德

---

[115] Jane A. G. Kise, Stark, David, *Life Directions* (Minneapolis: Bethany House, 1999).

[116] 巴刻（J. I. Packer）、凯奈斯（Carolyn Nystrom），《保守我、引导我：在抉择中明白神的旨意》，伊妙珍译（香港：天道，2010）。

[117] 华理克（Rick Warren），《标杆人生》，PD 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118] 亨利 • 克劳德（H. Cloud），《收尾学 : 开启未来的决策力》，何明珠译（新北市：校园，2013）。

国的修道院领导力学者古伦（A. Grün）主要是从领导者的德性来谈论生命决策的价值和动力。[119] 但决策研究并没有论述太多关于基督教会的教义及上帝论与人性关联的决策本质问题。前些年费理申 （Garry Friesen）写的一本有关上帝旨意和人的决策的详尽的书，他对上帝主权下的人生进行多角度的论述，他的论述是在教会的“传统观点”进一步发展“智慧的路径”的方法，就是上帝为每个人的生活设定各种各样的规划，而人有责任去辨别来自上帝的最好计划，上帝以圣经中的话语来指示人的任何决策，就在人的内在印证与外在的境遇中；包括人的愿望、他人的成熟忠告和常识等，基督徒在任何决策时，必须明了这些指向的标识。他清楚表明：

> 传统观点认为，圣经(上帝的道德意志)提供了做决策所需的大部分指导；但人要做出正确的决策的必要条件是完全认识神的旨意。本书提出的观点是：圣经完全足以提供信徒认识和遵行神旨意所需要的一切指引。[120]

他认为圣经不仅是给予人明确的道德要求，在生活任何决策上都给人明确的智慧原则，当然上帝会给人留下选择权，但他根据他的道德意志(圣经)，通过启示的命令和原则直接引导信徒；在非道德的决定中，上帝根据属灵的权宜，以智慧来引导信徒。在一切事上，上帝都按照祂的旨意，藉着对一切事的主权暗中引导信徒；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特别的启示引导信徒。当然他在全书中的论点也有矛盾的地方，如有些地方谈到上帝的绝对主权，他为人定下行动次数，但也提到人没有选择上帝原定的规划时，上帝给予人备选方案。

六、小结

纵观领导学的研究文献，从世俗的人本主义，到追索智慧和灵性的源泉，以及以基督教领导学为名义的论述，领导学研究主要还是停留于人文层面和经验技巧的数据分析。作为基督教领导学中处理生命和使命之关键的决策议题，

---

[119] 古伦（A. Grün），《价值领导，勇敢决择：领导的素质决定企业的生命力与决策力》，郑玉英，（台北：南与北文化，2012）。

[120] Garry Friesen,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will of God,*（Portland:Multnomah,1980），82.

笔者主张领导者之决策议题必要追究生命的本体论，人生并非仅仅过得精致且随遇而安，或“平安喜乐上天堂”就好了。基督徒的人生在上帝旨意中已经被赋予崇高的“领导力”（教会使命）；因此，教会领导决策是由深知“我是谁”而深知“我当作什么”。上帝的创造与人性、基督的救恩与称义的位分指明了教会领导者的“我之所是”；圣灵藉圣经和历史中的教会呈现出上帝对其选民的旨意，引导选民成就“我之所事”。教会领导者之决策在世界历史的时空中，依然要面对“上帝与人”、“集体与个人”、“启示与诠释”之主权与自由、无限和有限、法则与多元的张力，但圣经及历代圣徒的教导已经把内在圣三一与经世圣三一之创造者的主体性表明出来，向有其“形象”和“样式”的人指示破解一切矛盾和隔阂的权柄和能力。

圣三一上帝就是决策的上帝，上帝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中显明了自己，以圣灵的爱充满在教会的圣徒群体中，决策是基督徒生命对圣三一生命主的见证，基督徒领导者的决策不是对无法预测的未来的投资算计，不是捕捉上帝的旨意，不是诚惶诚恐的猜测后果如何，而是在基督里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决策是来自圣灵重生的生命的天然流溢，是毫不迟疑地指向信实的应许。

第三章 教会领导者之决策的神学研究

基督教会领导者的决策理论与行为经济学的决策理论在根本上有截然不同之处，教会领导决策建立在生命本源的真理确定性探求上，是紧密关联于创造者旨意之决策，**是关乎确定性**；经济行为决策理论是围绕人之行为与期待值的关系展开经验实证，从而为人对前景的“未来的选项”减少偏差，**是关乎可能性**。教会领导决策的研究重点并非在于人的行为与期待值偏差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创造者心意及其引导策略，从而更加认识自我及在教会群体中正确地践行使命。

基督徒深信人乃上帝所造，并被赋予尊荣和使命，但人于犯罪堕落后，人类需要重新认识上帝及其旨意，三位一体上帝藉着耶稣基督拯救相信他的人，人因此走上永生的道路。基督徒从与上帝隔绝的无知和骄傲中重新被呼召成为上帝的儿女，在圣灵中进入教会的生命团契，对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及其群体负有传道的责任，要成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参太 5：13—16）。因此，基督徒都要有崇高的教会领导力，每一位上帝儿女都要继承天父的“产业”；

> “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加 4：6-7）。

基督徒的领导决策，其根本是在上帝启示的道中剖析人性本质，并辨明周遭这受造世界之于我的意义，在人与境遇的关系中学习有关上帝与永生的知识并行动。

> “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来 4：12—13）

人之决策的要素：就是人性与万物，及其中的关系。人性自我根源本不是谜团，人更不应该迷失在拜物中；圣灵与《圣经》的真道极强烈地透析人性自我，透析万物，教人认识基督救恩、认识圣三一上帝之内在与外显之决策，决策就是本于确定性真理、执行确定性真理。

一、 决策中的人与境遇

人到底是谁？人在世界上到底当作什么？这是人生决策之根本问题了。整本圣经都在回应这两大问题，上帝藉耶稣基督的救恩为罪人揭开人性本质的面纱，圣三一上帝创造与救恩的决策之深义本都显明在人心和万有中。基督徒的决策与自己的生命实质（身份）有关，也与在世的社会境遇有关。经济行为学的决策研究显示人在一生中的自我依赖及对事物的依赖，并在事物收获中取得快乐情感的慰藉；但基督徒领导者决策的基本是追溯人类共同的身份本源，从而实现人性真理的身份，并正确处理对世界事物的正当权利。

1、人的身份

教会领导者之自我身份的确认来自于《圣经》启示的人性论，圣经《创世纪》开篇论述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并被赋予“修理”“看守”伊甸园的管理者职责，这构成了基督教人性论对人的身份的神学基础。

>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 造男造女。（创 1：26-27）

“形象”这词在圣经中常常指向偶像神器，代表着神明本身（民 33:52；王下 11:18；代下 23:17；结 7:20，16:17，23:14；摩 5:26；诗 39:7）[121] ；“样式”在整个旧约传统中，是表达人与上帝的本质形态的相似关系，尤其在

[121] James Swanson, *Dictionary of Biblical Languages with Semantic Domains : Hebrew (Old Testament)* (Oak Harbor: Logos Research Systems, Inc., 1997).

治理的权柄上成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行使上帝之统管万有的功能。[122] 在创世篇章中，上帝对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之确立乃为重点，正如经文所呈现的结构一样：

26a	以第一人称宣称上帝的旨意
26b	人类受造的目的：管理世界
27	人的受造
28	赐福人类：繁衍和管理世界
29	为人类分配食物
30	关于动物 [123]

圣经充分启示上帝旨意中人的身份，是受造且尊贵的管理者的身份，人本来要代表上帝对受造世界执行领导力及决策的权柄。东方教父贵高利提出人的受造特征是为王者身份，因人是依照统治万有的神性形象而造成，被赋予最高尊贵的美德、永生和正义的荣美；因此人本具有与上帝相爱相亲的位格能力。[124] 教父大马色人约翰所著《正统信仰阐详》中，对《创世纪》中的人的受造做了字义的诠释：

> 上帝用他的双手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出具有看得见（肉身）和看不见性格的人。一方面他用泥土抟成人的身体，另一方面他用自己的呼吸赐给他有理性的及能思想的灵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照着他的形象”的意思。因为

[122] Willem VanGemeren, e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Old Testament Theology & Exegesi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7), 969–970.

[123]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15*, vol. 1,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Incorporated, 1998), 27.

[124] 贵钩利，丢尼修等，《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东方教父选集》，（上海：基督教两会，2009），8—9。

> “照着他的形象”一语明明指人的精神和自由意志。而“照着他的样式”乃指尽可能模仿他的德性。[125]

教父认为人的外在可见的肉身和内在的思想、意志、德性都证明了上帝创造决策上赋以人与其生命的关系。奥古斯丁在其著作《论三位一体》中，经常提出人是上帝创造的核心，在人性的外显经验和内在结构中，都可以洞察到圣三一的真相。[126] 最要紧的是新旧约不断申明创造者对人的爱和救恩，“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人”（参约 3：16），乃是上帝对人之爱的高峰。但是，人的堕落犯罪也是圣经强调的人性论另一方面；这是人性所有行为及决策与真理偏差的原因所在，人类真实身份的迷失亟需重新寻回，要么人生决策只能是在彷徨中走向毫无指望的终极绝境。

人类的罪源于始祖亚当夏娃的堕落，因此，罪恶在人类中具有普遍性，没有例外，“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 3：23），结合经文的上下文理，保罗有关罪的构想肯定包含“所有个体”，即犹太人，希腊人和外邦人，他强调“所有”人（罗 3：4，9，12，19-20）；人类的特性都呈现出罪恶，都为悖逆上帝的人，其境况只有创造者上帝才能拯救。“荣耀”是上帝本来赋予被造物中人性的崇高品质，人性唯有皈依上帝、达到上帝与人交通和好时的状态中始得稍显拥有其荣美（罗 5:2、18、21、23；帖前 2:12；林前 2:7，15：40—41；林后 3:18；4：6；腓 3：21；参西 1：27；3：4；弗 1:17；贴后 2:14）；人皆因罪与上帝疏远，被剥夺其本应得到的崇高品质，罪人要为亏缺上帝的荣耀负责。[127] 动词“亏缺”的希腊文现在时与罗马书第八章的整体意义结合起来可以表明，基督徒即便是在终极被上帝改变前的最后一

---

[125] 贵钧利，丢尼修等，《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东方教父选集》，321。

[126] 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43-248。

[127] Joseph A. Fitzmyer S.J., *Romans: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vol. 33, Anchor Yale Bible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46-347.

天，也“没有达到”这个目标。[128] 这是教会领导者谦卑自我的重要警示，领导者的决策并非可以自以为义，而是决定成为悔改的先行者和教会中服侍者，不断提醒自我中与罪的迷失有关的身份，在教会群体中形成相互促动改变的影响力，使生命朝向前景的胜利做出决策。

有关罪在人性中的普遍性和共同性，历代基督教教义颇有共识，但有关罪在人性中的严重性程度之理解，却有诸多争议。罗马书第五章提到两种罪恶范畴：“一人”和“世人”，罪并非仅在于“集体主义”的共同性，也非仅在于个人反道德的行为，而是群体间的交互感染性，及个体位格本质的潜在性。上帝对罪恶的指控及将来的审判不仅是针对群体的共同性，也针对个人位格的实在性，正如死亡在群体中连续和蔓延一样，而基督的十字架之死与复活恰是打开罪与死的无所不在之枷锁的钥匙，叫人期盼将来必成的释放。

> 但在十字架的和复活的光辉中，我们读到了他已将死亡废除，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提后 2：14）。我们读到了掌死权者的毁灭（来 2：14）。然而，这也涉及到将被毁灭的“最后敌人”（即死亡）（林前 15：26）。占据保罗的不是罪与死的“宿命论”，而是“现在已然”与“尚未完成”的二重性。死亡权柄的剥夺被描绘成一种当下的现实，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种终末论的期待。[129]

人性之罪的现实本质性决定人无法自救，但对于蒙受救恩的教会领导者却要担负决策的责任，不仅在自我的圣洁中遵循上帝的旨意，也要承担“传福音”的使命；整全的福音并非仅仅针对个体的灵魂，也要面对整个受造的世界，个体的人性、社群的集体以及周遭的世界都要在罪恶的深痛体验中朝向终极的美善前景期望中迈进，这不能是可能性的多项选择，而是必须确定性的盼望。

朋霍费尔的基督教伦理学出发点是直面人性的罪恶；其人性论明确地回应当代决策理论中人之理性判断之残缺短见的疑难；人的知识系统根本性问题是

---

[128] Douglas J. Moo,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 ed. Ned B. Stonehouse et al., Second Editi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247.

[129] 贝考维（G. C. Berkouwer），《罪》，刘宗坤等译（香港：道风书社，2006），624。

在于失乐园事件导致人与上帝的“不和”及其生命主权秩序的颠倒，是人性对永恒生命的离弃。圣经创世纪中所记载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做出吃善恶树果子的决策，其本质是人的骄傲对真知识的叛逆，人在篡权夺位的错误幸福预期中丧失正确的理性判断，“知善恶的人最终摆脱了生命，亦即摆脱了源自上帝的拣选的永恒生命”[130]。人热爱于知识且对判断善恶的愿望并没有错，智慧和知识向来为上帝所赞许，愚昧无知反而引致罪恶灭亡，“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何 4：6）。伊甸园中人的决策错误根本，乃在人企图与上帝同等——“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创 3：5；参 22 节），打算拥有与上帝一样的管控权；“人只不过以知自身为本源取代知在上帝的本源中的自身，这样，他也就把自身理解成善恶之本源。”[131]“分别善恶”事件是人类历史之错误决策的开端，人要在知识和理性判断上充当自我和世界的主人，“知善恶即知自身乃善与恶的本源，知自身乃一次永恒挑战和选定的本源。”[132] 因此，人类在堕落后便陷于决策上的本源性无知，人的理性判断从自身生命的本源上脱离了。“人不再知道只有上帝才是善的，只有在上帝才能认识万物，而只知自身乃善与恶的本源，他不容上帝去挑选和选定，他要自己去挑选，作为选定之本源。”[133] 人的生命状态是：“反对上帝、反对其本源、没有上帝而根据自己的挑选、欲知善恶、在自相矛盾的可能性中理解自身的人，与统一的、和解的、在上帝之中的生命分离了……”[134] 朋霍费尔揭示了伊甸园事件堕落后人的羞耻感是人的矛盾状态的最真实写照：

> “羞耻包含着对不和的肯定与否定，故而人生活在遮蔽与揭露、隐藏自我与披露自我、孤独与共同体之间。所以，人恰恰在孤独中——即在肯定不和的情况下——比在共同

---

[130] 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伦理学》，胡其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3。

[131] 朋霍费尔，《伦理学》，12。

[132] 朋霍费尔，《伦理学》，13。

[133] 朋霍费尔，《伦理学》，13。

[134] 朋霍费尔，《伦理学》，13。

体本身中更强烈地体验到共同体，当然是已经分离的共同体。但是，两者必定始终都存在着。”[135]

这正是当代决策理论研究所证实的人在认识自身、人在与境遇的相互作用时，所呈现的种种深重的矛盾冲突，那些试图理性认识全部情景以便准确预测和判断自身和环境的人，依然无法减少决策中的不确定性，任何用各样知识去理解所有事情的尝试，往往也一无所获。[136] 决策理论论述人在拥有和享受后通常性的失望，人在欲望满足后所产生的知觉适应之厌倦感；人在苦难和贫穷中丧失决策的权力，而在自由和物产丰富中却产生选择的困难。[137] 在经济行为科学中对人决策的普遍观察结论是：人的决策有两种系统模式，第一种系统思维是人的直觉决策为主，它常常是快速的、自动的、无需意志努力的、内隐和情绪的；第二种系统的特征是较慢的、有意识的、需要意志努力的、外显的和逻辑推理的过程。[138] 知识理性教人明白好决策是在某一情境中选择可行的途径去达到决策者的目标，但人在决策中却习惯性采用非理性的、以直觉和偏好进行选择，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往往违背“期望效应最大化”原则，没有合乎逻辑地追求目标，系统地表现出非理性——这就是人类自动的或“有限的”思维习惯。[139] 人生决策显然是人性贯彻自身之“分别善恶”的现实窘况，人脱离坚实的本源，就是缺失生命的完整记忆及完整知识的理性，人唯有无意识地满足短暂的自我欲求和嗜好，为获取直观利益与境遇斗争、与命运博弈。“分别善恶”事件的后果使人生决策演变为一场无根本的得与失的赌博，知识为技术性手段、理性判断让位于惰性直觉。当人对其本源本质失忆与

---

[135] 朋霍费尔，《伦理学》，15—16。

[136] 雷德·海斯蒂 (Reid Hastie)、罗宾·道斯 (Robyn M. Dawes)，《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谢晓非、李纾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192。

[137] 巴里·施瓦茨 (Barry Schwartz)，《选择的悖论》，梁嘉歆、黄子威、彭珊怡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42—150。

[138] 马克斯·巴泽曼（Max H.Bazerman），《管理决策中的判断（第六版）》，杜伟宇、李同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6。

[139] 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20。

“遗忘”时，人必然陷入“自我欺骗的境地”（雅 1：22）。[140] 但生命决策岂能仅仅研究人性论的经济消费心理和社会及生理机能本身？真正的生命意义要求回归人的伦理和爱的原则，从而看待生命的本真塑造。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 3：10—12，参诗 14：3），加尔文（John Calvin）解释道：人在亚当犯罪后就倾向于虚幻的自我崇拜；人在亚当里的完全堕落导致人丧失起初的福分，罪恶也败坏了全人，人因此生来抵挡神，思想昏昧并纵欲。[141] 但加尔文并非要谈论堕落后的人之理性知识的功用，他乃要以圣经中的创造论（诗篇 19：2 节及以下，104：2—4；罗 1：19—20；来 11：3）而提出上帝藉受造物向万人彰显他的智慧，加尔文认为文学、艺术等科学都无法掩盖上帝丰盛智慧在受造中的证据；但人与上帝隔绝的罪导致人无法从受造物中认识上帝，唯有靠上帝的救恩和圣经的启示。[142]

教会领导者的决策目标并非为个人成就或为群体谋取利益，也非为享受事业成功，而是判断事物本质的真伪；朝向上帝所命定的终极，以上帝的慈爱和公义为目标。教会领导者依然要面对世间事物在时空中的知识判断，也要承受其自身的正在未成之事之旅程的境遇的变幻，但教会领导者的决策不能为境遇中多变活动的正邪交织所迷乱；也不能试图独善其身或与世界及其中的人类科学隔离开来而丧失使命能力；不能在种种繁杂的事物欲求中随波逐流；而是深信人和世界的受造本质，犯罪堕落的事实和普遍现实性，热爱救恩中和创造里的启示，以整全的知识和深刻的判断去接纳基督里的全部，并担负使命。

---

[140] 朋霍费尔，《伦理学》，37。

[141]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基督教要义（上册）》，钱曜诚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10），219—222，230。

[142]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20—43。

2、人在社会境遇中

假如统管宇宙万有的全能上帝不存在，人生之决策就化解为人本身及其境遇两大要素的博弈了，更深一层的分析，就是人性之个体与每个个体组成的群体，以及人身外之物的分配和权利的交互关系。近现代有关人性及世界观，有极其悲观或乐观的理念，[143] 但这两端的理念都交汇为一种人本主义的行为科学研究，企图在人性本身寻求生理或物理之主导人类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法门。[144] 人之决策，的确被笼罩在诸多复杂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场景中，人如何来把握自身并掌握决策的自主性呢？这是社会学议题的争议焦点：人是社会环境的创造者，还是被社会环境所塑造？个人俨然是不能抵御社会境遇的强大作用，境遇所产生的决定因素乃人无法抗拒和选择；[145] 如人的出生环境，种族，国家、亲人，甚至受教育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甚至认为，每一种教育，都是一种政治的工具，它借用知识和权力，维持或改变话语的占有。[146] 人的社会境遇也严重影响人格塑造，人性决策的“中枢”——心理及其价值观乃在其社会境遇中被形成，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人的某段敏感期，特定环境对其人格的影响是深远的。[147] 而环境因素是人性必然要面对的相当复杂的集合体，人于时间和空间中的各种遭遇产生的情感和记忆，在既定的文化与社群中所受之潜在或直接的教导，都与人生无数的大小决策结合为动态的走向，朝向可预期也无法测度的未来。无论如何，境遇是个人在决策时无法把握的宏大领域，但人也并非必然是环境模塑下的产物，人性蕴含奇妙的创造力与活力，

---

[143]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中的某些思潮如以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为代表认为现实世界充满荒谬和悖论，一切事物都是盲目的运动，人类为了避免绝对的虚无，只能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有意识的行动来创造自身的意义。而追随进化论的现代思想却保持高度乐观，以为生物的进化必然是进步和发展，并通往最终的福乐。

[144] E.g., B. F. Skinner，*Walden two* (New York：Macmillan，1948)。

[145] 获第 47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由张艺谋执导、改编自余华作品的《活着》，以平实的手法记述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和人生的故事，人在时代变幻的境遇浪潮中的无奈及苦难。

[146]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1972),227.

[147] 珀文（Lawrence A. Pervin），《人格科学》，周榕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报社，2001），193。

人性与环境的互动能列出无穷可能的方程式。同样在恶劣环境下，有人悲观丧气，有人显为刚强勇敢；有人经历磨难或荣华，且能把握人生道德准则，而有人却随局面改变而思想飘摇。经济行为学不可能为人性决策模塑标准的典范，其研究目标只是提供人尽可能做出符合自身利益预期的决策，世俗的决策科学并不具有确定统一价值标准和世界观准则的使命。

诚然，在人生与社会境遇的关系，亟需正义法则来指引，理性和道德是社会群体及个人在决策中的必要因素，真知能使人做出正确决策，不道德的人在群体中终将丧失信任，导致决策受限。[148] 人生决策就是以知识及理性去判断境遇的情况，并与不利的境遇进行抗争，充分利用有益于自身的境遇；但人对自身的生命理解，及其价值观和道德却是常常被相对化了，后现代思想家从根本上放弃了世界上具有固定的意义，而是把一切建立在偶然和动态的意象上。[149] 事实上，当代无神论的根本观念中，人在信仰与道德原则之否决就是一种把相对绝对化的抉择，因此，人就如漂浮于境遇洪流中的枯叶一般，毫无定向。这便是基督教教义论述的有罪的人和有罪的社会环境的现实。

人生在世的社会境况是交织着善恶、苦乐、是非矛盾；到底如何理解人性及其权利决策呢？朋霍费尔在德国希特勒时期的极端国家主义疯狂肆虐时期，他敏感的意识到任何人性权利是被赋予神圣且不可被剥夺的（哪怕是罪人）；他的人性论不采用简单粗暴的二元法，而以悖论繁复的方式谈论人的自然生命，以此来理解世界与社会。尽管人类已经堕落离弃上帝，热衷于“分别善恶”的主权意识，但“自然生命”依然本能地承受着个人和团体的权力及义务，抗衡着这世界朝向极恶崩溃。“个人权利是团体权利的承载力，反之，团体同样也承载和保护个人的权利……在自然生命内部，理性的职责是必须考虑到个人的

---

[148] 大卫 R.亨德森 (David R.Henderson) 、查尔斯 L.胡珀 (Charles L.Hooper)，《决策的智慧》，侯君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98，237。

[149]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68。

权利，即使没有认识到这种权利的上帝的背景。”[150] 自然生命中的保护“器官”乃是理性，他在危机中做决策并抵抗着盲目意志对生命本身施暴和压迫。但人性团体若有机会集合恶的权力便一发不可收拾。朋霍费尔提出上帝给予自然生命的知识和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命本身；但其作用在大恶横行时却微乎其微；在人类历史的集体记忆中，人的生命尊严、生存权、居所、财产……甚至身体，都常受战争与灾害。[151] 朋霍费尔把善恶交织存在的人性特殊性定义为自然生命，人的生命本是以上帝为本源，因人选择“分辨善恶”果后高度自主，人便把自我及政治团体绝对化，并唯其本身为目的。

无论是把生命本身作为生命活动目的，还是在权力集团强力统治下把生命机械化为手段奉献与团体或领袖，终将导致生命的虚无和毁灭。[152] 在纳粹统治的恐怖时期，大多数基督教会竟沦落在苟同于纳粹的伪善下，朋霍费尔是具备何等样的决策智慧，教他毅然选择去揭发和对抗纳粹的邪恶势力呢？因他认识到上帝终将统管他的造物：“基督教伦理学问题是上帝在基督中启示的实在在上帝的造物中实现。”[153] 自然生命的现存矛盾正是预备着迈向与上帝的和好之路；唯有把生命交付给上帝，一切破裂的关系才能被修补——就是实在与实现的关系、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历史和事件（启示）的关系。因此，生命要把分别善恶的最终权力交还上帝，生命决策的根本并非人世间任何价值判断和评估，并非存在、意向、行动和某一状况的评价，而是要全心全意地朝向上帝。无论如何，自然生命在绝望中仍有指望；其受造是预备面向终极的实在。自然生命是“堕落后被上帝保存下来的、对准基督来临的生命形象”。[154] 自然生命是被赋予的生命 ，是“自然的”寓于生命本身并为之服务的形象，其本质来说，他属于上帝的创造，并是为了耶稣基督而被造。

---

[150] 朋霍费尔，《伦理学》，138。
[151] 朋霍费尔，《伦理学》，139。
[152] 朋霍费尔，《伦理学》，134。
[153] 朋霍费尔，《伦理学》，171。
[154] 朋霍费尔，《伦理学》，135。

在世的教会领导者对上帝于社会境遇中向人普遍启示的科学知识如何认知，决定着领导者对社会境遇知识的解读，判断人类集体智慧之真伪之于群体领导者的决策极为重要。托伦斯（T. F. Torrance）结合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理论，认为知识是人探究事物的内在结构所产生的洞察力或直觉，从而形成“在我们的认知与我们的所知之间所出现的结构性的直系关系之内——当我们深入它之中并领悟了它的意义的时候……这是对于一种未知的模式抑或事物之中的一种崭新的秩序的一种直觉性的预感。”[155] 因此，托伦斯认为神学和科学都应该是客观的，科学研究的认识论中的分明秩序和意义的神秘性终将指向神学的本体论；在人的科学认知中，可以总结出事物的内在法则，但事物在与人的交互关系中，对事物内在知识的探究中，其终极意义和本源探索的神秘性为神学提供重要的阐述向度，这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拯救所包含的终极意义。[156] 基督徒在谦卑领受那些创造法则在普遍人性的理性知识之真善时，也不失对错误理论的公义批评性智慧；教会领导者的决策使命不应该满足于独善其身的自我得救，而是为了上帝的救恩在普世创造中的实现；上帝心意中的“自然生命”及自然法则虽然因罪恶沾污而黯然失色，但其本质和意义依然要归回并荣耀上帝，“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罗 11：36）受造的人与受造世界并非截然对立，毫无疑问的是，科学研究的许多结果对认识人性和创造法则是大有裨益的，就如决策理论采用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为客观反省行为错失很有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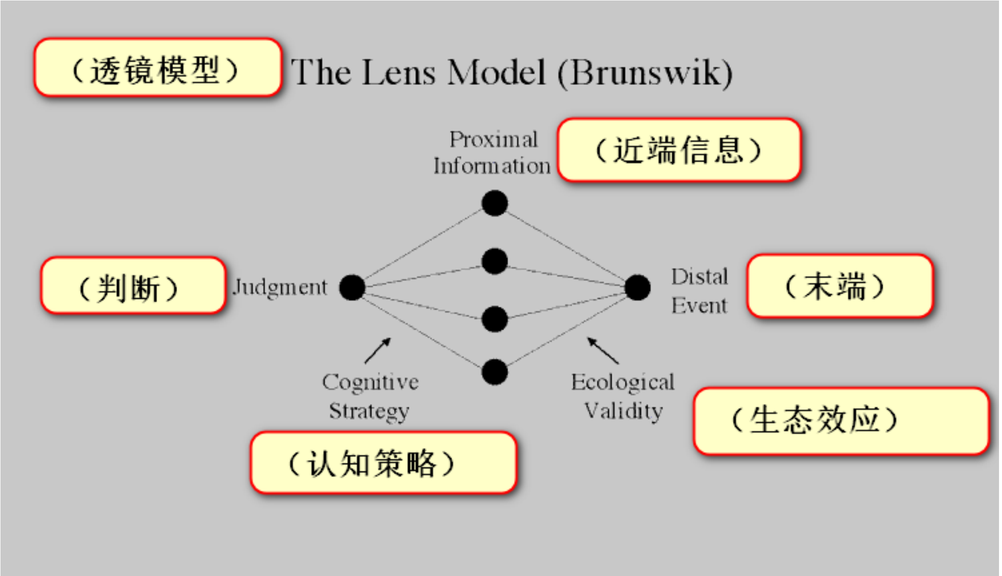
心理学家布伦瑞克（Brunswik）提出著名的透镜模型（Lens Model），描绘人的感官如何与外部世界的物体和事件发生联系，人的感官并不总是直接去感受外部事物，而要通过介于外部物体和内部知觉之间的“透镜”来获取信息。

---

[155] T. F. Torrance，*Transformation and Convergence in the Frame of Knowledge*，Belfast，1984，113—114.

[156] 这方面的精深论述在托伦斯（T. F. Torrance）另外两本专著中表明出来，T. F. Torrance，*Reality and Scientific Theology*，Edinburgh，1985；T. F. Torrance，*Thelogy Science*，Oxford，1969.

透镜模型分为两个部分，右半部分是人在作判断时的心理过程，而左半部分是人所处的真实世界中的事件和关系。[157]



158

透镜模型（Lens Model）充分说明人与社会环境中的事物之互动的情况，人的决策过程必然是产生于内在感受和外部环境之遭遇，在经济行为学的决策理论中，许多对人性结构及其与世界境遇的互动研究，与神学本体论研究并非冲突，而是有着重要的互助作用。现代科学是人类对世界法则的探究和利用，但人类科学与哲学的震荡摇摆恰恰是真理缺失和真理存在的见证，无论是代表过分强调历史记载的纯粹客观性的“现代主义”，还是全然否定撰述历史的实证，并认为历史乃主观经验的“后现代主义”；都是对人类集体见证和过去传统的偏见。[159] 赖特（N. T. Wright）有力的批评说：“客观和主观的这种草率分界，毫无使用价值可言”，他论证说：

> 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细致的认识论，……假如我们采用基督教的世界观，我们至少可以认为：知识涉及人类跟受造世界的相互关系。这涉及到圣经的信仰，即人类乃根据上帝

---

[157] K. R. Hammond & T. R. Steward Eds.，*The essential Brunswik*，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58] 这份透镜模型图片引之网页：http://www.engineeringandmusic.de/individu/kirlalex/kialfig1.GIF，2019.08.30.

[159] 普罗文（I. Provan）、朗（V. P. Long）、朗文（Tremper Longman III），《圣经以色列史》，刘智信、刘林蕴琴、黎静仪、谭达峰译（香港: 天道，2010），59。

> 的形象所造，而他们也因而被赐予某种责任，需以智慧管理受造世界，他们并非置身于创造之外的观察者，更不是侵略者。从这观点来看，知识可以是一种作管家的方式；从现今世界的状态来看，知识可以是一种救赎性的管理形式；从某角度来看，它也可以是一种爱的形式。[160]

对于教会领导者的决策来说，其问题焦点是，在罪侵入世界的情况下，如何判断社会群体对世界的知识呢？如果基督徒自以为可以从社会文化的影响断然隔绝出来，那是乐观到愚昧的地步，恰恰相反，我们要在上帝的心意中，强有力的进入与世界及社群的全方位关联中，并要在圣经真理及圣徒传统里与社会知识产生批判性的受教与教导的紧密关系。正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徒 7：22），后来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时，也从他的做异教祭司岳父叶忒罗那里学习领导力，解决管理决策的偏差问题（参出 18：13-27），圣经中记载的献祭、祷告、禁食等敬拜方式，也早在各原始宗教中普遍通行，但在上帝子民中，却被洁净并献与独一真神的崇拜中。

人之决策科学，是从人之短暂的记忆，去建立尺度判断事情而行动；但上帝在创世及救赎之宏大决策，才是上帝子民的领导者要明白的旨意。受造的世界成为创造主教导其子民的场所，无论是旧约以色列民在埃及地、在旷野之地，被虏于亚述、巴比伦、波斯之地，以色列群体的祸福兴衰，世界格局的时势变化，还是新约中在罗马政权和希腊文化强烈笼罩下的基督门徒，他们都是站在上帝圣山上观望的圣者，绝非如迷失在短暂的昏暗利欲之迷雾中的芸芸众生一般，一切在圣灵里的知识和谋划，何其清晰明了，充分显明出上帝之简要的决策原则和决策前景。

圣经中，上帝以全“地”来代表受造世界及人在其中的社会境遇，也以“地”指明人的决策方向。

> “我们的上帝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作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作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

---

[160] 赖特（N. T. Wright），《新约与神的子民》，左心泰译（台北，校园，2013），66。

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尼希米记 9：32—38）

“地”是旧约圣经极重要的词汇，代表着上帝的创造、安排及统管，人由于犯罪，对于地的管理权被上帝收回，“地”因人类的罪恶而深受牵连（参创 3：17；罗 8：22）；全地的民都要朝向蒙拣选的圣洁之地，那就是上帝临在的崇拜圣所。[161] “地”不仅仅是人的境遇，而是上帝子民的人生决策的面向和内涵；人与“地”的交互关系中书写着上帝创造和救恩的画卷，“地”也要成为新创造之终极目标的处所（赛 65：17；66：22；启 21：1）。新约的教会领导者的典范——保罗是在与任何境遇相处中，充满智慧和谐的决策者。“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腓 4：11、12），保罗回应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论及他经历各样境况的智慧并非如教会中那些人情世故的顾念或论断那么浅薄，而是要在信仰的深层次中生发出来。这段话中，动词的转换“知道”带着宗教揭开奥秘的隆重感，保罗自给自足的能力不是通过生活实践总结出来，而是通过信仰的深刻洞察力，是在与基督的强烈关系中得到内在的力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 4：13），[162]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前 4：16-17），决策者面临生命中的诸般境遇，如若不产生过分的依赖感和错误的价值判断，必然是对未来前景之最终永恒的实际展现有决定性的确信。

以上的论述表明，人之决策是在三大因素的互动中进行，就是上帝、人与社会境遇。上帝创造的人性，并非活在无秩序的迷茫和偶然里，基督徒的任

---

[161] Victor P. Hamilton, “167 אֶרֶץ,” ed. R. Laird Harris, Gleason L. Archer Jr., and Bruce K. Waltke,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Chicago: Moody Press, 1999), 75.

[162] Paul A. Holloway, *Philippians: A Commentary*, ed. Adela Yarbro Collins, Hermeneia—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17), 187.

何人生决策，都在上帝的主权和法度中。教会领导者相信上帝主权对人的介入是全方位的，上帝为他所拣选的儿女安排社会境遇，如同导演为一台戏剧布设背景一样，基督徒相信上帝在时空之外预定一切救恩，但也在时空之内成就了一切救恩，每位蒙拣选的基督徒领导者都要经受境遇的影响，也在境遇中做出决策。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以多项论述上帝存在成为著名的“自然神学”家，他从被造世界的法则和逻辑结构中去证明至高者的必然存在。[163]尽管后来如卡尔·巴特（Karl Barth）等神学家反对以人的理性推理来论证上帝存在的“自然神学”，他们断定罪人无论如何不能产生认识上帝存在的知识。但对于基督徒来说，在世界中查验到上帝创造的法则、永能和神性是显然的，基督徒领导决策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使世上的诸般学问和知识指向创造者的存在，并服务于他。

教会领导者要明白人性在上帝创造中的地位，相信被上帝引导的自由是被预定的自由，基督徒是在不可抗拒的恩典中体现自我的决策和使命，奥古斯丁谈到在基督耶稣救恩中进入上帝之城的人性，“每个人里面都有一种自由，是免于恶的自由……不断享受永恒的喜乐……不会对释放我们的神忘恩负义。”[164] 基督徒领导者相信上帝在其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和定命，基督徒领导者是在神圣的命定中，富有坚定的盼望和活泼的决策。

论述有关人性与情景的关系，心理学家坦然承认：“人们的行为由背景所控制”，并且，背景中的“价值观会创造特定的背景，进而影响我们的感知。”

---

[163] 在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的经典作品《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中，阿奎纳强调上帝启示藉着耶稣基督与圣经的独特性，人的罪也无法自明和直觉的认识上帝的存在，上帝创造的启示是被隐藏起来的（Deus absconditus），但阿奎纳认为我们可以透过上帝所透露的事物（一般启示）了解他的存在，且只能够以类比方法这样做。当我们谈到上帝的美德时，我们只能了解到那些在人类来看类似于上帝的美德的事物，但这些并不完全等同于上帝真正的美德。

[164] Aurelius Augustinus, *The City of against the Pagan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 W. M. Green (Cambridg,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vol.7,378.

[165] 基督徒如何在决策中处理与情景的关系呢？教会领导者与世俗决策论者最显要的区别，就是深信人生及任何境遇都由上帝安排和统管，基督徒必须谦卑地认识到自己是社会情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在其中负有责任。弱者常常随波逐流、把责任归于环境所然，但对于基督徒领导者来说，不仅要做出合乎上帝旨意的决策，哪怕面临环境的考验，也应该坚持真理的立场，因上帝常用环境来试炼教会领导者是否达到成熟和完美。基督徒领导者的决策是在上帝的主权引导中，发挥基督徒在境遇中的美好见证。

无论如何，对于领导者决策因素的研究，要警惕人本主义的进路，不应该把人性理知和社会环境抬高到决定性的程度，但也不能存着宿命论心理，以为任由上帝命定就是采取消极等待。拉纳（Karl Rahner）称耶稣基督为“绝对的救主”，因为惟有耶稣基督能够为超越性的上帝、世界、以及人类提供真正意义的接触点，惟有耶稣带来上帝国的临在，耶稣的复活证实上帝国临在的能力及其开启，惟有在基督里，人类才能获取指向永远生命的合法性。[166] 人要活在上帝旨意中才能成就美善决策，而上帝在人及环境里的启示必须借助基督的救恩。惟有基督能够为领导决策之来自神圣“超越性”的作用和现时的“临在性”架设桥梁。正如卡尔•亨利（Carl F. H. Hennry）所言：“那位自我启示的救赎主——是他恩赐了对超越经验世界的有效知识”。[167] 上帝在拣选的恩典中向人显明的一切主权，人要以自由决策来回应，这两种决然的坚硬碰撞，都消融于基督耶稣充满大爱的救恩中。基督论弥补了上帝主权的决定性和人性的自由决策的鸿沟，因此，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就是在基督里的决策。基督徒领导者并非处于神受的莫名恍惚的状况中，而应该具备更加康健的意志和深刻的

---

[165] 埃伦 • 兰格 （Ellen J.Langer），《专念：积极心理学的力量》，王佳艺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30—35。

[166] Karl Rahner,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Fa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dea of Christianity*, trans. William V.Dych(New York: Seabury,1978),280.

[167] Carl F. H. Hennry, *Frontiers in Evangelical Theology* (Waco, Tex: Word,1966),154-155.

悟性，上帝所引导的教会领袖，必然有分外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在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真理中，呈现更加完满的人格决策。

二、决策来自圣灵与圣经

上一节主要论述上帝创造的人在受造的社会境遇中的关系，谈论的是人的真实位分，以及人在上帝的启示中，如何确当地看待社会环境及科学知识。假如人是随机生发而出并随机被抛在各种随机境遇中碰撞的随机“分子”，那任何人生决策就如赌徒掷出骰子时那一丝眼角的抽搐——渺小且紧张。

作为在世上担当使命的教会领导者的决策者而言，其领导决策却是承受着信实且崇高的上帝旨意，在这章节中，主要研究人如何认识圣灵藉圣经在教会中对领导者的决策引导。

1、圣灵

基督徒相信圣灵引导着信徒的人生决策，却常对圣灵引导的理解产生各种偏差，如采用禁食祷告去聆听内在声音、捕捉奇异意念或强烈感动等。近代灵恩运动的教会领导者也鼓励信徒借助“权能接触”、“运用信心”、“方言祷告”、“先知预言”等方式，从属灵界中得到超凡能力的指引。[168] 尽管灵恩运动并不否定圣经话语在上帝启示中的权威，但其谈论的各种经验性的见证中，灵异经验是常被作为圣灵对人之直觉性引导，而圣经诠释及神学研讨之理性判断反而被理解为一种人意。这些有关“圣灵感动”的人生决策故事与决策科学理论研究结果何其相似之处是，人之决策的活跃功能是在情感和直觉中，而非在理性思考中。

---

[168] 有关灵恩运动的剖析，笔者认为可参阅巴刻和杨庆球所著的两本中肯客观的著作，也有必要对比参照灵恩运动的赞同推动出版社以琳书房翻译出版的一系列灵恩运动领袖者的作品，如；彼得·韦拿（C. Peter Wagner）、温约翰（John Wimber）以及新近推行的“使徒国度”模式；巴刻（J. I. Packer），《活在圣灵中》，陈霍玉莲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杨庆球，《灵风起舞：圣灵教义与灵恩现象剖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9）37—64。

约翰·麦克阿瑟（John F. MacArther）断言："灵恩派信徒已遗弃了圣经作为神唯一话语的性质，结果是一个属灵的'来者不拒'。对一些新鲜的、奥秘事物之向往已经取代了史实上基督教所植根于其上的对神话语的信念……"[169] 圣灵之于人的引导方式难道是在神秘或直觉的经验中吗？抑或，圣灵的引领并非在与信徒的情感和经验关系中，而必须在圣经的文字表述中去理解？

历代教会信经公认，圣灵是上帝，他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圣灵在耶稣出生（太 1:18；路 1:35、41、67，2:25-27）、受洗（可 1:9、10；徒 10:38）、传道（太 4:1，12:18；可 1:12；路 4:1、14，10:21；约 3:34）中担当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在耶稣生平及事工中建立教会，且朝向末世终极的成就，圣灵也作为耶稣在教会中存在的方式（罗 1:4；林前 15:45；提前 3:16；彼前 3:18）。信徒与圣灵的关系就是与耶稣的关系（约 14:16-18；罗 8:9、10；林前 6:17，12:4-6；弗 3:16、17；启第二，三章）。因此，认识圣灵就必然要认识三一真神，圣灵并非是从三一上帝中割裂出来的上帝位格，而是在三一上帝中的圣灵；圣灵是在创造与救恩中作为主权者的上帝，上帝子民认识圣灵，便是认识上帝，认识真理，是使有罪迷失的自我重新认识整全人格和世界的真相。

圣灵位格的特征及其启示的真理乃是教会领导者认识人与上帝、人与世界之关系的要诀。卡尔·巴特在其著名《罗马书释义》中的第八章总结为圣灵的主题。他分三部分来论证，首先，圣灵是"决定"（罗 8：1-10），圣灵以基督的救恩在人与上帝之间达成永恒决策，圣灵揭示肉体的局限、罪恶、仇恨、腐朽、死亡及审判，并坚决向罪恶说不；圣灵决定的"是"成为肯定的"在"，基督徒常误以为圣灵是："一种因素，一种动机、一种效用、一种原因"，其实圣灵"不是这一切，而是纯粹的运作、纯粹的现实、纯粹的现象，他既无开端亦无终结，既无局限亦无条件，既无方位亦无时间，不是它物并列的某物"。

---

[169] 约翰·麦克阿瑟（John F. MacArther），《舌音运动的迷思》（台湾：提比利亚出版社，2004），69。

[170]， 圣灵的决定就是作为创造者的决策，是对罪恶及其权势的否定，从而在基督救恩中肯定一切受造。其次，圣灵是真理；真理以最隐秘的、强烈的最具拯救力的主观性使人性在基督里死而复活；他欢乐、华丽且严肃，终结了人生之绝望的悲剧；“真理是严酷的、神圣的、强大的，是对我们的拯救，是上帝本身，是为我们的上帝。”[171]；圣灵的真理并非仅是理论说辞，而是在基督里以神圣且强大的位格临在拯救人于生死中。最后，圣灵是爱；“因耶稣基督里的对上帝的爱是一体性的，是人对上帝的爱和上帝对人的爱之间的一体性。在这种爱中，我们的爱得胜，在这种爱中，不可实现的同一性实现了。”[172] 圣经向我们展现人生在基督耶稣的死而复活的救恩中必然要做出抉择，但这并非人本身具有的决策，而是圣灵替我们以上帝的旨意来决策——那就是生命的重构，是否定中的肯定，是耶稣救恩之死而复活的强力“决定”，而这是因为圣灵；正如罗马书第八章所指引的，因圣灵，人生决策从死亡和律法之审判的律中脱离出来，而进入全新生命的律；“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罗 8：3），基督的灵就“住在我们心里”（罗 8：11）人性的本质和目标就全然改变，人生决策的方向不再是“肉体”和“肉体的事”——“身体恶行”，而是“圣灵”和“圣灵的事”——“生命平安”。人生决策的迷思根源于人性对“我之所是”的位分无知，当我不知道我的人生真实本分时，我无法以坚定信念去寻求人生目标和确定性的前景，我实在不晓得也无力去厉行崇高的人生使命；我唯有本着肤浅的良知和无所谓的欲望度日，导致落在各种身体的恶行中不可自拔。直到圣灵引导我认识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审判了罪恶和死亡，宣告复活的指望；我在心中确信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天上父亲的后嗣，我是承受永恒产业者：

[170] 卡尔·巴特（Karl Barth），《罗马书释义》，魏育青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51。

[171] 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287。

[172] 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302。

> 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 8：14-17）

在上帝与人的爱中，"儿女"或"后嗣"是何其教人惊叹的位分，这段经文的描述不仅是字义的重复，更是为突出身份和权力及责任的紧密关联。在罗马书的整体神学架构中，保罗提出上帝曾应许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承受世界作为产业(罗 4:13)，承受产业是儿女名分必然的权力；为了提醒上帝子民深刻的共同记忆，以色列作为上帝为自己拣选的儿女是旧约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也是犹太人自我身份理解的基本(申 32:9；王上 8:51， 53；王下 21:14； 诗 33:12，74:2；赛 63:17； 伯 10:16； 弥 7:18 等)；如今，因圣灵的普世性充满所产生的伟大契合，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基督里拥有如此位分（参加 3:1–14,，29；4:28–29；林前 6:9–11；加 4:7；弗 1:14；多 3:5–7)；并且，儿女的产业乃是"上帝的国"，是事关终极的未来且已经进入现今的事实（林前 6:9–10，15:50；加 5:21；弗 5:5；参太 25:34；雅 2:5）。[173] 因此，圣灵不仅叫基督徒的生命位分产生彻底的转变，基督徒周遭的事态也完全变化了，"肉体及肉体的事"将成为圣灵里的"生命平安"；基督徒依然遭遇"现在的苦楚"，但因已经承受的确定性产业，这些就"不足介意"了，人生决策不再是面对不确定性的赌注；而是已经拥有确定的永恒产业。创造者的儿女举目查验这"服在虚空"中"被败坏所辖制"的"受造之物"，当一切"劳苦、叹息"的呻吟回荡在历史时空中时；创造者的儿女必然盼望最终的得赎；就如冥冥之中的"受造之物"也"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罗 8：21）世界不仅存在人性位分的错失及道德败坏，受造世界也在走向衰竭、解体和死亡；但受造世界上所有一切不是可有可无的旁物，而是要与人类

---

[173] James D. G. Dunn, *Romans 1–8*, vol. 38A,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Incorporated, 1998), 455.

同享释放和荣耀。[174] 圣灵里的生命更新，不仅是人因与上帝和好而取得的位分，而是要意识到上帝旨意中的整个受造世界终将要恢复美善、活力与和平，因此，基督徒领导者的决策不仅是取得本身与上帝和好的身份，也要聆听并关怀周遭的社会境遇，因在圣灵契合中，基督徒的软弱不仅有圣灵的帮助，蒙受“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罗 8：26-27）；而且“我们晓得万事（πάντα）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 8：28）“πάντα”是一个不常见的加强形式的希腊词，它指向完全的、全部的、有着哲学之“宇宙”性的意义。[175] “爱”的圣灵一方面站在我们的地位祷告上帝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里；另一方面，创造的圣灵运作整个宇宙效力于爱上帝的人。是圣灵，在基督救恩中，把人与上帝、人与世界契合了；是圣灵，基督徒领导者之生命决策诚然有了上帝儿女的身份基础，有周遭境遇的保障性意义与传和平福音的使命感；有时空中奔向永恒前景的确定标竿。

圣灵与个人生命之生活有紧密互动，他激发人认罪（约 16：8）和重生（约 3：5—8）、教导人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林前 12：3）、使人结出生命的果子（加 5：16—25）。我们明白圣灵从未剥夺人性的自由，圣灵从未采用控制和强夺的方式制服人，只有鬼魔才强暴地控制人格，使人和动物失去自由意志（参太 8：28-34，9：32-34，17：14-18；可 1：21-28，9:14-29；路 4:31-37，9:37-43）；圣经有不要消灭圣灵感动的教导（贴前 5：19）；圣灵乃是用循循善诱的教导方式教人回转。圣经也记载圣灵启示和感动西面去圣殿去遇见耶稣的父母及婴儿耶稣，从而吟唱出弥赛亚赞歌（路 2：25-35）；圣灵要指教受逼迫门徒在官府面前“当说的话”（路 12：12）；圣灵对腓利说话，叫他去贴近埃塞俄比亚太监的马车，好传福音给他（徒 8：29）；圣灵吩

[174] Joseph A. Fitzmyer S.J., *Romans: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vol. 33, Anchor Yale Bible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509.

[175] Moisés Silva, e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4), 660.

咐彼得前往外邦之家去传福音（徒 11：12）；圣灵让亚迦布预告将要发生的大饥荒（徒 11：28）；圣灵在安提阿教会中说话，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一起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徒 13：2）；耶稣的圣灵不允许保罗往庇推尼去，而是在异象中叫保罗往马其顿去（徒 16：6-10）。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些记述圣灵说话感动或引导的经文，圣经从未描述圣灵感动并引导之细节，圣灵或许用超然神秘的作为作用于人的直觉或感受中，或许教人在真理认知及信心中相信并判断是来自于圣灵的指引。但圣灵引导的指标乃是：所有事件都指向上帝国度的福音事工，是教会领导者对上帝与人和世界契合的真切使命，是在任何社会境遇聆听到真理的告慰，是上帝与圣徒之宏大策略和知识的共通。

圣经记述的圣灵充满与洗，常被误解为个人的感受和转变，其实圣灵的充满与圣灵的洗是指向信徒委身教会群体之奉献恩赐及神圣团契的决策，圣经首次提到圣灵充满是出埃及的以色列工匠们奉献智慧和能力参与建造上帝会幕的群体性事工（参出 31：3；35：31）；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圣灵的浇灌或充满，印证了教会领导者同心合意领受上帝国的使命。圣灵的感动并非是叫人情感上感觉舒畅而已，他乃要召喊领导者担负群体性的使命（民 11:16–30; 27:12–23，士 3：10，6：34，11：29，徒 2：4；6：2—5）。假如人以个体的经验和感受去衡量创造之圣灵（创 1：2），那就把圣灵看的太渺小了；圣灵展现的是上帝统管的宏图伟略，“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赛 11：2），在妥拉的敬虔传统和智慧传统中，“智慧和聪明”、“谋略和能力”、“知识和敬畏”俨然也是不可分割的交互关系，这在先知预告的“弥赛亚”之灵中充分得到启示。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必须在圣灵里超越暂时的和自我的限制；圣灵诚然在人性的感受直觉中强烈的工作，赐予人有满足的大喜乐。但圣灵工作的目的是赋予上帝子民的领导者脱离世俗的琐碎得失，抛弃在世暂时的欲望满足，朝向本质和终极的决策。

> 圣灵却并没有设定任何可见的受造物，从而我们便不能够说他存在于这样一些受造物中而不是另一些受造物中，除非作为一种标志，例如他也存在于各种圣事之中，以及律法的种种象征中。……如果圣灵是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受到差遣的，那就只是为了彰显不可见的差遣，因为不可见的事物是藉着可见的事物而得以认识的。[176]

托马斯·阿奎那论三位一体中，提出圣灵藉着受造物来显明他受差遣的启示，任何受造的事物都可以被圣灵所使用，对世界负有福音使命的教会领导者的确不应该仅仅在自我的感受中领受圣灵的引导，而是要如圣经记载的圣徒和教会历代圣徒一样，也要从社会境遇及其普遍现象中聆听圣灵的声音而做出决策。

圣灵诚然排斥那些法利赛式的僵化教条，叫生命富有决策的活力。基督徒深信圣灵的能力超乎我们的理性判断，但圣灵之引导也不是天马行空地运作，圣灵不是仅和人的情感功能打交道，圣灵运行在人的“悟性”中，“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林前 14：19）；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前书中，他用悟性与方言做对比，批判那些热爱方言恩赐而导致教会分裂的信徒，他提倡在最大的恩赐——爱中团契；同时，教会领导者的决策使命必须在于传扬福音、教导真道；就是由理性思考而带出造就人的教导来；而教导是早期教会使用的特定词汇，教导上帝的救恩是基督徒在福音工作和教会生活中的重要部分。[177] 因此，圣灵恩赐领导者是“悟性”的教导，是可言说的理性，而并非是莫名的激情感染，是在基督徒生命中见证基督耶稣的救恩，以及懂得判断自我决策的偏差，产生爱的团契。

同样经文结构的圣灵论在约翰福音中呈现；约翰福音约第十三章，笼罩在即将被学生悖离且出卖和受难之阴影下的耶稣基督，语重心长的向未来的教会领导者颁布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

---

[176]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神学大全 <第一集 论上帝>》，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55。

[177] Moisés Silva, e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648.

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13：34-35）人性决策的过分自信（彼得的信誓旦旦，参约13：37）；门徒们对不确定状况下的迷糊判断，以及情感所带来的启发式和偏差，道德的败坏和爱的决裂与伤害在所难免。但主耶稣爱的召唤依然坚定有力，响彻幽暗的历史时空；他深知道，他求父所应许赐下的保惠师圣灵要与所爱的门徒永远同在。“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约14：15-17）。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的共同构建的圣经神学中，显明爱的诫命、圣灵和真理，也启示唯独以上帝和基督为中心。[178] 上帝作为爱的本体，在圣三一的紧密关联和秩序行动中彰显开来，这就是真正彼此相爱的团契本源，是不可分割的统一；而在十字架的苦难和审判中，揭示这世界和人性的决裂和散乱。使徒保罗和使徒约翰共同的圣经启示传统，就是圣三一的爱的本体，藉着圣灵要浇灌在基督的门徒中，使一切为仇的、分裂的、隔阂的形成在基督里的和好。（参罗5：1-11，如林前12—14章与约13-17章的经文结构）。圣经中的圣灵促成是生命的关联与团契，是对本真的认识和回归。

> “我们等待圣灵，恳求得到圣灵，坚信圣灵会按照固有的特定方式有所作为，对圣灵惟命是从，担心会使圣灵不快，将圣灵视为神性的第三位格而敬拜，但愿这种态度每时每刻必以自我扬弃为内涵，我们不能也不可回避这样一种必要性：每时每刻以某一方式采取一种与圣灵最富于在性的事实相应的态度，但愿我们知道，事实上任何人的态度都不可能与圣灵相应，也许惟有如此圣灵才与我们相应，才为我们作保，才为我们这些无可辩解者辩解。”[179]

圣灵揭露人性的罪恶和背离、无知和偏执，在基督救恩中引领人进入纯洁的、整全的团契决策中。圣灵生发真理、爱和团契；罗马书第五章 5 到 8 节中：“……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

[178] Raymond E. Brow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XIII-XXI):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vol. 29A, Anchor Yale Bible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43.

[179] 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 251-252。

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对应约翰福音的第十六到十七章，耶稣论到真理的圣灵乃他求父赐下时，他嘱咐门徒们“彼此相爱”；圣灵要把圣三一的契合关系贯彻到教会的圣徒团契中，正如保罗谈到教会的合一主题时，必然谈到“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林前 12：13，参弗 4：1—6）。

2、圣经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福音派注重圣经，灵恩派注重圣灵，两者应当平衡一下。”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这话的“圣经”概念与“圣灵”概念都被误解了，导致了两者被区分为两种可区别的明显类型。这话很有可能要说明福音派注重圣经的理性判断；而灵恩派注重人在经历圣灵所恩赐的各种超然的经验感受；但以圣经名义谈论部分经文及以望文生义总结出的判断准则不见得代表注重圣经，以圣灵的名义谈论人的超然经验感受及宣告预言性决策不意味就注重圣灵。不存在不注重圣经的注重圣灵，也不存在着不注重圣灵的注重圣经。上一节已经评论圣灵事工特征并非在超然感受和神秘经验中；圣灵恩赐重点不是在于人的愉悦和成功、或身体得医治及获得肉体的平安喜乐；圣灵事工的重点关乎真理、爱与契合，他是透过个人生命的重生去成就上帝国之群体性的使命。圣灵位格的本质、特征和引导策略全然公开的表明在圣经中了，因此基督徒依然要在圣经中去认识那位无比广博智慧的圣灵；任何基督徒的个人及宗派共同体不能以某些经验法门求得圣灵的优待特惠，圣灵位格及其作为的启示准则必然在圣经中——这本由圣徒群体所书写，由圣灵独特保守无误记载和教导圣徒群体的圣书。

灵恩运动倡导基督徒以生命的活力去与上帝位格不断发生亲密的关系（如迫切祷告，倾情敬拜赞美）是有益的，启发基督徒以生命的活力去诠释圣经的真实性。但灵恩运动的误区是从圣经中抽离出超然且作用于人性感受和直

觉的事件模式并以此定义圣灵；而明显忽略圣经真理的文本理论和人的悟性思考乃圣灵神圣恩赐的关键性指标之一，这是对圣灵、圣经和人性的分割性误解。卡尔·巴特以三种层面来理解上帝的道。他认为唯有基督才是上帝的道，圣经并非直接等同于上帝的道，而是“见证”或“象征”上帝的道，而教会作为信仰团契宣讲上帝的道；因此，大多批判者误判巴特诋毁了圣经作为上帝启示的惟一权威，事实上，巴特坚持认为，当上帝通过《圣经》这个见证说话时，《圣经》就成为上帝的启示；巴特并不把《圣经》的权威简约为人通过《圣经》中的事件而产生对上帝的主观感受。[180] 但巴特启示论的问题的确是以神本的基督中心论，去区分了基督与圣经文本的关系，正如教会中信徒从经验感受出发，去分化了圣灵与圣经的一样，而这种对引导者的误导性的区分必然带来教会信徒的决策偏颇。

圣经记载异教徒以各种占卜和通灵手段去捕捉神明的旨意，而那是上帝严厉禁止（参利 19：26，31；申 18：10-12；王下 17：17；赛 8：19）；上帝旨意已在整本圣经中显明了，人需要明白并愿意顺从。华尔基指出教会信徒热衷于以神秘方式去寻求神的旨意，是违背圣经教导，基督徒要明白上帝旨意，就是好好爱上帝并研读圣经。

> “我们需要重新界定寻求上帝旨意这个观念。我们要彻底摒弃占卜的想法，因为这对基督徒完全不适用，我们应重新建构我们的观念，集中注意圣经的教导，上帝是如何引导他所拣选的圣民去讨他的喜悦。”[181]

当然，基督徒也常有面对环境中不确定的决策时，就选哪种职业方向，选哪种教会服侍；选哪种生活环境等，圣经和圣灵如何引导我们进行决策呢？华尔基提出很有实用价值的五项决策的衡量法则：依据圣经、恩赐、能力、环

---

[180]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Alister E. McGrath），《基督教神学导论（第 5 版）》，赵城艺、石衡潭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36。

[181] 华尔基（B. K. Waltke），《寻求神的旨意：岂有此理（Finding the Will of God：A Pagan Notion？）》，顾荣翔译（香港：从心会社有限公司，2009），62。

境和整体方向来决定。[182] 在圣经中，上帝对在世信徒的生命旨意都显然的一一显明，并以历代圣徒在各种境遇中的遭遇来书写他们决策中的是与非，以他们为典范教导我们生活，任何处境中的情况分析、人性的善与恶的动机反思都能在圣经里找到对应的原则为指导；而在基督徒的工作和教会服侍，必然要按照上帝在自身的确当恩赐来选择；同时，基督徒领导者对人生的总体规划和前景建构，要成为一生的标竿。至于我们在世上的任何境遇，我们要明白上帝常以境遇训练他的子民的判断和耐心，人常会以易得式记忆来误判期待中的某些环境可以做成更大的事工，但那可能是我们的虚荣心作祟；或在被挫折和苦难情感的记忆的无意识引导下逃避艰难的挑战。人的决策中心在于事情的成与败；但《圣经》表明，上帝的决策在于人之所是；所有人的境遇与成败都要服务于人性的重新塑造。

《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他对人类及这世界的旨意都全然书写在其中，成为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准则；圣经表明上帝的本体、性情，他的公义审判和慈爱怜悯；他的创造、人的犯罪、耶稣基督的拯救，以及他的国度统治和终极更新。古德恩（Wayne Grudem）在其《系统神学》中论述圣经的四种特征：一是权威无误性；二是清晰性；三是必须性；四是充足性；他提出生命及生活的必要原则，都在圣经中准确无误的、清晰且充足的记载和教导出来了。[183] 但人需要以信心、谦卑和殷勤来学习、认知和顺从圣经中上帝的教导。

当基督徒的生命决策诉诸于某些无法理解的神秘权威时，很容易把对圣灵的无知转化为一种寻求圣灵引导的“占卜”行为，基督徒必须知道这种错误的严重性。教会信徒的决策并非在于灵异现象及其经验中的“圣灵”，而是在于圣经真理中的圣灵。

耶稣清楚谈到，圣灵工作的目的是荣耀基督、阐明真理（约16：14）。圣

[182] 华尔基，《寻求神的旨意：岂有此理》， 149-157。

[183] 古德恩（Wayne Grudem），《系统神学》，张麟至译（香港：更新传道会出版，2011），50-113。

灵与基督及其真理息息相关，上帝圣灵当然掌管超然领域并能够行神迹奇事，但那是按照他主权策略在某种情形下的显明，神迹奇事并非是圣灵引导人做出正确决策的媒介。唯有圣经才是三一上帝的话，这是基督教历代信条清楚表明的教义，更是圣经自身的明证（参提后3：16），“圣经的话语传递出上帝的话语”。[184] 尽管圣经的话语是被文字固定下来，但在今日依然充满活力的说话。在这变幻莫测、价值准则严重相对化的年代，圣经真理依然旗帜鲜明地指引着教会领导者做出坚定不变的教会决策。圣经作为上帝的话语，毫不过时的成为历代教会领导者的权威标准，是上帝子民行走时的明灯，是暗夜里照耀前程的光亮（参诗119：105；彼后1：19）。上帝的话临到摩西时，摩西的生命便做出全然更新的决策，他担负起全以色列的领导责任（出3：4—22），上帝的话临到以赛亚、耶利米、何西亚、约珥等先知时，他们就起来成为上帝的圣洁代言人，毕生侍奉上帝，按照上帝的旨意决策且行动；上帝的话是领导者最奇妙的导引。领导者的人生之所以充满浓厚的使命情怀，他们的品性、心志、都陶醉在上帝美好的旨意中，乃因他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路9：44）。基督徒俨然就是“圣书的子民”[185]，圣经是基督徒生命决策的源泉，是教会领导者任何决策时的引导。

基督徒领导者要做出正确决策，认识圣经真理是何其必要，我们能从圣经看到上帝在历史中引导的鲜明轨迹，圣经中每一段的记载，都显明上帝之美妙安排，为基督徒领导者提供人生决策的细致指南。罗伯·柯林顿（J. Robert Clinton）博士在他的著作《圣经与领导价值》中，以圣经研究整合了救赎故事和领导发展的时间线，他以上帝救赎和领导者的生命历程的关键点之

---

[184]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Alister E. McGrath），《基督教概论（第二版）》，孙毅、马树林、李洪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30。

[185] 谢大卫（David Lyle Jeffrey）以这提法作为主题，撰写了《圣书的子民》，李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其中精彩地表明了圣经在西方世界的深远影响力，及其无比的权威性。

两条主线，交织起来列出上帝引导领导者决策的方式。[186] 上帝是圣洁和公义的，他创造了人类，尽管人类犯罪悖逆了他，但他依然临到并救赎失丧的人。在幽暗中彷徨的人儿，无法寻索归回的去路，只有上帝，以“慈绳爱索”把他的子民牵引回来；上帝秉行公义，全然圣洁，他要洁净这群污秽的民众，籍基督救赎的功效和圣灵的大能更新人类与世界。罗伯．柯林顿以圣经人物作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侍奉者在一生的阶段呈现出来的转折点和情景契机，他从历史延展的分析、关键时机与回应模式三方面来研究圣经中的属灵人物蒙受引导并如何做出正确决策，其中，包括时间和空间下，上帝主权在个人身上的应用；属灵领袖在关键事件的决策时，所秉承的生命原则，以及其品格塑造的缘由，还有各种环境因素，人与事物的安排种种；他认为有来自上帝的圣经引导和人在情景中以生命原则作回应的决策之“双层肯定”是最好的明证。[187] 上帝以圣经来引导，教会领导者以决策来回应上帝，但在事件发生中，上帝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交织时，如何来破解人的自由与上帝主权的迷思呢？罗伯·柯林顿并没有提供答案，他为圣经中多样的人物故事做了规范化的模造，偏重结构化条理，因为其关注点在上帝所塑造的人之方面，而上帝的三一本质探讨也是决策的引导学更为重要的议题。

以上讨论的关键点是教会信徒对圣经启示的引导之模式化的理解。正因为有人从圣经中总结出生命决策的标准“教程”来，也就有另一端的方法，就是直觉的寻求圣灵的引导。费理申（Garry Friesen）建立了一整套以圣经为基础的智能模式，用一系列可操作的公式，教导基督徒在面对人生的关键时机时，按照这套公式进行决策。[188] 他的方式是明朗和清晰的，也是理性和合乎

[186] 罗伯·柯林顿（J. Robert Clinton），《圣经与圣经领导价值：圣经逐卷分析》，佘亚弘译，创欣神学院教牧学博士班阅读资料。

[187] J. Robert Clinton, *The Making of a Leader: Recongnizing the Lessons and Stages of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olorado Springs: Navpress,1988).181.

[188] Garry Friesen,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will of God*,（Portland:Multnomah,1980）.

圣经的，但却被批评为“自然神论的引导教义”，[189] 因为使用这套引导模式，上帝与人的深切且生动的关系被大大消减。圣经并不掩盖上帝圣灵在人性中的全方位的互动，圣灵让人得以信靠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假如没有整全的、深刻的理解圣经而谈论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一定会迷失在灵异或人之感性的云雾里；但是假如仅仅阅读圣经而感受不到圣灵深切的、活泼的在人的生命之作为，根本就无法打开圣经真理这扇通往上帝启示的引导之门。

华尔基提出信徒在决策时，要得到上帝的引导，就必须有一颗时刻朝向上帝的心，诚心地读经与祷告，最要紧的是培育自己内心的渴望与圣经的教导相符；让自己被塑造成为献给主使用的人生；让生命的每一个祷告与决策都与自己的信心相匹配，就是以上帝为中心；他引用列王纪上第十三章记载的故事，上帝吩咐一位犹大年轻先知到伯特利，宣判那地方的罪，然后回犹大去。耶和华明确命令他不可在那里吃饭喝水，要立即回犹大去。但年轻先知在还没回去的路上，遇到一位老先知欺骗他说是奉耶和华命令来带他去家里吃饭喝水时，他竟然按照老先知的话做了。因此年轻的先知遭受上帝严厉的惩罚。“如果上帝清楚吩咐你去作某事，不要因为别人告诉你不同的意见而不去尊崇。……上帝话语的权威，高过别人的权威。”[190] 基督徒领导者在任何的决策中，其最为有利的地位是可以明确目标和意义；就是来自上帝的话语之引导。假如没有圣言成为人生的原则，人生决策唯有在利益驱使下与境遇的不确定性进行博弈，充其量也就在相对良性和道德及法律的范畴中偶发同理心的单薄的群体精神；在这世界中，叫人何来强烈的渴望成为社会仁爱和道德的维护者呢？然而，教会领导者不再需要竭力去寻求未明的上帝的旨意，也不再需要追寻打开决策秘籍的法门；而是以最有爱的方式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那就是祷告，向他苦诉，与他欢语。生命决策的困难在于人性的内在分裂，且人性与外在境遇与物无法

---

[189] 巴刻（J. I. Packer）、凯奈斯（Carolyn Nystrom），《保守我、引导我：在抉择中明白神的旨意》，伊妙珍译（香港：天道，2010），305。

[190] 华尔基（B. K. Waltke），《寻求神的旨意：岂有此理（Finding the Will of God：A Pagan Notion？）》，顾荣翔译（香港：从心会社有限公司，2009），122。

达成互助与和谐；但回归圣三一的爱中，生命决策要被爱与和平的圣灵浇灌，以统一的理性与情感及感官管理着外在世界，并迈向和好的路径。如但丁在《神曲：天堂篇》中的圣歌：

> “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和圣灵！这美妙的歌声使我陶醉。如今我看到我眼前的景象，仿佛是整个宇宙披上笑容；所以我的听觉和视觉都使我陶醉。哦，喜悦！难以言表的欢乐啊！由爱与和平织成的生命啊！使人不生贪求之心的可靠的财富哟！”[191]

圣灵、圣经与圣教会

教会领导者的决策之引导来源于圣灵与圣经，但必然服侍于神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弗 1：12）；圣三一以全然的爱和全然的代价救赎罪人组成为教会团契，但正如无法保障的、问题多多的自我一样，在历史中的教会也是充满着问题多多的责难，基督却把大使命交付给教会，圣灵也在教会中感动圣徒们编辑了全然无误的《圣经》，成为众教会的信仰准则和最高权威。改革宗信条乃是经历过中世纪后期教会的阴暗面，为扬弃教会本身深受集体性偏误掺杂，而唯独高举圣经的权威：

> “我们仅接纳这些书为圣经，为正典，作为信仰的准则，基础，和印证；我们毫不疑惑它们内中所包含的，主因不在于教会将它们接纳批准了，而在于圣灵在我们心里证明它们是从上帝来的，而因此它们是不证自明的。”[192]

在罗马天主教的信条中，却是与新教针锋相对，强调圣经权威的同时，强调教会及其遗传：

> “圣经不像他书。它既由圣灵传授，便包含最重要的事，其中有许多是最困难和隐晦的。我们为求了解并说明这些事，总需要有这位圣灵“来临”；那便是需要祂的光照和恩典；而这些事，正如那君尊的诗篇作者所屡屡申言的，

---

[191] 主要引之中文译本，参英文版对中文翻译的字词略有修改，参但丁（Dante Alighieri），《神曲》，朱维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696。

[192] 第五条“圣经的尊荣和权威由何而来”，《比利时信条》；http://shu.kyhs.net/files/article/fulltext/0/301.html#6535，2019.9.12.

> 当用谦卑的祈祷寻求，并用圣洁的生活保守。……较早期争斗的主要对象，乃是那些依赖私人判断，弃绝神圣遗传和教会的施教权，并以圣经为启示惟一的源头和信仰最后的裁决之人。”[193]

今天的教会领导者必须站在更加久远的教会历史中去看待圣灵、圣经和圣教会的关系，新教吸取了教会群体依然可能腐败和决策错误的教训，对世上教会的权威存着戒备；而天主教把教会中的“圣遗传”与圣经相提并论，其概念和内涵应该是指圣经意义上那蒙受圣灵保守的由真圣徒在历代传统组成“教会”教导、诠释及传统。正如旧约中上帝拣选的圣徒延续于新约中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上帝启示的圣言上的记录、诠释和承传；这“圣遗传”当然也贯彻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圣徒生命在言传身教上对圣言的诠释和见证，就是教会里圣徒生命对圣言的正确传统。圣灵、圣经、圣教会以圣徒见证、教导及传统建构为整合的生命契合；新教弃绝传统乃是弃绝那些由教会之错误的政治权威对圣言扭曲的传统，就如新约某些法利赛传统对妥拉的扭曲一般，但新教之教会领导的决策在对传统和圣经之外的建制与圣经分别割裂出来时，圣经就被抽离出生命群体的建制和见证了，这导致纯粹个体与圣经或圣灵的独立交往，失去生命团契及传承的教会论及神学向度。作为新教信徒，我深信圣经是圣灵借助众圣徒的见证、传统和记录而特别保守的最高权威和惟一准则。我们深信圣经的固有的文本，确立为代表上帝整全无误的旨意的权威是必要合理的，因上帝向人启示的原则不能是含混和无定的，而是显要和固定的。但圣经并非成为一种毫无生命力的法条，乃来自于生命主的启示，其效用必然是在生命的活力中展现；圣经乃是圣灵在昔日、今日和将来与教会圣徒富有活力的生命指引。在基督徒的决策中，圣经启示真理在文本及产生的历史场景和内容的“固定”，就是上帝心意的不变性，而其诉诸于教会圣徒的生命故事、书写、传承、历代呈现之

---

[193] 罗马天主教利欧第十三在他教皇任内第十六年，即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颁布一道论圣经的研究通谕，拉丁原文名为 Providentis Simus Deus，第三十九节“论圣经的研究通谕”；http://shu.kyhs.net/files/article/fulltext/0/301.html#6544，2019.9.12。

多样性的神学诠释，正是让基督徒在今世的决策中保持谨慎、谦卑和追求的原因。假如圣经成为控制人生钟摆的发条，按照一成不变的规则左右人生决策。那人生是何其单调和无趣啊。

教会的神圣内涵之一是：圣遗传，与圣经作为上帝启示，形成两条互相辅助的天国之路：

> “圣遗传，名意即信仰的教理，上帝的律法，圣礼，和礼仪，由真相信并崇拜上帝的人用言语和榜样，一人传一人，一代传一代。……由于上帝的旨意，被信仰的圣遗传联合起来的各时代全体真信徒，组成为教会；这教会便是圣遗传稳妥之库，或如圣保罗所云：‘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194]

确当地说，圣经本身包含着神圣的历史性传统，圣灵默示圣徒书写圣经经卷也是在历史境遇中，在秉承圣徒知识传统的基础上的诠释、教导和见证。

> “那最古老最基本传播上帝启示的工具，乃是圣遗传。从亚当到摩西没有圣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用言语和榜样，而非用文字，将祂神圣的教理和律例，传授给门徒。当使徒们传布信仰，建立基督教会时，他们起先也照此方法去行。遗传是必须的，这从书本只对少数人有效，而遗传却对大家有效，更加显明出来。……为的是要更正确不变地将上帝的启示保存。在圣经中我们读到先知和使徒的话，恰如我们与他们一同活着，亲聆其言，虽然圣经中最晚的书也是在一千数百年前写成的。”[195]

在上帝对人的启示中，把《圣经》文本及其内容作为启示的绝对标准和唯一标准，恰如其分地抵御在世的教会群体借用政治权威产生的偏差在教会中滥觞，如若《圣经》的绝对性被强行与教会及其传统对立起来，《圣经》本身的团契内涵及其传统要素势必被抛弃了。《圣经》是圣灵启示的标准及标准生

[194] 在东正教取得权威信条地位的《非拉热（Philaret,1782-1867）信条》，http://shu.kyhs.net/files/article/fulltext/0/301.html#6543，2019.912.

[195] 在东正教取得权威信条地位的《非拉热（Philaret,1782-1867）信条》，http://shu.kyhs.net/files/article/fulltext/0/301.html#6543，2019.912.

命故事，圣灵必然要使用群体（教会）及文化传统在诠释圣经故事人物的是与非中，引导教会不断的认识错误，并做出正确决策。

因此，圣灵的启示是完善无误（圣经），但其必然要纳入有误向无误的教导及学习过程，这是动态的整合，是未来进入历史，而教会的历史又指向未来；是生命的完整对残缺的接纳而弥补残缺；是不洁因圣洁者的包含洁净而朝向圣洁；概念中就完美主义“洁癖”必然导致对非圣洁的粗暴厌弃，是错把未来终极的审判直接拉进救恩的进程中。教会领导者的决策要素必须在圣灵和圣经中富有充满力量的包容力和真理的征服力，分裂常常是人性决策的粗暴情感直觉的决断，不是来自真理的深刻判断。

在今日普遍的领导学偏向于人本和实用的情况下，回归上帝的本体认知是必要的。对于基督徒领导者蒙受引领并如何做出决策的研究中，上帝论和基督论必然成为圣经解读的要旨。基督徒领导者的决策到必然来源于圣灵在圣经中的言语；同时要更为确当地明白圣灵在圣经中话语的传达，必然需要谦卑的聆听历代教会的历代圣徒与圣灵在圣经中的互动声音；圣灵在教会及其传统中的领导力，就是任何教会领导者要认真对待的领导力，圣灵使用《圣经》中众圣徒成为圣经话语的表述角色，也让历代的圣徒成为圣经中表述角色的真活的传统，在历史中又真又活地沿袭。因此“我信圣灵”就是“我信圣徒相通。”是圣灵借着历史中的众圣徒以生命诠释了真理，书写了真理（《圣经》），并被真理（《圣经》）所书写。基督教会的领导者决策就在圣灵、圣经与教会中受引导而完成。

三、 决策本于圣三一与基督

教会领导者认识了圣灵和圣经在决策的决定性引导作用，也就是认识上帝的旨意在领导者生命里说形成的深远影响，在圣灵的默示和保守下，圣徒群体以生命的见证、知识和传统，书写无误的权威——圣经正典；圣经就成为历代教会的生命指导原则和生命典范，在同一位圣灵的感动下，教会圣徒依照圣

经指导的传统法则，围绕着圣经启示的上帝的旨意为准则形成不断延展的见证、知识和传承，这就是教会领导者决策的生命“契合”的源头；而这源头又进而指向生命的本体——圣三一上帝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1、圣三一

基督徒领导者决策之根本是认知生命之所是，创造主本身的实质和性情必要反映在他创造的生命里。人唯有认识造他的主并与其相交，生命决策才具有活力及意义。在上帝缺席的社会人类学里，人性没有根本的普遍意义存在，唯有经济消费和心理动机，人的决策科学仅是行为和效应方法之科学，决策研究便是一种技术性手段而已。但可悲的是，经济消费的技术性方法也成为教会领导决策的普遍方式，教会名义上是敬拜三一上帝，但教会领导决策的目标却基本朝向人的一方。教会中的讲道、祷告、引用圣经、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圣灵的感动，通通围绕信徒们生活中的实际，而教会决策的整体方向势必指向壮大人数和可量化的实力。威廉士和麦吉鹏(Benjamin D. Williams and Michael T. Mckibben)从三一论来发展基督教的领导学，他们尖锐的指出当今基督教领导学仅仅部分是基督教的，因为教会谈论的领导力过分偏向于人向上帝寻求帮助的方法论，他们提出基督徒的领导活动应该是真实地反映三一上帝生命的质素，那是一种本于圣三一的神圣性质，圣父是远象之源，圣子是实践的模范，圣灵激发热诚的信念和能力，三一上帝在自主和相爱中的关系也要贯彻在人性的个人和团体的领导中。[196] 可惜这本书主要是论述领导与组织，从三位一体出发谈论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与行政、规划和管理的关系，而缺乏从神学本质来论述圣三一的决策性。三一上帝论在圣经神学和教义神学的传统中有深厚的资源，但教会普遍仅在《使徒信经》的内容里进行崇拜例行吟诵，以及慕道班课程中的基本教义的公式，但缺乏化为生动和深切的真理内容进行反复教导，从教会

[196] Benjamin D. Williams and Michael T. Mckibben, *Oriented Leadership: Why All Christians Need It* (Wayne, N.J.: Orthodox Christian Publications Center,1994).

领导者到信徒普遍对圣三一的深远内涵是陌生的。其实，以三一上帝论的进路来探讨领导者之决策极为重要，因圣三一上帝就是决策的上帝。

基督徒领导者的任何决策必须转向圣三一——这主体；而非围绕着“我”要成就的事情，我的记忆、我的前景构想，甚至我的解经、我的恩赐、我的果效。人性对我的专注成为习惯时，哪怕是为真理的缘故，决策难免落在过分自信和各种偏执中。以禄 (Jacques Ellul)在诠释传道书的著作《存在的理由》中所言：

> 如果“我”是虚空的，那么主要问题不是我的救赎，而是把自己交托给那位（the one），他是一切，而且居住在所有人里面。这时，我可以扬弃一心只想自己，我阅读圣经的方法，立刻转变。我不能继续建构个人救赎的神学观念。重要的是这位他者，是不虚空的。我不能利用圣经来达成个人目的，而是尽量把自己从画面中移除，以便聆听和学习。这样，我可以听到从未进入人心、出我意料之外的事。这就是虚空原则可以带我们到达的地步。[197]

传道书的“虚空”观带来的自我否定的积极意义是从沉迷自己中解脱，朝向真正的真理实在，但不仅如此，当人瞩目于圣三一时，才发现在他那里有了全部的意义、全部的答案、全部有关生命决策的无穷奥妙。圣三一在创世和拯救的经世行动之决策是教会领导决策的根本，因人取于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人性的生命之所是——就是反映上帝的生命之所是。人性的真实必然追溯圣三一的本质。奥古斯丁以人之生命的要素比拟圣三一的关系，他确定人在万物中更靠近神，因人有上帝的形象。

> “确实，受造界里面以各种方式与上帝相似的东西不都可称作他的形象，惟有那只有上帝才比他高的人心，才可称作他的形象。惟有他才接受他的直接印迹，在他与它本身之间再没有隔着中间的本性。”[198]

---

[197] 以禄（J. Ellul），《存在的理由 : 从传道书看科技社会的虚空与盼望》， 孙芥石 & 郭秀娟译，（新北市: 校园.2017），119-120。

[198] 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94。

奥古斯丁以人性的意志与记忆来类比于圣三一的“三”与“一”；他提出意志（爱）乃作为圣三一中的“三”起契合作用，而记忆是圣三一的本质，以观察凝视在意志的爱中重新存留记忆本真。哪怕堕落犯罪的人性，也不能消除具有上帝形象的人性本质，“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创 9：6），但上帝的决策定意要叫人性终将被更新，人之原本破碎的“圣三一”的形象将被修补，将来的“圣三一”形象要被建构；“作为事实，那还未存在的三位一体并不比这将不存在的三位一体更堪称神的形象。我们得在人的灵魂中即在理性的或理智的灵魂中发现的，乃是创造主的形象，他不朽地扎根在灵魂的不朽中。”[199] 托马斯·阿奎那追随奥古斯丁的思想，他谈论到：“灵魂由于恩典而被造得像上帝那样。因此，为使上帝的位格藉恩典而差遣给任何一个人，在灵魂与被差遣的上帝位格之间，由于某种恩典的赠品，就必定有一种类似。”[200]

奥古斯丁的人性内在的三一论是对上帝圣三一的类比，使三一论在上帝与人之间架设通达的桥梁，尽管从当代精神心理学及生理功能学来说，人内在的划分及功能不一定对应于神学的人性论概念，但人的思想决策机能依然可以合理的诉诸于这些神学描述。圣三一的神圣启示在作为人的决策机制中也依然可以发挥贴切的指导意义。“心灵的这个三位一体并不是因为心灵记得、理解并爱它自己才真是上帝的形象，而是因为他也能够记忆、理解并爱那创造了他的上帝。”[201] 经典三一论非常注重圣三一实体中的“一”，尤其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他们以人性中的内在本质要素来类比三一的关系，这极为重要的提示人性向圣三一内在关系的爱的统一向往。

教会领导决策就是来自于圣三一的从内到外的决策，圣经启示中的创造到终末，圣三一上帝、世界与人，这是有秩序规则且富有充分活泼关系的结构，

---

[199] 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372—373。

[200]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 <第一集 论上帝>》，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50。

[201] 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376。

宇宙中所有一切秩序、法则、目的和活力，乃圣三一内在本源之于外的决策呈现。“每一种可见的受造物都是展示整个三位一体的一个外观。”[202] 当然，圣三一位格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的人格之间关系无法比拟，“三位一体的共契统一性与人类的共契统一性之间存在着天渊之别，在三位一体中，这是同一个本质中的统一性，而不仅是不同存在之间的共契。”[203] 但圣三一之独一主体性正是人之生命主体性的根源，其决策亦然，圣三一以独一真神的主体宣告了决策原则性的惟一而非多元性混合或互相妥协的结果。

古教父亚他那修（Athanasius）谈到圣三一在本质上是全然的“一”，圣父对圣子和圣灵的差遣，是本质上的全然传递，三者绝没有本质上的不等和差异，差遣并不会导致本质上的消减或损失，圣父、圣子和圣灵就如光源、光线和光亮。[204] 对于亚他那修的三一论来说，圣三一是不可分割的行动统一，圣子的意志就是圣父的意志，圣子在圣父中，圣子的全部存在都适应于圣父的本质。

> “他说了，事物就被造了”……不像人类，如下层的工人一样，听到并知晓上帝的意志之后才能去做。这是适应于受造物的，但这样不适应于道想与做的方式……道自身工作和创造的时候没有问和答，因为父在道中，道在父中。[205]

人生决策及其世界观之惟一源头乃是圣三一之不可混淆的独一性，当是圣经中一再宣称的原则：敬拜独一真神。

> 对《圣经》中的上帝藉耶稣基督的历史的自我启示中所包含的上帝理解借助对上帝在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元性中的唯一性的讨论而毕竟完成了。因为超出唯一性，关于上

---

[202]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 <第一集 论上帝>》， 255。

[203] 卡斯培（Walter Kasper），《现代语境中的上帝观念》，罗选民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57。

[204] 光的类比是亚他那修最为典型的三一论类比，参 Athanasius，“Four Discourses Against the Arians”，tran，J. H. Newman & A. Robertson，*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vol. 9*（Grand Rapids：Eerdmans，1957）， 313、315、364-366。

[205] Athanasius, *“Four Discourse against the Arians”*, trans. J. H. Newman & Robertson, Nicen and Post-Nicene Fathers, vol.4(Grand Rapids: Eerdmans,1957),discourse 3, section 3,365.

> 帝就不能说什么。……对于基督教的三一信仰来说，仅仅事关属神统一性的具体的、在自身中说区分的生命。这样，三一论实际上是“具体的一神论”，与独一上帝的一种抽象的彼岸性的观念和属神统一性的一种抽象的、从他排除任何多元性的观念有别，由于从者，独一的上帝实际上成为此岸世界和有限者的多元性的纯然相关物。[206]

但是，圣三一之父、子、圣灵之所以成为圣经中可指称的位格，必然有其独立的特征，当然上帝位格不能以人性位格来类同（人的位格之有限和有罪的败坏和残缺），三一上帝的位格必然是自由和完满，其充分独立性并不折损圣三一之绝对实体的“一”，假如必须把三一上帝的独一性看成不能体现于自由独立的位格，反而损害了“独一实体”之完全和“三位格”的完全。

> “我与父原为一”（约 10：30）；

>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作的事信我。”（约 14：10、11）

在福音书记述耶稣的宣讲中，他重复与父、及圣灵的神圣秩序关系。释经学者从语言学角度论证约翰以律法传统谈论耶稣基督乃具有天父上帝在地上的全然代理者的合法身份，不仅如此，这种身份的关联加深到了“同一身份”的高度；约翰福音描述耶稣不断表明他只说父所吩咐他的，或教导他所说的，“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约 8：28；参 12:49-50，17：4），耶稣的整个事奉，言行，都被称为他父所要做的“工”。[207] 对独一真神的认识绝不能演化为三神论，但圣三一理解为没有协议的惟一心智的决策，那就又陷入“形态论”异端中了，也很难理解福音书中那些三一互动的启示，“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

[206] 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系统神学（一）》，李秋零译（香港：道风书社，2013），442。

[207] Raymond E. Brow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XIII-XXI):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vol. 29A, Anchor Yale Bible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32–633.

14：16），圣三一中有超乎凡人关系的合一关系，是同为一上帝的关系；但若把圣三一作为一个本性位格的不同方面表现，必然违反了三一论的圣经和经典教义的三一论原则，圣三一位格间的爱及共联性并不要与独一性矛盾起来看待。

> “爱是在三一诸位格的相互关系中显现出来的权能，按照《约翰一书》四章 8 节和 16 节，与属神的本质是一回事。……‘上帝是个灵’和‘上帝就是爱’这两种说法表示本质的同一种统一性，圣父、圣子、圣灵藉着这种统一性而结合成为独一上帝的共联性”[208]

《圣经》中的旧约部分，圣三一的描述虽不明显，但上帝的关系性启示已经充满在创造和救恩的历史进程中。内在的圣三一是完美的共契与自我合一，这内在的主体决策以弥赛亚救主的救恩和圣灵充满倾注到选民群体中，而经世的三一的秩序正是内在三一统一体的决策所然，两者不可分割开来看待。“本性的秩序所意指的并不是对本性本身的安排，而是就本性根源而言的上帝位格中的秩序存在。……根源的秩序之被称作本性的秩序要比称作本质的秩序更恰当些。”[209] 因此，圣三一不存在位格的等次之分，不存在自我内部的分裂，不存在记忆偏执及时序的不可预测感，圣子对圣父的顺服是圣三一决策的真理统一性和位分统一性的结果。

> “圣子并不是在存有论上低下的意义上附属于圣父，但他自己服从圣父。他在这一点上自己永恒地是圣父的惟一神格的位置。在这里，他是通过圣灵与圣父为一。圣父的惟一神格不是三个位格共同作用的前提条件，而是结果。他是他们的统一性的标志。”[210]

上帝的统一性成为圣父的决策本源，并在三位格的爱中达至统一，上帝创造世界的决策是上帝自身向外多么富有创意的流出，但上帝创造时，他也内在地自己行动，献上自己、决定自己。[211] 莫尔特曼认为上帝的无限性恰恰是

---

[208] 潘能伯格，《系统神学（一）》，566。

[209] 托马斯 • 阿奎那，《神学大全 <第一集 论上帝>》， 232-233。

[210] 潘能伯格，《系统神学（一）》， 428。

[211] J. Moltmann, *God in creation : An ecological doctrine of creation* (Gifford lectures ; 1984-1985),（ London: SCM Press，1985），86.

在上帝的自我中为有限留出空间，就是使这有限世界存在，退让自我的上帝却是全然的显明他自己，并把他的爱浇灌给受造的人和受造世界。创造与拯救的上帝决策就是在爱与契合的彼此关系中启示出来，叫人无法推诿。

> “爱的思想使得有可能来设想上帝本质与上帝此在的统一性，并如此也设想内在三一和经世三一在其特有的结构和论证中的统一性。这是自于，属神的爱的思想在自己那方面表现为三一地建构的，以致上帝的三一生命能够被设想为他的爱展开。另一方面，它允许把上帝与世界的关系设想为根据在上帝的。”[212]

从三一上帝的内在结构到外显经世的事工，爱作为统一性展开于创造与救恩中，这可以说是上帝从内之于外的决策特征。但在世之有罪的人生决策里，显然反映出生命及世界中的种种分裂，有限理性产生过度自信和价值判断的偏差，情感欲望与道德准则的冲突，经验感受对记忆和预期的误导，理想在社会境遇中失落。自我内在的统一是人生决策的基础，人性中情感记忆、理性判断、前景预期，以及社会境遇等，都必须重新统一起来，自我认知必须建立在正确的记忆中，而非在破碎的情感片段；上帝启示的圣徒集中记忆，人性及世界的真相，未来必成的终极标竿，一一构建成整全统一的生命决策工程，这是从圣三一的统一原则性所启示。但独一真神的统一性并非是僵化的封闭体系，而是活泼能动的生命之爱。

拿先斯的贵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从另一角度论证圣三一的位格独特性，他从上帝名字的意义谈起，他在与摩西相遇的山上，当摩西询问他的名字时，上帝启示摩西的迹象及名字的意义，从词源学的说法，是来自于“奔跑”或“燃烧”的单词——这包涵一种持续不断的运动和吞噬邪恶的品质，上帝被称为“吞噬之火”；同时，上帝名字是包含一种关系的，而不是绝对自我封闭的，就如“主”这个词，是与服侍者的关系而被赋以意义；圣子被称为“儿子”，是因为他不仅在本质上与父亲是等同的，而且根源于他；他与父亲

[212] 潘能伯格，《系统神学（一）》， 592。

的关系就像话语与心灵的关系一样，是通过关系中涉及的联系和宣告功能，儿子是对父亲本性的简明而简单的揭示，所生的一切都是对其父母的一种默示的定义。[213] 圣三一的位格关系不仅在于同一本质的“一”中，也是在于“团契”的“一”中，因为位格间的团契，“一”才能包涵了爱与活力。

东正教神学家约翰薛斯奥拿（John Zizioulas）在二十世纪重申圣三一中位格团契在教会中何其重要的意义，他提出人类的社会关系都是教会的潜在群体形象，是为了教会而存在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形象，是由于上帝而存在，是上帝在地上存有的方式，教会的群体性团契，就是一种向世界、向他者，展现其与上帝的“团契”关系及其“相通”的事件，教会的事实就是作为团契中的“实体”。[214] 他认为三一论必须打破希腊化的“一元论”特征，位格的存在是在尊重彼此的独特性且彼此关联中才具有意义，“位格”不应该成为形态论的不同的“面具”，而是具有其不同的内涵和实在，这种位格关系才是富有灵动的活力的圣三一彰显。圣三一的“三”是上帝的本质特征，而并非把“三”附加给“一”，那么其中的“一”就成为第四种本质的可能性了；在圣三一之外没有上帝，认识上帝的本性就是认识位格之间的关系在福音书中的启示，以及圣三一的爱与和平向人表明了出来。莫尔特曼提出受造世界及其人类便成为圣三一中爱的对象，上帝是爱，上帝的旨意不是在永恒中位格间“自爱”自乐而已，而是要把他丰满的爱向受造中传递，因为无私是爱的本质之一。[215]

在圣三一上帝从内在到外显的实在中，他绝非仅仅静止不动，而是丰满且富有活力，他可以全能的能力向自我舍己和限制，但又不至于失去任何，他也在内在中达至可分别的有秩序的爱，形成圣三一的共契决策。同时，圣三一

---

[213] Gregory of Nazianzus，*On God and Christ: The Five Theological Orations and Two Letters to Cledonius orations*，Tran. F. Williams & L. Wickham（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e，2002） 107-112.

[214] J. Zizioulas & J. Meyendorff，*Being as communion : Studies in personhood and the church* (Contemporary Greek theologians ; no. 4)，（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1985），15.

[215] J.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 The doctrine of God*（ London: SCM Press，1981），138.

的共契在其创造的时空中不被过程束缚，但能进入过程中，一切都是那么美善和真切。如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表明的上帝观念，上帝能够降到人类最卑微的位置就是上帝大能的彰显，这比上帝能做雄伟壮丽的事情更能高超地证明上帝的力量；这种力量不被与其属性相反的环境所束缚。[216] 圣三一的拯救决策表明：在基督里的救赎大功把大能与软弱，有限与无限达到一种统一，一切被罪恶割裂的、损失的、破碎的，都被圣三一的完满和权能更新了。这种救赎决策源来于圣三一位格间亲密无间的爱的关系，其关联活动是以差遣与顺服、交付与委身、荣耀与与承认交互拥有。

> “三一诸位格的每一个都以绽出的方式与另外两个位格的一个或两个相关联，并在与别的位格的这种关系中拥有其位格特性，拥有其自身。圣父之在与圣子的关系中、在生出和差遣圣子时是圣父，圣子只在对圣父差遣的顺从中是圣子，这顺从就包含着对他是圣父的承认。圣灵只是在圣子中荣耀圣父和荣耀圣子为受圣父差遣者，才作为圣灵是实质的。位格之间的关系对于他们是位格来说是根本性的。”[217]

因此，教会领导团队的决策达成契合，诚然要向圣三一的内在契合习得决策的智慧泉源，保罗就以身体中的肢体来表征在基督与圣灵里的爱与契合：

>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林前 12：12-27）

信徒与教会的关系被保罗比拟为肢体与身体的关系，显出在教会中之人际的不可分裂，教会中信徒团契的统一性与人格的统一性有必然的共通原则，正如奥古斯丁在圣三一的光照下论述人格内在三大要素的特质和整合：

---

[216] Gregory of Nyssa，“An Address in Religious Instruction”，trans. C. Richardson，in Edward Hardy ed. *Christology of the Later Fathers*（Philadelphia: Westminster，1954），300-301.

[217] 潘能伯格，《系统神学（一）》， 567。

> 这三者虽然在人性身体成为整体，但在其叙述中分明被赋以独立的个体特质，在将来，我们将通过回忆来观察信仰留藏在记忆中的痕迹印象，并通过意志这个第三因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即记忆所保留之物与由此印在思想注意力上的东西。[218]

圣经中之于信徒生命关系的决策教导也诉诸于上帝本身的性质，“……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上帝必常与你们同在。”（林后13：11）“和睦”与“和平”在希腊文中常指向群体关系中没有战争的友爱；[219]这种关系上的爱必然要在思想和判断上成为彼此同意的决策，就如上帝的“爱”与“和平”一样。三位一体内的各种关系正是通过三位一体的形象表现在地上的层次，而非三位一体的构成的层次，正如三位一体中的三个位格是以完全独特的方式“合一”的，同样地，人类在他们彼此的个人团契中也是 三位一体的形象。[220]因为圣灵是爱，灵魂也就由于上帝之爱的赠品而类似于圣灵。因此，圣灵的差遣所根据的也就是上帝之爱的样式。然而，圣子也就是“道”，不是任何种类的道，而是上帝给予的道。……圣子之被差遣，所根据的并不是任何一种理智的完满性，而是闯入爱的情感之中的理智的照明。[221]圣三一的互相内住且互爱的呈现，让人性找到自我身份的决策本质；在人与自我的和好上需要来自圣三一的救恩和重塑；人常抛开理智以下意识的直觉去做出选择，人性的肉体欲望常在损坏身心灵的健康；当理智与情感好不容易理清思路且在心里暗下决心时，可意志上却疲缓无力，毫无作为。圣三一的自我舍弃就是其自我建造，其自我发出就是自我供给；但对于在世上有罪的人，无法达至这般爱的能力和爱的策略。因此，我们的生命决策才显得那么无法把握和

---

[218] 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372。

[219] Moisés Silva, e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4), 111.

[220] 莫尔特曼（J. Moltmann），《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苏资贵、宋炳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1999），326。

[221] 托马斯 • 阿奎那，《神学大全 <第一集 论上帝>》，251。

支离破碎；人生演变为一场赌局，圣三一的真理、爱、确定性和契合，必然教导重生的教会领导者对本质的追求。

莫尔特曼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吸取三一论辩证学说的养分来论述在圣三一中的爱与受苦。因此，“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神学导向相应的人类学，上帝在悲情强烈参与人的生命经验，上帝的悲情是他与创世、选民和历史的自由关系的悲情。因这爱的关切，上帝将自己的存在转变成他与人的关系和盟约的历史。比较犹太神学的神——人之二极的神学，莫尔特曼提出基督神学是在三位一体中，只有在基督身上并且通过基督，人与上帝的关系才能展开，通过基督，人被无限度、 无条件地接纳到上帝的生命与受难、死亡与复活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人排斥在圣父之哀、圣子之爱与圣灵充满的上帝情境之外。[222] “没有相通，位格便不能存在；但每种否定或压抑位格的相通形式，都是不容许的。”[223] 因此，圣三一的决策在耶稣基督之道成肉身的救赎事工中贯彻到人类与世界中，教人在混沌的人生迷茫中豁然开朗，人生决策不再以短暂性的情感记忆为基准，不再被毫无价值的价值欲望所驱使，不再昼夜算计逃避人生的陷阱；而是笃定的进入上帝创造中的安息，让不被经济行为学称为决策科学的神学本体论成为真正的决策。沃夫在考证莫尔特曼等神学家的三一论中，体悟圣三一的位格不能仅仅简化为关系，关系之爱的重要性并不能消化了位格的独特性；神圣位格的独特主体性恰恰从其它位格的独特主体性中决定自我的独特身份，并成为彼此相合相融的关系基础，因此，圣父作为神性的根源，他差遣圣子，而圣子不仅“从父而出”，也要“回到父那里去”，他凡事顺服父，同时，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又荣耀父的儿子”（约 13：1 以下，17：1）；可见内在的圣三一和经世的圣三一构成了互相托付的双边关系，不存在

[222] 这神学思想贯穿在他的代表作《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全书之中，Jurgen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Vendor: Fortress Press, 2015）.

[223] John ZiZioulas，*Being as Conmmunion：Studies in Personhood and the Church*，18

任何等级制，而是全然平等互爱的契合。[224]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尽管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这句话是在整段有关是与非、爱与恨、善与恶的强烈对比论述中所表达的，但耶稣把信守真理的原则性推到不可妥协的高峰，就是人必须要与创造主一样“完全”，路加且用上帝的性情来表达：“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路 6：36），马太提出人像天父的完全显然是人已经成为天父的儿女（太 5：45）；“完全”的含义是“整体、全部”，表明人全心全意的与上帝认同，绝不能有丝毫妥协。[225] 显然，这人生决策准则可追溯到申命记：“你要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作完全人。”（申 18：13），基督徒领导者没有任何理由不做出全然学像上帝的决策。

人性的决策是因人乃上帝的受造，人在自我管理中又面对外在境遇的管理；但人在罪恶中承受的是自我分裂、及面临外部世界之支离破碎的偏差决策，是不确定的危机决策。圣三一上帝就是决策的上帝，是独一上帝的决策，没有任何自我分裂，没有缺失知识的情感；他的旨意的贯彻是在丰满的智慧的爱中的直觉。是内在的崇高的和平统一体。而圣三一的内在实在，不仅要反映在人性的本质上，也要反映在被造的内容中，这是天堂的真相：“那是纯粹光明的天，那是充满着爱的理智的光明，那是充满着欢喜的真善之爱，那是超越了一切甜蜜的欢愉。”[226] 从三一上帝的位格特征来说，人性亦有显然的自由和个体特征；从三一上帝属性互相拥抱和互爱的情形说来，群体契合的爱的关联亦能直探神圣本质的源头。对于上帝之本体的研究，乃极其深邃的教义，神性中位格的分别和关联，如何应用于教会领导决策的功用上呢？这是艰难且值得的挑战，上帝与人之间在本质上的区别也是必然的，领导学中群体关系在本质上

[224] 沃夫（M. Volf），《拥抱神学：有关身分认同, 异己性与和解的神学探讨》，王湘琪译（台北: 校园，2007），292。

[225] John Nolland, *The Gospel of Matthew: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Carlisle: W.B. Eerdmans; Paternoster Press, 2005), 271.

[226] 主要引之中文译本，参英文版对中文翻译的字词略有修改，参但丁，《神曲》，朱维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722。

也很难来比拟三一上帝位格的关系。虽然，有关三一上帝论的诸多神学要义能引导领导决策的方向和行动，但毕竟那崇高的神性和人性之间依然需要启示的桥梁——那就是基督论了，这就是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在《基督何以成为人？》中谈论到基督中保职分的时候，基督在上帝与人之间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227]

2、基督

教会领导决策要深谙圣三一本质之真理，必然要认识人与上帝之间惟一的中保——基督。巴特谈到基督在三位一体中的独特一面时，先提出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必然是永恒存在和绝对合一，但也不能轻忽三者的区别；巴特接着表明圣经是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乃是基督耶稣让上帝的灵运行于教会中；因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上帝的第二种存在模式，是神性本体能以启示的实存和主体。[228] 诚然如此，基督徒领导者唯有透过认识耶稣基督才能真正看到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显明，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救恩的功效，教会领导者才能明白生命真理，才具有正确决策的能力。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约 14：6-7），福音书记述基督预告他即将面临的十架之死时，他向门徒显明他的人生决策，他要赶赴死亡，但那不是毁灭，而是往天父那里去的路径，跟随他的门徒必须要具备刚强和耐心来忍受与基督的分离时刻，因此，他们就必与基督同享荣耀。基督表明：除他以外，没有人可以通达永生之道。加尔文提到基督是最伟大的领导者，他伸出手来牵引迷途者，俯身怀抱吃奶的婴孩，他分享真理，叫人享受救恩的果实；他是真道，成就了信心的完全，他是道路，是人生的最起初的根本，也是人生的目的；“人若离弃基督，就必行事失迷；

---

[227] St Anselm: *Basic Writings*, tran. S. N. Deane(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72).

[228]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Part 2, trans, G. T. Thomson and Harold Knigh (Edinburgh: T. & T. Clark,1956),151.

人若不仰赖基督，在他处寻找喂养，人生只能是一场虚妄；如果人不在基督里得到满足，偏行己路，终必走向死亡而非生命。”[229] 做为通往上帝的生命之道的基督，他以最为奇妙的决策突破人与上帝的隔绝，上帝藉着肉身到人面前，藉着真理揭露虚谎的人，唯有他是世间最真实的人，他的死与复活，他的生命之道都是最为真实的。[230]

所有犯罪堕落的人，人生决策的赌注，无论输赢，都是倾注着逝去的生命，倾注生命的时光和所有，收取的仅是喜与悲的暂时的情感。但对于基督启示的创造者形象，却在舍己中拥有，消逝时复生，这就是基督所显明的上帝“自我实施”的决策，腓立比书的基督颂歌中，基督的虚己（腓 2：7—8）并非倒空其神性，恰是证明其全然的神性之真实丰满。

> 永恒的子与成为人相结合的外化和卑微就可以被理解为他的永恒存在于与父的自我区分中的自由自我实施的一个要素。在这里，通过这样的是子的自我实施，同时有造物达到在与上帝的共联性中的真正的独立性的规定得以完成，而且人摆脱了他对上帝独立化的失误，并从由此产生的对朽坏和死的势力的臣服中释放出来。[231]

道成肉身不仅是圣子的自由生命所是之行动决策，也是对于人的救赎之有效决策；“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 18：10）圣子的生命使命绝非一时兴起的情感直觉的冲动，而是从创始以前就谋算的理性计划。

人生决策的谬误是源于人性本质的失落，个人及群体之决策的陷阱、风险、不一致性皆因人并不了解人性本身。基督成为肉身的事实正要揭示人性的

[229] John Calvin and William Pringle,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vol. 2 (Bellingham, WA: Logos Bible Software, 2010), 84–85.

[230] Augustine of Hippo, “Lectures or Tractates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in *St. Augustin: Homilies on the Gospel of John, Homilies on the First Epistle of John, Soliloquies*, ed. Philip Schaff, trans. John Gibb and James Innes, vol. 7, A Select Library of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First Series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Company, 1888), 325.

[231] 潘能伯格（W. Pannenberg），《系统神学（卷二）》，李秋零译（香港：道风书社，2013），431-432。

真理；艾力克森（M.J. Erickson）提出道成肉身的基本原则时，谈到我们常用我们人性的经验去理解耶稣的人性，显然错误的；因为现实的人性观念是源自于在世人性经验对存在的人性（existential）的知识，而不是基本的（essential）的人性；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性不是有罪者及群体归纳总结出来的人性所能比拟的，世间任何人都是亚当夏娃堕落后的罪人，但耶稣基督是无罪的真人，唯有他才是富有完全的人性。[232] 耶稣基督不仅揭示人性的实质，也要揭示人性在世界上生存的苦难因由；他诚然参与到罪人的感受中，并担当众人的苦罪；“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罗 8：3），这里保罗强调耶稣并非浅浅地经验人性善好一面，圣子道成肉身乃进入人类处境的充分参与；“罪身的形状”深切描述基督为完成他的工作而进入人性的罪恶领域，这词汇表达耶稣并非表面与罪人认同，而是深切且真实的参与；但是不能解读为基督也是罪人，在罪恶的奴役困锁中，有罪者显然是无法成就“赎罪祭”的功效；耶稣使律法在对付罪上失效的肉体，从内在实质上被征服了。[233] 因此，我们的主耶稣“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来 4：15，“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来 2：17、18）。他参与到破碎残缺的人性经验中，为了教人生决策者洞察生活中的苦罪，并如何从其中得以解救。

尽管这世界充斥罪恶和悲哀，但人类依然满有指望；“上帝对世界的爱并没有从实在中撤回到远离世界的高贵灵魂中去，而是最严酷地体验和承受着世界的实在。世界在耶稣基督的肉身上肆虐，但这位受酷刑者饶恕了世界的罪孽。和好就这样产生了。”[234] 基督以和好者的形象屹立于上帝和世界间，充

---

[232] 艾力克森（M. J. Erickson），《基督教神学 (增订本)卷二》，郭俊豪, 李清义译（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2000），396。

[233] Douglas J. Moo,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 ed. Ned B. Stonehouse et al., Second Editi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502–503.

[234] 朋霍费尔，《伦理学》，61。

实全部的历史，基督逆转人在“分别善恶”事件后之自以为是的判断，基督担当人性的罪恶凌辱并宣告人性无罪。艾力克森（M. J. Erickson）论述基督的死的赎罪为五要义：为信徒完全榜样和形态；展现上帝伟大的爱；强调人之罪的严重性和上帝严厉的公义；得胜罪和死的权势，叫人得自由；为信徒的罪向上帝补赎。[235] 耶稣基督全面解开人性和世界的真相，三一上帝的公义审判在终极处面向历史时空吹响号筒，基督耶稣亲历苦难和十字架的拯救，罪与死的权势即要倾倒，教会领导者必要全然参与到基督国度的呼召中去，这是无可推卸的决策。

“在耶稣的团契中，人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经历到上帝国，而且这种经历不是暂时的也不是模棱两可的，而是像病得医治，罪人被接纳，迷途者被寻获一般具体。……‘你们要 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句话既真实又可行。”[236] 在耶稣团契中，基督徒领导者经历了上帝的能力，成为“建造上帝国的同工”，像耶稣一样经营弥赛亚的事工。当然，在作为上帝的耶稣身上，他不仅从人性上与我们认同，而是在整全的神性上完成救赎的工作，他和人一样经历饥饿、痛疼，但人性常在这些经验中扭曲了人性的正确决策，唯有他依然坚定遵守上帝的旨意，唯有他带来对罪人的救赎功效。唯有他通过自己的哭泣和恐惧克服了我们的哭泣和恐惧。[237] 基督走进被压抑者及被离弃者的中间，为要成为被压抑者及被离弃者的弟兄，并将上帝国带给他们。祂并非透过超自然的神迹来帮助他们，而是透过祂的苦难，透过祂的伤痕。……上帝最先总是透过祂的受苦来帮助我们：‘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诗 139： 8 ）因此，没有任何的痛苦能够讓我们和这位一同受苦的上帝的团契分离。耶稣基督的上帝是那位和受难者与牺牲者生死与共的上帝。[238]

---

[235] 艾力克森，《基督教神学 (增订本)卷二》，482。

[236] 莫尔特曼（J. Moltmann），《当代的基督》，曾念粤译（台北：雅歌出版社，1998），25。

[237] Athanasius，“Four Discourses Against the Arians”，tran，J. H. Newman & A. Robertson，*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vol. 4（Grand Rapids：Eerdmans，1957）， 424.

[238] 莫尔特曼，《当代的基督》， 42—43。

“以自己回答不信，以爱回答仇恨，以圣徒回答罪人。”[239] 生命要重新寻回生命，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林后 5：17）。这就是朋霍费尔《伦理学》人性论的核心：有罪的人及团体必须与基督“同形塑造”，生命决策才有彻底的更新。人性的“同形塑造”乃进入基督的道成肉身、被钉十架和复活中；“同形塑造”并非只是遵循教条的道德规范，并非只是理性和情感的统一和升华；并非仅仅意志上受磨练，而是生命认识自我，认识一个有罪的人在有罪的团体中；被公义审判取死的罪人，唯有仰赖复活主的大能，生命才能得以更新。“真实的人、被判决和被更新的人，只能在耶稣基督的形象中，也只能在耶稣基督的同形塑造中。”[240] 若不是上帝成为人，所有关于人的思考便是无结果的抽象，人把自己充当创造者、法官和更新者，人性本质依然脱离原本的形象（基督）；因此，人要彻底的认罪，认罪是源自自我及团体的瓦解和衰败的集体记忆，并与真正的自我形象（基督）产生共融，人在基督里被塑造，就是要面对十字架的审判，审判不仅觉察并承认自己全部的罪；而是深刻认识到自己在亚当里对整体犯有过错；这样，人才被称义而更新，生命决策真正生发效用，与基督“同形塑造”的人便要在基督身体——教会中完成在世使命，个别的人与教会的大我合而为一，因“教会不仅是认罪的地点……唯独教会才能够是个人和团体再生和更新的地点。”[241]。当基督徒之神圣群体真正见证“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时，这世界必然要得生命的益处，显明上帝之和平统治。

> 人是教会的一位成员，从这个事实来看，他成为“上帝的形象”，他存在就象上帝自己存在一样，他呈现出上帝“存有的方式”（way of being）。这存有的方式…… 是一种与世界、与其他人和與上帝间的关系方式，是一件相

[239] 朋霍费尔，《伦理学》，61。
[240] 朋霍费尔，《伦理学》，97。
[241] 朋霍费尔，《伦理学》，98。

通的事件；他不能作为个体的成就来得以实现，只能作为
教会的事实。[242]

约翰•薛斯奥拿（John ZiZioulas）提出人性的位格在犯罪后堕落为抵抗相通关系的矛盾中，这是一种“生物性”的存有，人性唯有透过皈依教会，才能得到真正位格的存有。人与神恢复关系决定着人与世界恢复正确的关系。

朋霍费尔的人性论为生命决策提供深刻且简要的法则，就是按照人性的根本原型（基督）来塑造本来的我。“由道成肉身我们认识到上帝对造物的爱；由钉十字架认识到上帝对所有肉身的审判；由复活认识到上帝要有一个新世界的意志。”[243] 基督教的人性论把生命决策中繁杂之自利得失因素剔除了，把人与团体的冲突、人与境遇的矛盾化解了，人被重塑为崇高有爱的新人。生命只要毫不犹豫的做出惟一决策，就是在人生中信服并遵守上帝的终极之言，人的知识、理性与情怀，都因信基督而更新，“在称义过程中，一切被赠送给人，但只有信才能带来称义；在人同基督的遭遇中，基督所是和所有的一切被赠送给人，但使我称义的，唯独基督之所有，永远不会是我之所有。”[244] 生命的益处在于崇高的神圣实在者，在于生命本身；“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太 16：26）。

盼望并非针对另外一个世界，而是针对这个世界的得赎。复活不仅在圣灵中被期待，而且已经被经历。……我们透过活 泼的盼望的重生而经历到复活。我们在爱里面就已经苏醒过来，透过爱我们经历到复活。“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 有自由”〈林后 3： 17〉透过这种释放，我们经历到复活。[245] 他被称为“智慧”，是关于上帝与人的知识；他是“力量”，因为他是维持他的创造物的东西，并赋予它们维持自身的力量。他是“真理”，因为真理是一个整体，而谬误是一个分裂的综合体，因为他是纯洁无瑕的印章，所以他给天父留

[242] John ZiZioulas，*Being as Conmmunion：Studies in Personhood and the Church*（Crestood，NY: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85），15.

[243] 朋霍费尔，《伦理学》，117。

[244] 朋霍费尔，《伦理学》，109。

[245] 莫尔特曼，《当代的基督》， 82。

下了绝对忠诚的印记。他被称为“光”，因为他是心灵的光辉，纯洁的心灵和生命。如果无知和罪恶是黑暗的，那么知识和受启发的生命一定是光明的。他是“生命”，因为他是“光”，构成并给予每一个思考存在实相。“因为我们在他里面生活、行动和存在。所有的人仰赖他的人必然得着圣灵的能力，他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又把自己给了我们，作为赎价，他且叫我们从死里复活。”[246]

基督的复活使得世界史成为终末史，并且使得历史经历的空间进入新创造的盼望层次中。[247] 从基督徒领导学理论中，圣经所记载的基督耶稣就是答案。耶稣可作为领导者的典范，他具有全面的管理和影响力的才能。[248] 但基督一生中所做的领导力抉择是否可以典范来研究呢？有学者正确地坚持基督具有超凡和独特性的一面，是不应该被今天的领导学和管理学所“读入”。[249] 基督的领导力决策的确不能约化为功能性基督论的解读，但基督在历史上的救赎事工，其中基督人性和历史性之境况的隔膜并不应该成为引导人做出正确抉择的障碍，领导者效法基督而做出人生抉择依然有效。基督论中神性和人性不能含混和分化，这是早已确立的信条。[250] 基督虽然有人性不可逾越的神性方面，但基督必然是以人的角度向我们呈现可理解的启示。因此，基督论可以使领导者查验神与人界限与融合的地方，从而在其人生抉择中，学习认识神的启示、解读境遇、人的责任，在三者中做出恰当的认知和调和。因基督跨越了上帝与人的界限，使人靠近上帝的时候，人就与上帝和好，人与自己和好，甚至人与境遇也和好了，这就是基督论中救赎的最大功效。

---

[246] Gregory of Nazianzus，*On God and Christ: The Five Theological Orations and Two Letters to Cledonius orations*，Tran. F. Williams & L. Wickham（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e，2002），110.

[247] 莫尔特曼，《当代的基督》， 82。

[248] Andrew T. Le Peau, *Paths of Leadership: Guiding Others toward Growth in Christ through Serving, Followong, Teaching, Modeling, Envisioning*(Downers Grove,:InterVarsity,1983).

[249] Stanley Hauerwas, *“ Jesus: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in The Peaceable kingdom: A Primer in Christian Ethics* (Philadelphia: SCM, 1983),72-95.

[250] 公元 451 年卡尔西顿公会议形成的基督论标准称述：“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

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卷二）》中论述，“其实凡与中保任务有关的事，并非仅指神性，或仅指人性而言，我们要把这个原则当作基本的真义，基督将统治，直到他来审判世人的时候，因他使我们尽我们软弱的本性所能的和上帝联系。”[251] 关注于基督的神而人的位格中，从神学的意义上，能使既清楚上帝的性情，也查验人性的方面，基督论为神和人搭建了唯一的桥梁。人能得到上帝的引导，必然要明白承载其旨意的意义，除了其中神圣性的一面，上帝属灵的旨意也必然用世上的载体来传递，如圣书中的引导是籍文字的形式来表达，环境也是上帝言说之大书，圣灵要开启我们的眼目，看见其中所言说的内容，真知道上帝的心意，从而做出正确的人生抉择。

“拯救的恩典只包括在将扭曲的受造物存在——只要它将人类个体化，他便被扭曲的——转化，使之成为那表达着他们身为位格的存有和他们相通的本性的受造物存在。”[252] 人的位格在圣三一的关系中找到本源的实体；也在基督的位格中，认识到位格性相通的源头实在性，从而脱离个人主义的无知和冲突。

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论及耶稣救赎事件的历史和永恒的关联来谈论救恩的普世性和永恒性，他提出应该根据三个层面进行理解：

> 一是，耶稣的活动和历史的的属人历史层面；其次，是这同一历史作为在其中行动的、在耶稣的位格中成为人的永恒的上帝之子的媒介；最后，还有这同一历史作为被高举者借着阐释这一历史的关涉所有人的救赎意义的使徒宣讲积极临在的媒介。这三个层面的相互渗透对于符合实际地理解和评判教会关于基督的复和职分来说是奠基性的。[253]

教会的领导者从基督位格中，获取了自我的决策意识乃是我们唯有通过基督被拯救并塑造成为真正的人，让自我的记忆与创造目的统一起来，让情感和理性统一起来，让前景的确定性定格在永恒的上帝国统治的和平向往中。唯

[251] 约翰 •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 268。

[252] Miroslav Volf， *After Our Likeness: The Church as the Image of the Trinity* ， （Grand Rapids，ML: Eerdmans，1998），83.

[253] 潘能伯格，《系统神学（卷二）》， 431-585。

有通过基督——上帝而人的位格，为领导者决策者成就了不断朝向上帝的指望，没有不确定性，没有犹豫和博弈的怀疑；没有无休止的斗争的苦楚，唯有信心、盼望与爱。莫特曼精辟的谈论了耶稣基督和启示的关系，他提出新约教会所经历的基督，正是旧约的实现，基督之死和复活乃是上帝未来国度的应许，在基督徒的盼望中，神乃在未来的真实里决定着历史的现状。[254] 基督耶稣是来自超然和将来的国度，但却是进入了历史的时空中，启示了上帝的作为，圣经中所记载的关乎上帝的任何旨意，都必然在耶稣基督里丰丰富富的存着，成为领导者承受上帝引导的福音。基督徒领导者在暂时的事件和个体的抉择中都要以未来国度作为目标，耶稣基督也就成为参照而量定任何事件的标准了。这是教会领导者之决策最为重要的保障，教会的前景期待不是商业经济不可预期的投资和人生愿望的不确定展望；而是在基督里已经定下的实在，它来自时空外的未来，但在现在中，他是人性所要达至的生命目标，但他也在基督徒的生命里与我们契合，他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

在旧新约的连续性和弥赛亚的预告中，有三种职分被指向耶稣基督是显然的，就是“祭司、先知和君王”，艾力克森指出现代神学已经不太多采用“基督职分”的用词来着重描述基督的工作，因这容易对基督的工作在针对某个职分的理解上有所偏重或隔离。[255] 基督职分的解释及运用是来自于圣经，其重要的意义是神的子民在群体中的服侍朝向基督论的核心，并且在功能上以基督为标准进行检视，如教会领导者在领导决策上、在诠释和运用上帝的启示上、在使人与上帝和好的决策上，回归基督耶稣工作的认识上。但基督耶稣的位格生命在整全启示上诚然不仅限制于这三层的职分所包含的；就如希伯来书不仅以“祭司”和“先知”，还以“祭物”、“圣殿”、“安息日”等指向基督。这位充满万有所充满的，万有的美善性质都在他里面存着，人性与境遇中

[254] Jurgen Moltmann, *Theology of Hope*, trans W. Leitsc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67),139-140.

[255] 艾力克森（ M. J. Erickson），《基督教神学 (增订本)卷二》，郭俊豪, 李清义译（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2000），432。

的一切，甚至破碎迷离的境况，都无法逃逸出他的包含及管制。“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西 1：16，参约 1：3）基督耶稣启示与和好的工作，

人的决策记忆如果放在耶稣的历史记忆中去完成，就必然产生对圣经、教会传统及解经和当下圣教会的正确理解，唯有解除任何由于个人或群体政治的记忆的启发式偏差，教会领导者始能朝向未来做出正确的决策。而面对前景的决策也以人的生命与世界在基督里的复和之工之确定性目标中达成。

第四章 圣徒的生命决策

人于城市的街道穿行中迷失时，总抱怨于道路的杂乱无章，直到手拿城市地图时，整个城市的道路布局便跃然显现，恍然明白自己走过的街道都是城市设计师的精心设计。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乃有上帝儿女的身份，拥上帝国的权柄和使命，其人生决策难道依然是笼罩在寻索莫名欲求的种种满足感之迷雾中么？基督徒的人生决策并非以世上经济学的不确定赌注为特征；而是确定“生命所是”所产生的“生命所事”的果子。是以永恒生命力奔赴在永恒前景的确定性道路上，是以真理为指标的决策。圣三一上帝决定着创造和生命法则的灵活且有序，他对其选民的人生都有精心安排。

因此，本章的教会领导决策之圣徒典范，是对上一章教会领导者之决策的神学研究的生命印证，显明有罪之人向上帝子民身份的转变是来自拣选和恩召，是三一上帝与人关系的和好之爱的体现，而并非来自于人性本我的心理因素、或经济行为的博弈结果。在神学视角下的社会境遇成为上帝传递其旨意的“话语场”，并非是人性利益的斗争处所；人性与三一上帝的关系，上帝主权所塑造的人生，真理法则的理性知识，世界境遇与群体共契，人生的经验记忆与终极目标人生，一一成就了生命决策。圣经记载的圣徒人生，乃是决策典范。以下研究对象是旧约中重要领导者摩西，以及新约中的教会领导者保罗，主要讨论他们在人生关键时期的决策要素是以“神本”为特征，但生命并非被禁锢而是被激发得活跃且有意义，呈现为以群体使命为己任。这乃群体使命决策（“我之所事”）决定着生命决策（“我之所是”）之圣经与神学的决策视野。

一、摩西的生命决策典范

摩西的生命典范可以为教会领导者提供清晰的决策要素。上帝的主权和定命在摩西的出生和成长充分印证，圣徒的领导者身份并非以个体之丰功伟绩

凸显出来，而是因他的人生紧紧与拯救众生的使命相关联。出埃及记这书卷在希伯来圣经的名字乃“他们的名字”（בראשית），摩西故事是委身于“他们的名字”的群体中并为之存在。故事开始于上帝子民在被奴役的苦境中，这是领导者摩西出场的情景，也是摩西之所以被上帝拣选并塑造成为领导者的原因。《圣经：旧约》中，从挪亚、亚伯拉罕、到大卫及众先知，圣徒必蒙上帝拣选，其领导决策并非显出个人修为的崇高，而是为崇高的群体使命而生。就是在这场悲苦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时，领导者摩西的生命故事并非是要歌颂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有关一个神圣群体之拯救决策的宏大叙事，根据书卷《民数记》记录，出埃及时超过二十岁男丁，共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名（民 1：46），领导者摩西所率领的以色列民，逾百万民众。

人生能成为承受使命和责任的决策者，其基本是自我身份的确立。这身份并非指人在社会中的工作职场的岗位及职能，而指被拣选的领导者对崇高使命的深刻认识。犯罪堕落后的人是迷失身份者，人生决策必然确实是真理的整全认知，也缺失上帝启示的永恒目标。圣徒摩西俨然经历自我身份的更新，其身份觉悟不是自我理性的修正，并非心理潜在的革命精神的突变，而是因为上帝主权下的拣选、真理的启示、境遇的塑造和异象的目标引导及价值观的认知所形成的“生命之所是”，这就是圣徒领导者的生命决策。

1、拣选与境遇

首先谈论领导者的人生决策是在上帝主权下进行——蒙拣选。上帝的拣选是圣经的重要主题之一，华尔基（Bruce K. Waltke）所言：“创世纪这基本主题——蒙拣选的后裔，在这卷出埃及记推进，经过不少障碍，与其他主题交织，当中最重要的是神颁布律法治理他的选民。”[256] 拣选是神的选民之人生故事的主轴，摩西出生的情景显出世界的凶险，接生婆在风声鹤起的种族屠杀

[256] 华尔基（Bruce K. Waltke）、俞明义，《华尔基旧约神学（上）》（香港：天道，2013），424。

命令中却敢于留下婴儿摩西的性命；这婴儿在河流中漂流于九死一生时却巧遇法老女儿，成长中得到良好的世间通识教育，“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徒 78：22），领导者的人生故事并非一场无序的偶然，生命决策的根本绝非即时的理性和情感所然，而是在成长境遇所设定种种因素而造成。“婴儿”在境遇中似乎是汹涌波浪的孤叶，但他却被冲到坚实的河岸边，他被拣选并保守在生活的动荡之外；……生活的不安宁和波澜起伏席卷了那些完全沉浸在人类事务而蒙在鼓里的人，圣徒生活在患难中当看摩西的经历，他的得救成为呼求上帝保障之人的盼望。[257] 领导决策——认知上帝的拣选与境遇的紧密关联，上帝的拣选是让领导者在境遇中被磨练，证实偶然性中有必然，苦难就是盼望的情景；绝境就是召唤的开端。经文叙述摩西的人生是造物主的拣选和恩赐，华尔基把出埃及的第一到六章作为第一部分的架构，并定以“拣选的恩赐”的主题，围绕着领袖摩西蒙拣选、蒙召之生命场景。[258] 显然，研究领导者摩西在其生命中的重要决策，必须确定上帝在其生命里的主权，就是拣选，并形成环境的全方位包围影响，决定着摩西的成长过程。

故事记叙希伯来人在埃及沦落为奴隶，法老政权正执行一项惨无人道的法令，搜查杀害所有希伯来家庭男婴。埃及政权做出决策对抗的是独一真神，华尔基论述说：“法老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像该隐和他的后代，变得更加心硬，要对抗神和他的子民。”[259] 摩西的家人在遭遇苦难的关头，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艰难的做出决策要冒险存留婴儿性命。在好心接生婆的帮助，摩西出生了，家中无法继续隐藏之下，婴儿在通过“石漆和石油”保障的蒲草箱漂流在充满风险的溪流中，每一危机的排除都因上帝的格外护理，但摩西家人必须尽所能地制定决策，摩西姐姐在暗中的监看，促成主动推荐母亲喂养摩西的机会，

---

[257] Gregory of Nyssa, *Gregory of Nyssa: The Life of Moses*, ed. Richard J. Payne, trans. Abraham J. Malherbe and Everett Ferguson, The Classics of Western Spirituality (New York;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1978), 57.

[258] 华尔基、俞明义，《华尔基旧约神学（上）》，425。

[259] 华尔基、俞明义，《华尔基旧约神学（上）》，429。

这给予摩西在成长中得到纯正信仰的培育。杜伦（John I. Durham）有力的分析说，以色列的精明再次显明，摩西家庭不仅化险为夷，还因着养育摩西赢得法老的资金补贴，这是对法老极端政策的讽刺了。[260] 当然，也看到上帝安排在幽暗境遇中，从埃及强权势力中存留着人间的一抹美丽的温情，当法老女儿眼见那可爱的孩子，聆听其啼哭声，就心生怜爱，她接纳并收养法老敌对民族的孩子。在上帝主权的运作中，不能忽视人类境遇里人性良知的作用。

任何上帝拣选的圣徒，人生决策直面的是充满风险的安全，是动荡时代的弄潮儿，是残暴死亡中生的盼望。圣徒似乎在艰难的情景中决策，但确是在上帝的定旨满怀指望的行动，正如上帝的独生爱子所经受的一切，"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徒 2：23）

2、异象与使命：生命之所事

"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的摩西，其身份记忆及其强烈的使命依然坚定的站在被奴役的希伯来人一边，《出埃及记》清楚地描述："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出 2：11），"兄弟"不仅表示在彼此身份上的高度认同，也是其整个人生责任感的基础。[261] 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及其责任感成为摩西人生决策方向的基础，摩西就去到他的"兄弟"那里，关切他们的劳苦。随后的两次事件显出他不顾个人安危而挺身而出的壮举，一次是眼见希伯来人被欺凌时，他出手相救以致打死一位埃及人，另一次他在希伯来人相争时，好言劝勉而导致事件败露而逃亡。身在福中的埃及王子摩西为何选择冒险站在奴隶身份的希伯来人一边呢？显然当摩西面对受奴役的希伯来人时，满怀特殊的情怀而"看他们的重担"，就如上帝"看见"以色列人的苦

---

[260] John I. Durham, *Exodus*, vol. 3,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Incorporated, 1998), 16.

[261] 后来的申命记法典充分强调以色列民族与家庭的身份责任，参 Helmer Ringgren, "אָח," ed. G. Johannes Botterweck, trans. John T. Willis,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Cambridge, U.K.: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192.

情而制定了拯救计划一样（出 3：7、8）。[262] 摩西看见上帝所看见的，他看见一个属于上帝拯救计划的异象，只是他需要进一步确立想法并做出正确的决策。

摩西在米甸四十年，结婚生子。华尔基称这是历史学家汤因比（Armold Toynbee）所概括的伟大人物形成过程的“退隐与重返”的典范，并谈到亚伯拉罕如是（创十二章），雅各布如是（创二十七——三十二章），以色列民众在旷野四十年受试炼也如是，这些都预表基督在旷野四十天的试炼。[263] 时间与境遇是对领导者决策的信念最为有力的考验，对于领导者摩西来说，四十年境遇的考验，其心中存在的使命是否依然坚固不变呢？上帝在向摩西说话时，首要是重提以色列的困境。“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出 3：7——8）。上帝激发那曾经在摩西心中洋溢的使命感，要促动摩西再做出决策。当然，在出其不意的兄弟倒戈中，就是他洋溢的使命感时，他批判欺负人者的兄弟时，他的兄弟揭露他杀死埃及人的情况时，他也惧怕了。人在强烈的认同感和使命感所决定的行为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向前进展，而是遭遇出其不意的阻击，在危机感的笼罩中，人也常回到低落反思状态。这必然激发了对使命感及其行动的自我评估并更为成熟的做出决策。

然而，摩西的领导决策不仅以使命感作为动力，他还必须从上帝领受异象为内涵；教会领导者之异象是真切地遇见上帝；把上帝在生命里所预备的一切恩赐才能、使命再次献上，并清楚领受上帝广大的旨意。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论到摩西在西奈山领受上帝的律法时，他克服了惧怕、勇敢地走近那深沉的黑暗，那里失去一切眼见，八十岁的摩西与不能眼见的那位在一起，因而超越所有可见的表象和肤浅的思维，他领受上帝的典章，就是

[262] R. Alan Cole, *Exodus: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vol. 2,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73), 66.

[263] 华尔基、俞明义，《华尔基旧约神学（上）》，431。

关于美德的教导，关于真正的崇拜和真理。这一切是任何已知的事物无法比拟的；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不能从质、量、任何其他存在方式来理解至高者的存在。[264] 这就是圣徒领导者的真正异象，是不能眼见的眼见，是无法聆听的聆听；所有特殊的现象，都指向上帝启示的内涵——就是圣经律法。

在上帝宏大的救恩事工中，出埃及不仅是希伯来民族群体的历史事件，而是显明摩西在异象中领受的律法：救恩、律法和敬拜。《出埃及记》的经文结构甚为分明：1、上帝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一 1——十八 27）；2、上帝赐给以色列他的律法（十九 1——二十四 18）；3、上帝命令以色列建造会幕（二十五 1——四十 38）。[265] 领导决策的宗旨是深怀迫切的使命，深知道上帝的在世界上旨意。摩西领受的律法核心就是人对上帝的崇拜关系，人与人的社会性与道德性的关系，这是人性堕落后与上帝重归于好的生命教程，是摩西一生中要在上帝子民的群体中全然贯彻的领导决策的内容和指标。摩西俨然成为上帝律法的代言人，甚至成为上帝国宪章的预备者。这位本是埃及王子的人生满布挫难坎坷，他不是偶然被苦难所迫，其生命决策显明他是因使命和异象走向苦难，他因社会的不公正而充满悲悯愤慨，其使命与责任感并非来自内省修行的道德结果，而是他在异象中经历上帝的启示。[266] 摩西的领导决策全然乃上帝的旨意所指引，其决策根本乃因其内心的眼睛明亮了，看见上帝向他所描绘的生命异象。[267] 再思考摩西一开始遇见上帝时的情景，“异象”使他的人生使命得到了从天上来的确认。

---

[264] Gregory of Nyssa, *Gregory of Nyssa: The Life of Moses*, 43.

[265] 狄拉德（Raymond B. Dillard）、朗文（Tremper Longman III），《21 世纪旧约导论》，刘良淑译（台北：校园，1999），72。

[266] William H. C. Propp, *Exodus 1–18: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vol. 2, Anchor Yale Bible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65–166.

[267]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With Werkgroep Informatica, Vrije Universiteit Morphology; Bible. O.T. Hebrew. Werkgroep Informatica, Vrije Universiteit.* (Logos Bible Software, 2006), Ex 3:14.

>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出 3：2-3）

“异象”在旧约圣经中的含义，是从字义指人眼见超然景象进深到意指上帝的神圣临在时，人要从视觉——感觉的超然领域跃入到人与上帝超然相遇的领域，因此，“异象”重点并非现象中人的感受，而是上帝论显现时言说的启示。[268] 圣经记述圣山异象的重点并非荆棘和火焰，而是要让摩西见证火焰所指向的神圣者显现，以及所听到的来自上帝的呼召。[269] 尼撒的贵格利诠释摩西在何烈山上看到的是真理的照耀，火的光芒照亮了领导者灵魂的眼睛。

> 那真理就是上帝，真理教摩西得到无法形容的神秘启示——那就是从荆棘里发出照耀先知灵魂的火焰，……真理是上帝，真理是光，福音使用这些崇高神圣的名字，为要见证那在肉身叫我们看见的上帝者，这律法启示引导我们去认识那触及人性的光。[270]

摩西的领导决策蒙受了使命和异象，异象坚固了使命，为使命充实了广博的内容，也为使命确立了目标。

3、生命之所是

从领导者被拣选的身份，到领导者的异象与使命，皆是确定其生命的所是。哪怕境遇何其变幻无常，挫败和困难汹涌袭来，试探与诱惑笼罩周遭，领导决策因领导者的生命所是，一切将会是坚定的指向确定性的目标，因他有全然丰盛的生命能力和全然确凿的真理判断。神圣者上帝对摩西的显现不仅塑造了摩西作为领导者的身份领导以色列接受上帝的召喊，也促使整个选民群体做出正确的决策。然而，在埃及受奴役已久的以色列人对上帝太陌生了，他们习

---

[268] H. F. Fuhs, “רָאָה,” ed. G. Johannes Botterweck, Helmer Ringgren, and Heinz-Josef Fabry, trans. David E. Green,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Cambridge, U.K.: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236.

[269] John I. Durham, *Exodus*, vol. 3,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Incorporated, 1998), 33.

[270] Gregory of Nyssa, *Gregory of Nyssa: The Life of Moses*, 59.

惯了世俗的一切，他们亟需强烈的生命激荡翻转才能醒悟。有罪的人在有罪的社会群体里，苦难的境遇与斗争的苦难正在恶性的循环着，公义与善良似乎反成为成为遥不可及的假象。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Freud Sigmund）用其心理分析学联想翩翩，他猜测摩西本是埃及人，但他义勇地站在卑微的希伯来人一方，并敌对他的父亲及父亲的宗教；因为这些奴隶认同他创立的一神宗教。[271] 在弗洛伊德的心思里，上帝不会存在，这世界就只有人和人以宗教的名义进行拉帮结派的群体斗争，摩西就如世界上极大多数似乎聪明但最为愚笨的领导决策者，为了心中那虚幻的权力欲望所构建的信念图景，却与最亲近的亲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并把任何可以争取的社会群体卷入到欲望性的斗争中来。许多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从堕落人性的虚无中去认识现实世界，尼撒的贵格利对真理从正反两面进行定义：

> 真理是不能产生对存在的错误理解，只有虚假的印象才误把不存在当作存在，仿佛不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存在似得。真理是对真实存在的真正理解。就如伟大的摩西得到上帝启示时，他逐渐认识到，他无法以感官去感觉及理解任何实在的东西，他唯有思考真正的存在实体，这乃是宇宙本质的超越性原因，一切都赖以他存在的存在者。[272]

人类社会以埃及般强大霸权主义的图景构建时，人人都拖着被奴役身体与被奴役的精神生活着，上帝需要不断的启示自我，他需要强烈的干预这世界；杜伦（John I. Durham）认为上帝对摩西的三次显现是出埃及记甚至整本旧约的核心（出 3：1—4：17；19：1–20：20；24:1–18）。[273] 每一次上帝的自我显现，都是对摩西的生命之所是的一再肯定。摩西与上帝在山上的对话基本呈

---

[271] Freud Sigmund， *Moses and Monotheism*，tran. Katherine Jones（(New York:Vintage Books, 1939)，9.

[272] Gregory of Nyssa, *Gregory of Nyssa: The Life of Moses*, 60.

[273] John I. Durham, *Exodus*, vol. 3,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Incorporated, 1998), 30.

现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摩西承受使命并做出生命决策时，他必须再次审视自己是谁；二是充分展现摩西与上帝两者对话时，摩西的自由选择。

> “耶和华上帝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上帝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出 3：4-12）

这次摩西与上帝的会话中，上帝重申摩西曾经感受到的以色列人的苦情，并交付给摩西领导者的使命；但摩西似乎要推脱上帝的命令，这推脱的说辞并非是摩西谦卑，而恰恰是揭示他软弱意志中畏惧的一面。[274] 摩西以一种自我否认的疑问式来回应上帝委托使命：“我是什么人？”，这种自我否定在这次与上帝的对话中几番出现：“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出 4：1）；“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出 4：10）；上帝一一详尽的回应并应许赐下全备恩赐和能力为摩西加持。教会领导者在人生关键时机的决策，对自我的生命所是乃藉以否定而得肯定，这当然不是自我心理暗示，不是自我鼓劲加油；不是故作谦卑姿态的骄傲；而是全然来自创造生命的主的重新全方位塑造。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生命主不是仅仅给予领导者外在的恩赐能力，不是以差派他者而让自我退居幕后，他把自我也给了他所差遣的人。他赋予领导者参与他拯救难民的使命，也让领导者成为与他生命联结的所是。摩西之“我是谁”的疑问从上帝的“我是”的自我介绍中得到超乎想象的身份肯定的解答。达勒姆

[274] Randall C. Bailey, *Exodus*, The College Press NIV Commentary (Joplin, MO: College Press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81.

（John I. Durham） 论述说，摩西的自我表达从上帝的自我表达中得到呼应，并且神用更为强烈自我介绍表明自我："我是"。[275]

这位启示自我是一切根本的上帝，他教摩西充分地认知自我的一切，他从高远的源头流向人间，以创造主的权柄能力管辖万有，他启发摩西重温正义、爱与施行拯救的情怀，他没有奴役和控制，唯有启示和显明真理，他威严慈爱，他甚至全然分享他自己，与人同行；他赋以人决策的权利。领导决策要确定生命之"我是"中的"我是"源头，"我是"对摩西的呼召铸就了领导力的品格，攻克其胆怯懦弱，发挥其良好人性。那些富有永恒价值的生命所是，除非上帝召喊和任命，人凭自己的决策及行为乃无所作为。[276] 人心中的价值取向都是人做出决策的潜在决定因素，任何人性呈现出来的品格行为都由人生命内在的所是生发出来。

托马斯·阿奎那所言极是，受造物要致力于获得他自身的完满性，就必须以神的善和完满性作为其目的。[277] 领导决策若非回归上帝创造的人性本真去塑造自我的所是，人生任何决策必然失去内涵和目标。当然，作为受造人性，并非在神圣上帝的同在中失去其智力和意志，而是在上帝的引导中重新被激发起更有活力的生命决策来。约翰·麦奎利（John Macquarrie）论及人性的"上帝的形象"之实在要与泛神论理解人性乃神的碎片区分开来，基督教人论需要强调人性的神圣本质，他批判那些试图为了尊崇上帝而贬低人性，在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到控制人的地步，这种贬低人性的论调就是在贬低上帝了，因其人性论已经贬低上帝的创造神迹。[278] 人的堕落的真实性及其深重的影响，也是

---

[275] John I. Durham, *Exodus*, vol. 3,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Incorporated, 1998), 33.

[276] Jerry Wragg, *Exemplary Spiritual Leadership: Facing the Challenges, Escaping the Dangers*, Ministry Mission (Leominster: Day One, 2010), 21.

[277]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神学大全（第一集 论上帝）》，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75。

[278] 约翰·麦奎利（John Macquarrie），《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222。

建立于上帝与人性的极其神圣重大的关联性上，人性的实在也必然显明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决策自由上，这乃是意志和理智的自由，尽管堕落后的人性尽受罪恶所困扰，但人依然要为先在的犯罪事件和本身的决策权利负责。所以，上帝审判的公义及其合理性才显然了。

摩西是因为他对所是者的认识而认识自我的所是，他的领导决策就是完成上帝放在他生命中之所是的使命，他的人生故事因此灿烂展开了。摩西有过决策时的犹豫，并产生自我逃避和懦弱，但他最终接纳自我将要成就的永恒性自我，这就是领导者英明的自我决策；这决策同时必要向外延展，成为群体性的神圣事件。教父克利苏格司（Peter Chrysologus）所言，上帝赋以摩西言表有格外的能力，他以美德和智慧领导以色列人大大得胜，并成为上帝的朋友，与上帝在建立法令和国度统治上有份。[279] 摩西遭遇种种人生艰难，甚至他的核心团队毁谤过他，他在百般境遇的试炼中体现的优良品格表明其决策的稳固性和确定性。这皆可追溯到他的生命所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利 12：3）

在领导者摩西的生命决策中，从他出生到成长，上帝为他设定种种的境遇，以拣选与恩召塑造他的生命所是，摩西得到异象中的启示，真理光照他的整个生命，律法中的崇拜、公义教他学习人之所以人的根本。他经受生命从罪恶里得着释放，也参与到上帝对他的子民群体的拯救事工中。在圣经中，上帝藉着改变一个人的名字 (如：亚伯拉罕、撒拉、雅各布)来预示生命的更新，表明上帝与人的亲密关系。上帝再一次与摩西相见时，又启示一个古老的名字——"我是耶和华"这特殊的名字唤起他的选民的集体记忆，就是上帝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创17:1–8），关乎上帝的应许：数不尽的子孙与广袤的土地。[280] 上

[279] Joseph T. Lienhard and Ronnie J. Rombs, eds., *Exodus, Leviticus, Numbers, Deuteronomy*,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1), 13.

[280] William H. C. Propp, *Exodus 1–18: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vol. 2, Anchor Yale Bible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83.

帝所拣选的领导者，其生命决策事关上帝的“名字”，也关系自己的“名字”，不是个人得失和社会斗争了，不是价值观的不确定和有限理性的误判了，而是为着古老的应许和共同的人与上帝契合的异象。名字代表着神圣的实在，人生决策与那神圣的决然紧密关联。人生的自我意识及其使命被激发，就是来自神的自我启示并向人开放他自己的那一刻。

>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来 11：1—27）

希伯来书作者强调来自古老生命的信心与终极存在的未见盼望，道出摩西超越了世俗的荣华诱惑的秘诀，分明就是望见那救恩的远象，甚至仰望的是那位救赎主。[281] 上帝的拣选、境遇的安排、赐下异象和使命，塑造了领导者的生命所是，这就是人生决策的内涵与活力。

二、保罗的生命决策典范

在缺失终极真理的社会里，每个人的人生愿景，如丛生的草木多样无序，教会领导者的异象尽管宏大且高远，但其人生决策反而是简要和确定性的。没有终极信念的人生决策当然只能是一种风险投资，但确信永生之应许的人生决策就不再受到散乱变化的价值判断所干扰，而是单单依靠在上帝启示里的根本性的古老记忆和确实的终末向往。保罗的领导决策就是这样的典范。

1、境遇与异象：生命之所事

保罗是属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以色列首位君王就出自于这支派，他也起

[281] Donald Guthrie, *Hebrews: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vol. 15,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83), 241.

了同样的名字“扫罗”；他的父母在他出生八天后就按照犹太正统给他行了割礼，使他归入摩西之约，保罗自称为根正苗红的“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腓3：5）。他与摩西一样，都有很高的受教育程度，使徒行传的作者谈到他是在耶路撒冷的“迦玛列门下”受训（徒22：3；5：34），他熟悉《旧约》和两约之间的犹太传统，精通辩论技巧、写信的艺术，并且他也精通当时的流行哲学，熟谙希腊语。[282] 上帝为这位使徒预备的家庭境遇格外有代表性，这为其人生成长，并最终的奉献决策及释经素养奠定了深厚基础。

扫罗参与一场铲除“异端”的犹太积极份子的激烈运动而出现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中；他聆听了那位对犹太传统有着博学才华的宣道者的长长的辩护词，他谦恭且坚韧的精神之光穿透人心，他从犹太人尊崇的祖宗亚伯拉罕、雅各布、约瑟谈起，直谈到摩西与与大卫及众先知；但令人气愤的是这位传道者不仅宣扬那位刚刚被告到彼拉多那里，犹太公会和祭司长等代表“正统”信仰的犹太信仰领袖人物决议必须除掉的拿撒勒人耶稣，还把这些为犹太“正道”大发热心的犹太人比拟为出卖约瑟的兄弟们、出卖摩西的希伯来人，以及杀害先知的刽子手和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参徒 7：1—53）。这段境遇并非能使扫罗转变既定的观念，而是变本加厉的迫害拿撒勒人耶稣的教会。“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徒 8：2-3），经文用受害者司提反的埋葬及信徒们的悲哀，与施暴者扫罗气焰嚣张进行强烈的对比。这是一位得胜者的傲然肖像，但却是以坚定的自信决策走在歧途中。这个世界的群体都在一种强大的“维持现状偏向”决策中推进着，人们都热爱于原有的价值取向，并为之守护。[283] 而这是有关自

[282] 德席尔瓦（David A. deSilva），《21 世纪基督教新约导论》，纪荣智、李望远译（台北：校园，2013），532。

[283]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杰克・尼奇（Jack L. Knetsch）、理查德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异常现象-禀赋效应、损失规避和维持现状偏向”，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主编，《选择、价值与决策》，郑磊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171。

我身份的遵循的决策，人性最易受情景里的已经偏差的组织社群之价值观强烈影响导致固有记忆及想法与古远的事实偏差。

> 个体和组织实现自己的身份时会遵循一定的规则或程序，这些规则或程序要适合于他们认同自我身份的情景。在考虑这些规则和程序的时候，他们既不考虑偏好、也不考虑未来结果的期望。[284]

保罗在当时的法利赛人群体中深受陶养，他在呈复杂多样性的律法研究中富有找回律法正统的敏感及热情，他甚至不惜采用政治手段来捍卫宗教。[285] 为了充分发挥他对“律法”的热心，保罗终于在捉拿拿撒勒人耶稣一党的“异类”份子上找到用武之地。他并不能觉察到自我在律法传统上的理解的偏差，也似乎没有察看到那位叫“司提反”的殉道者对生与死的释然；但或许，那种有关永生盼望的未来确定性决策在他心中点燃了星星之火。

>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徒 9：1-2），

扫罗成为这场镇压基督信徒运动的典型活跃者，他不满足于把他们赶出耶路撒冷，哪怕这些人逃到以色列地的范围外，都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在公元六年设立的省行政机构下，大祭司仍然享有引渡的权利，而保罗当时的宗教热情就如历史上那些倡导暴力护教的伟大典范一样——非尼哈、以利亚二世、以利亚三世和玛他提亚四世。[286] 因此，扫罗从大祭司那里求得公文，到大马色追捕从耶路撒冷去的难民，押解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受审判。这段故事也有保罗自己的回忆为证：

> “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

[284] 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决策是如何产生的》，王元歌，章爱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42。

[285] 赖特（N. T. Wright），《新约与神的子民》，左心泰译（台北：校园，2013），258。

[286] F. F. Bruce, *The Book of the Act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8), 180–181.

> 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徒 26：9-11）

为其宗教立场大发热心并采取极端手段的扫罗，他的信仰决策并非如许多民间信仰那样的不确定性和功利化，他是怀有深切的信念和委身；他显然是深受当时宗教情景的偏好所误导，保罗的宗教偏激的决策特征可以用当代决策学家研究经济保险的框架效应的人性心理法则来对应描述，[287] 他的决策是带着深情的情景依赖性（context dependency），他与公会领袖、大多数法利赛人、文士一样，各自构建坚定的对旧约传统和弥赛亚政治的解释体系，而扫罗就是在这种信仰原则性之决策的“参照依赖”之下，当有“异军突起”时，便会强烈的与其对抗，甚至不择手段。人性的心理局限要求自我在目前既定的价值判断的框架中寻找安全感，在扫罗的心目中，法利赛人和文士所构建的公会主流思想就是犹太信仰的安全基础，他心底里以为以色列信仰的异端都是极度危险的，乃上帝和信徒所不容，是他个人和整个民族的威胁所在。在以色列人的历史记忆中，他们所遭遇苦难侵害要比任何一切来的更加刻骨铭心，他们对基督信徒的逼迫激情正是来源于他的价值标准的参照依赖和损失规避的决策，这就是典型的框架效应。

人生决策中固有的偏误要纠正是艰难的事情，扫罗的生命改变必然要来自上主的亲自介入，唯有从天上来的异象，始能打破他坚固的自我：

>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作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徒 9：3-9）

---

[287] 约翰逊（E. J. Johnson）、赫尔希（J. Hershey）、梅萨罗斯（J. Meszaros）、昆路德（H. Kunreuther），“框架效应、概率扭曲与保险决策”，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主编，《选择、价值与决策》，郑磊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241。

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的漫长之路上，扫罗不见得有心思去领略周遭美丽的田园风光，他心中充溢的是富有紧迫性的使命，他深信他的决策的正当性和崇高，他正在为捍卫真理而竭力斗争，他正要迎来大马士革的一场新的胜利。就在此时，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这是来自天上的刺目的光亮，不仅灼伤他的眼睛，使他暂时无法看见，更是刺透他的心眼，让已有的信仰观感和价值判断被审判；并且是全方位的受到天上的光照，他不由自主的扑倒在地，这在扫罗一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徒 26：13，22：6，9），上帝对他要改变者的人生境遇的设计，在摩西何列山上遇见上帝也同样震撼性的观感就是荆棘丛中的烈火（参出 3：1-3），但最为关键的部分是扫罗的听觉所聆听到的声音，这是他遇上这位救主的真实所在，正如先知们曾经经验过的那些刻在生命深处的超然印象（结 3:23–24; 43:3; 但 8:15），这声音的呼喊既陌生又亲切，声声叩问侵入心扉：“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从天上来的荣耀的情景，以及突而其来的询问，以致不仅呼喊：“主啊，你是谁？”，您是我的主权者，我此时此刻必须降服于您；但——您是谁？他被在强大猛烈的光照境遇中，他聆听，他询问，他立刻做出降服的决策，这是一种迅速的人性潜在的直觉和情感所作用的决策，但他需要进一步寻求理性的认知来坚定自己的猛然转向，他要确认主到底是谁。在保罗的书信中，读者能明白死而复活的主在教会的共同体中的无限的权柄和能力 (参 林前 7:10; 12:25；贴前 4:15；徒 11:16; 20:35)。[288] “你是谁？”是对那位主的身份的追寻，在旧约中显现给摩西的“I am”在这里以第二位格的身份出现在更新身份的异象中。[289] 生命的重大决策时面临答案的解开总是令人极其意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288] Moisés Silva, e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4), 775.

[289] Hans Conzelmann, *Acts of the Apostles: A Commentary on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ed. Eldon Jay Epp and Christopher R. Matthews, trans. James Limburg, A. Thomas Kraabel, and Donald H. Juel, Hermeneia—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7), 71.

他引以为傲的事业；他坚定信守的原则性；他正朝向成功的未来……整个价值信念的建构就被这名字——耶稣——颠覆了。

扫罗的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情感中充满各种滋味：恐惧、毁灭、耻辱、敬畏、恐惧、荣耀交织着袭心头；多年后他写下的耶稣荣光的见证："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林后 4:6)，不仅如此，他"看到"司提反殉道时所看到的情形，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后的存在，他坐在上帝的右边执掌王权，扫罗曾经以为靠着自身的勇力和斗志就可以消灭拿撒勒人耶稣的余党，因为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消亡了，但他竟然在天上坐着为王。他用更加真实和高明的方式征服邪恶和错误。古教父阿拉塔（Arator）感叹说：扫罗在眼瞎里的黑暗赢得太多了!失明教他看到了更伟大者，他在那时代树立一个非凡的信心的榜样；扫罗将在在黑夜的世界里使许多人被大光充满，除掉黑暗势力。[290] 扫罗有关律法和先知的教科书被撕成碎片，用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展现起来，这是一个新世界，是被误解和偏见所掩盖的旧世界要重新焕发光辉，原来指向的实体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291] 十字架的可耻的和恐怖，这是揭开新意的救赎计划，它使以色列崇拜传统中献祭的羔羊充满生命的实际，这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之三一真神的奇妙决策。因此，他的名字改变了，从"扫罗"改为"保罗"，这是身份的全然转变。

保罗的名字由希伯来文"扫罗"的重复形式而来（参徒 26:14），因他经历的异象，他重构自我，真正寻回上帝心意中的生命之所是。诚然，保罗并不能在异象的经验感受中认知福音，他要被引到教会那里，唯有教会才是生命之道教导的神圣场所（加1：12-13）。[292] 异象所带来的情景可以叫人产生生命决策

---

[290] Francis Martin and Evan Smith, eds., *Acts,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6), 107.

[291] Tom Wright, *Acts for Everyone*, Part 1: Chapters 1-12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2008), 140–141.

[292] Hans Conzelmann, *Acts of the Apostles: A Commentary on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71.

的直觉和感受，但重新“看见”的经验必然要贯彻到真理的认知中，保罗重塑所见的异象，就是重塑整全的教会领导价值观，这成为他的生命决策的重大因素了。

2、价值观和生命之所是

保罗描绘自己在遇见基督之前，就是一位心中充溢使命感的大发热心者，他立志奉行法利赛人的生活方式，彻底委身于透过口述传统加以解释和扩充的妥拉。[293] 保罗在《加拉太书》开篇中，深刻地回想自己的生命转变过程，他谈到自己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加1：14）他被这股热情所驱动而决策，以极为强烈的行动去“极力逼迫、残害上帝的教会”（加1：13）。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上帝，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加1：16）保罗的生命产生急剧的转变，依然是热心，却真正的为主的教会热心，他看见新的异象——真正的异象，就承受这使命而做出生命决策。

>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 3：7—8）

自从保罗遇见基督，他毅然放弃他“肉身”的引以为傲的法利赛人身份；《腓立比书》中描述其对话者，正夸耀自己在律法中的义的地位，从血脉传统到行律法的优越感，保罗早已轻松地超过他们，他提供非常直率的见证，见证他信靠基督以前的生活，这些是他记忆中不可抹杀的深刻印象（林后 11:22；加 1:13-14；林前十五 9；提后 1:15）；但这些历史记忆并非是保罗所要书写的回忆录，他重点乃是为了辩明真相和说明生命转变的典范。[294] 在任何传福音的境遇中，保罗都渴望以自身的生命转变教导他的听众做出关键性的决策，

---

[293] 德席尔瓦，《21 世纪基督教新约导论》，534。

[294] Markus Bockmuehl, *The 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 Black’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London: Continuum, 1997), 195.

因此，他的言辞何其强烈：“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腓 3:7)， 这是他对两种人生价值观的显明对比。

宗教生活的决策标准普遍是表面可量化的职分及行为形式，那些“洁净和不洁净”的判断准则在任何时代的律法主义群体中依然泛滥，任何教会的仪式、圣礼、形式都不能与认识基督本身相比拟。显然，保罗并没有放弃他来自律法传统的产业，也没有反对各种各样的“形式”，但保罗面对以色列人信守律法的热情，他要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论证这些决策判断的偏差，这被以为“有益的”，因耶稣基督都要当作有损的，因为这些叫人偏离基督。[295] 教会领导者的生命决策是在价值观的决然转向，“万事”的价值在耶稣基督的天平中，都轻如鸿毛，任何在基督里的受造，并非必须唾弃，而是不能成为的认识主基督的障碍，因为一切都要朝向真正的“至宝”。

保罗曾经视妥拉就是他信仰的一切，他采集基督徒的罪证，他热心迫害他们，他明白耶稣及其门徒就是传说中那些违背安息日，违反洁净条例，又声称自己具有赦罪权柄的亵渎的“异端”群体，他们严重违背妥拉，耶稣已经为此付上代价而受死了。[296] 但当他真的遇见复活的耶稣，他的生命被彻底地革命了，他的生命所是就是接纳耶稣的所是。耶稣才是真正的妥拉的解释者，妥拉的权威和启示要移到耶稣身上重新被建立起来。[297] 《旧约》妥拉指向的盼望之火再次点燃在保罗的心中，充溢在保罗的福音宣言中（罗 13：11—14；林前 7：29—31；贴前 4：13—5：11；贴后 2：1—15），复活的耶稣把保罗带入末世性的场景中，上帝要全然统治他的子民并最终得胜仇敌，使义人得生，[298] 律法的价值观重塑指引着使徒保罗的生命决策，也是他日后一生之久坚定持守这决策的动力所在。

---

[295] Gordon D. Fee, *Paul’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Wm.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5), 310–311.

[296] 德席尔瓦，《21 世纪基督教新约导论》，538。

[297] J. C. Beker, *Paul the Apostle* (Philadelphia：Fortress，1980)，182一89。

[298] 德席尔瓦，《21 世纪基督教新约导论》，539。

保罗的生命之所是就因上帝将自己的独生子启示给他看（加 1：15—16；林前 15：8），保罗归信的转折性决策，让他在心志上认识并追随弥赛亚耶稣，同时也蒙召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上帝已为保罗作了决定，向他揭示他在理解上和人生方向上的误差，从而使他回转，更就他个人的情况向他启示他今后的任务，也就是委派他”。[299] 赖特谈到，保罗的人生故事，也就是创造与拯救叙事的缩影，他挣脱了同时代犹太人叙事世界的束缚，他重新归正于《旧约》中创造和盟约的信仰核心，并强调基督和圣灵。[300] 诚然，保罗的生命决策不仅是行动上舍身侍奉耶稣及教会，更呈现他思想上的转变，这成为他生命之所是的根本。

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喜爱谈论圣三一的关系，显明神圣之爱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认同，并洋溢在教会群体中。（参罗 5：1—11；15：16；林前 12：4-6；林后 1：21-22，13：14；加 4：6；贴后 2：13-14）。圣三一的爱的共契透过教会圣徒的生命之所是，作用在教会群体里形成充满的力量。

>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弗 3：14-19）

保罗为信徒迫切祷告的目标，是圣父、圣子、圣灵与圣徒同在，以荣耀、刚强和爱心充满众圣徒的群体。因着圣三一向圣徒的爱的倾注，因教会领导者出于爱的祷告的心，圣三一的生命之所是呈现在圣徒相通中。如若没有神圣三一的爱成为人性的基础，人性的决策机制的本质和外显，都显示出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破碎迷离；然而，在基督徒领导者的生命决策中，因着联结于圣三一的爱，生命决策机制将会变得简单和崇高，即为群体利益与自我的利益的高度统一，舍弃的是自我与他者割裂的“老我”，而形成了我与造物主与邻人

---

[299] 德席尔瓦，《21 世纪基督教新约导论》，536。
[300] 赖特，《新约与神的子民》， 522。

三者的互相和谐。选择的糊涂和难处是来自于人在自我认知的糊涂，对心中所爱及价值观的迷糊。对上帝旨意的真知可以面对一切不确定的确定和坦然。

保罗的生命决策乃聚焦在基督十字架的死和复活中，保罗宣告他已经效法了基督的死(参腓 3：10)，但同时也与基督一同复活(参罗 8：1)；复活的基督拥有了保罗的生命，赋予他更新的活力，末后的亚当基督，成了造生命的灵(林前 15：45；林后 5：20)。教会领导者生命之所是，并非德性修为的结果，并非决策判断的明智；而是因为在基督里的重生。当今，基督徒生命正在全方位更新变化，就是蒙受了上帝恩赐“信心”，保罗的加拉太书第二章和罗马书第五章 15 节以共同的语言结构，重点描述新生命的终末生活论，教会领导者既生活在“肉身”中，也在新创造的“信心”中，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

加 2:20	**罗 5:15**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何况神的恩典)
因信而活,	在恩典里,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赏赐……[301]

与基督耶稣同钉十架死而复活的新生命，是走向终末实在的新生命。耶稣舍己的爱常存保罗的心中(参加 1:4；弗 5:2)，这不仅是情感的记忆，而是他的生命根本，“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 2：20）。

保罗第三次宣教历程的决策，是以耶路撒冷为使命的终点。《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记载，当保罗途经推罗，就在那里与教会的信徒同聚。这时，门徒“被圣灵感动”劝说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徒 21：4），门徒们必是受感预知保罗即将在耶路撒冷遇见的苦害，于是门徒决定提醒保罗此行的

[301] J. Louis Martyn, *Galatians: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vol. 33A, Anchor Yale Bible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59.

凶险，并力劝他不要前往。[302] 紧接着，保罗再来到凯撒利亚传福音的腓利家里，他有四个女儿，是说预言的，更一位来自犹太的先知，名叫亚迦布，他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预言：“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徒 21：11）；多番预言的印证，叫当时在场的信徒们“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徒 21：12），甚至与保罗同行的同工也动摇了此行的决策，加入对保罗的劝说。他们爱保罗何其心切，彼此“痛哭”，但保罗已执意此行。

但保罗为何如此固执不听劝呢？是先知和同工们劝阻保罗的决策正确呢？抑或是保罗往耶路撒冷的决策正确呢？基督徒领导者的决策准则并非事件本身的灵感预知，也非事情结果的得失成败；而是在乎把握圣三一的整全旨意和生命异象和使命之所是。保罗坚定地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显然，保罗的生命所是成就他往耶路撒冷之行的决策，他预备好迎接即将临到的事情，好让他整个生命效法他所爱的耶稣基督。如果每一位基督徒确信自身所是的“上帝儿女”身份，人生决策不能是这般欲望性的碎片化，而是把所有追忆、想念和价值取向全然聚焦于天国之于教会的崇高使命，决策就不是种种欲动泛滥的、艰险的情绪性浊流，而是化为一股汇聚于神圣之生命河的纯粹清流。

三、历代圣徒之生命决策

教会领导者之决策，首要的是在上帝的拣选和旨意中确认天国使命的“生命所事”，从而确认自我“生命所是”。圣三一所启示的真理，在圣经和圣而公教会的圣徒传统中显然活泼地呈现，是人生的必要指导。教会领导者在今世要承接上帝的国度使命，确认自身所属的异象和恩赐，也是关键所在。作为教会领导者，在自我的生命内在省思中，剖析堕落后的罪恶，发现上帝创造的人

---

[302] Le Cornu H. and J. Shulam, *A Commentary on the Jewish Roots of Acts*. 2 vols. (Jerusalem:Academon, 2003),1154.

性实质；从而恰如其分地委身教会——基督身体。以下选取教会历史中两位重要人物：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作为生命决策的范式，从其传记中论述他们的生命改变要素，最后再谈论笔者访谈华人教会领导者的决策要旨进行对照剖析。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的人生重大改变，不能忽略他母亲（Monica）不懈祷告与劝诫。母亲对他生命悔改的影响不见得是快速见效，但在奥古斯丁的记忆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深刻力量。他回忆道：母亲日夜流下眼泪的祷告，摩尼教的所谓博士们无法回应他对信仰和人生之疑问，这是奥古斯丁改邪归正的重要原因。[303]《忏悔录》是奥古斯丁剖析自我最为真诚且经典的作品，他勇敢的揭开人性最幽暗肮脏的地下室，让天上的光辉照耀进去，他要直面人间个人的阴暗面，并公之于众，这是人性最为虚伪和掩盖的地下堡垒。人只喜爱于身体的快感和赌注的刺激，但那飘忽于外在欲望满足的幸福技巧绝非生命决策的要素。为哲学家罗素所不齿之严重影响幸福感的“宗教”罪疚，却是奥古斯丁产生人生正确决策的源泉。[304] 在罗马的一次疾患临危，思念母亲的深深的爱，而满怀愧疚，增添奥古斯丁之向善的心志。[305] 米兰城与著名教父安布罗修的会面，尽管并非成为他真正做出人生决策的关键人物，但牧者的修养敬虔、才华言辞，比摩尼教的教师“福斯图斯”更渊博的知识，打动了奥古斯丁的心，在他的详细描述中，安布罗修富有说服力的释经讲道是导致他脱离异端摩尼教的主要原因。埃及隐修士安东尼以及安布罗修在米兰城外建立修道院的故事，他们的圣洁生

---

[303] 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8—79。

[304] 罗素（B. A. W. Russell）在其《幸福之路》中，论述宗教教育带来的负罪感带有“一种卑鄙的、缺乏自尊的成分”是一种“十分无益的情感”；参阅网络电子书：http://www.readers365.com/nuobeier/016/007.htm，2019.10.3；而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绝大部分篇章都在剖析中心里动机和行为上的那些罪恶，背离神、违背道德、迷乱和偷窃等。

[305] 奥古斯丁，《忏悔录》，81。

活，毅然放弃世俗的情欲满足，饱含圣书的智慧，动人的奉献激情。把奥古斯丁的内在挣扎推到高峰：

> 我既不是完全愿意，也不是完全不愿意，我和我自己斗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这分裂的形成，我并不情愿；这并不证明另一个灵魂的存在，只说明我所受的那罚，是“盘踞在我身上的罪”……永远的真福在上提携我们，而尘世的享受在下控引我们，一个灵魂具有二者的爱好，但二者都不能占有整个意志，因此灵魂被重大的忧苦所陈割裂：真理使他更爱前者，而习惯又使他舍不得后者。[306]

奥古斯丁深刻的心理剖析，教人通透地洞察到人在抉择中的内心世界，这并非是人在赢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乃是与非、善而恶的抉择。因此，在他《忏悔录》最为著名的奇异经历是，他在“灵魂深处……巨大风暴”涌动时，在他向上主痛苦喊叫时，“还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史？”，从邻近一所屋中传来孩子的声音反复唱说：“拿着，读吧！拿着，读吧！”这不是偶然事件，不是莫名的声响，而是来自天上的呼召，他思想中掠过修道者安东尼的故事，他因读了福音书中那段话而人生做出绝然的改变：“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积财在天，然后跟随我。”（太 19：21），奥古斯丁急忙回到住处，拿起使徒书信，翻开来阅读的正是：“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 13：13、14）。他的一切因此更新了，他得以释放，母亲满得安慰，哀伤变为欢歌，失望有了盼望。奥古斯丁的确做成了人生的重大决策，他所谋求的生命目标成就了。行为心理学者认为偏好是决策中的要素，但奥古斯丁之人生改变的决策不是他的偏好促成，而是他战胜原来罪人的偏好。圣徒对自己彻底的否定，就是对自我彻底的新生，这是真正意义的生命决策。

在堕落人性中，任何自我的掩饰只会导致对自我的无知，因此，任何人生决策哪怕暂时获取快乐和幸福，其终极依然要陷于愚妄和绝望中。陀思妥耶

---

[306] 奥古斯丁，《忏悔录》，153—155。

夫斯基毫不隐晦的谈论人性的伪善，他甚至藉海涅批评卢梭其《忏悔录》说了假话好凸显自我的虚荣。

> “在任何人的回忆录中总有这样一些东西，除了自己的朋友外，他不愿意向所有的人公开。还有这样一些东西，他对朋友也不愿意公开，除非对他自己，而且还要保密。但是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东西，这人连对他自己也害怕公开，可是这样的东西，任何一个正派人都积蓄了很多很多。就是说，甚至有这样的情况：这人越是正派，这样的东西就越多。”[307]

我为何如此自我疏离矛盾呢？害我的人生决策患得患失；哪里觅得安身立命的处所？叫疲惫的身躯可得安息；我看不到崇高，但也不能卑微，我关顾自我，但我却要在世界的周遭四处寻找安全感。奥古斯丁寻问了天地万有，他聆听到创造主给予灵魂的回应：圣徒与自我、与世界和好了。

> 我、内在的我，我的灵魂，通过形体的知觉认识这一切。关于我的上主，我问遍整个宇宙。答复是：“不是我，是他创造了我。”……我的灵魂，我告诉你，你是高出一筹，你给肉体生命，使肉体生活，而没有一种物质能对能对另一种物质起这种作用：但上主却是你生命的生命。[308]

圣徒的人格惟有与崇高的造物主相爱，生命的新生产生来自于内在并全人的决策，这是任何外在因素不能抗拒的决策，因为这是来自于上帝所创造的生命之所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悔改并非其描述的重点，对生命之真理的认知才是重点。

> “悔改并不意味着失序的人性经验得以终止，悔改并不会使得自我认识忽然变得简单，并不保证一种有秩序的、合乎理性的生活。在悔改中所改变的事情，是一系列决定灵性运动的要素，这些要素在之前可能是心智所无法触及的。”[309]

---

[307]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臧仲伦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电子书，“一、地下室”的 11 节末尾。

[308] 奥古斯丁，《忏悔录》，191。

[309] 罗云・威廉斯（Rowan Williams），《知识的伤痕：从新约到路德与十架约翰的灵修学史》，邓元尉译（台北：校园，2015），136-137。

在圣徒的生命更新的决策中，不是对以往迷失的空洞追悔，不是莫名的激情向往，是深刻剖析罪恶苦境的缘由、探索人生的答案、取得心中的稳固。世间的智慧仅仅是捉摸到创造主在世界上的普遍启示，这些启示可以成为人生存的科学、成为愉悦灵魂的艺术；但唯有真正认识那位启示的创造主，人始能解脱堕落后的罪恶与死亡的困境，唯有认识他、爱他，一切就都更新了，生命决策是——有他就有一切美善。“我要超越我本性的力量，拾级而上，趋向创造我的上主。我到达了记忆的领域、记忆的殿庭，那里是感官对一切事物所感受而进献的无数影像的府库。”[310] 尝尽人间易逝的幸福，不如来到赐恩的主那里，与他同在。“幸福就是来自真理的快乐，也就是以你为快乐，因为你‘上主就是真理’”。[311]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生于教廷腐败时期，他从小生性多愁，深受家庭暴力、严苛的教育环境所影响，他的心理极端敏感，常受情绪波荡起落的困扰。他对灵异有特别的敏感，他常耳闻目染灵异恶鬼的事件，甚至曾经目睹一只恶鬼从附着的人身上走出来。[312] 他却好学聪慧，从课堂的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中，认识到宇宙天然界的运作，他深信这广大宇宙必然包含灵界的力量，他对死后世界的遐想导致他极为恐惧，大审判的阴影与罪疚不断侵袭他的心灵，所有的恐惧惊吓在他经历斯道特亨雷暴中达到高峰。恐惧与绝望叫他做出生命的决策，他决定进入奥古斯丁修院当修士，进行日复一日的刻苦己身、修行功德，以苦修来换取点滴的平安慰藉。

> 他的整个人陷于极度可怖的不安，他的心神备受痛苦的煎熬。良心的恍惚动荡，即使有什么风吹草动，也可以使他

[310] 奥古斯丁，《忏悔录》，192。

[311] 奥古斯丁，《忏悔录》，206。

[312] 罗伦培登(Roland H.Bainton)，《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陆中石、古乐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7。

> 为之颤栗惊恐。灵魂在梦魇的禁锢底下，难得片刻的安宁，每于晨曦薄暮惊醒过来，乍见那前来取他性命的恶者就在床前瞪视自己……路德一再谈及这些精神上的折磨，并且声称其中的痛苦，要远比肉体上的苦困为甚。[313]

精神病学者认为路德是精神疾病导致忧郁非常，但这种煎熬的的心灵因素的确成为路德寻索最终的解救的强烈动力。马丁路德尝试修院里的种种修行方案，初始对他的心理困境能带来略有好转，但最终都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果效。

他必须寻求更加有效和根本性解决的决策方案。无论如何，路德的人生决策不是在世俗的得失福祸，不关乎财物的拥有和物质投资的享乐主义，而是与奥古斯丁一样，是关乎罪与罚，以及属灵界参与的心灵世界中。他只知道自己的苦罪和将来的审判，他要从自我身上去努力满足上帝的要求。

> 上帝是位公义的上帝，而且他要求我们符合他的义，责备未能符合者。他要求全心全意的付出；但那永不停止去关心自己、观察自己、分析自己的人类灵魂如何能够产生这样一种纯真呢？[314]

路德的信念和经验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他的生命转折性的决策是回归对圣经的重新诠释；他具备的圣经研究能力让他重读新约中的福音要义。他拨开中世纪释经权威之偏差的迷雾，发见“十架神学”和“因信称义”才是福音的真义。

> “我若眼看着我的罪，我就被罪杀掉了。因此我必须望着基督，因为他背负我的罪，使我得福。我的罪不是放在我的良心上，乃放在基督身上……”[315]

马丁路德一直以来都以上帝之义的名义而专注于自身的得救，他开始全然转向专注于基督的救恩，他的生命也因此得以释放。当赎罪券闹剧越演越烈时，路德的内在积郁化为莫大的爆发力，他在万圣节前夕，在城堡教堂大门贴出了九十五条论题，揭露并批评“赎罪券”对《圣经》与教义的违背，他直接

---

313 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33。

314罗云・威廉斯，《知识的伤痕：从新约到路德与十架约翰的灵修学史》，264。

315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基督复活的效能与权能论”，《马丁路德文选》，马丁路德翻译小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84。

批判教会决策的错误。他这份批判性论题立刻在各教会和神职人员之中引起轩然大波。

> “非常奇怪的是，虽然周围各色人等都在谈论路德引起的这场争论，但路德却很平静，他继续沿着自己四年前就已经开始的神学道路前行。他甚至更坚定地认为，基督，唯有基督，是救恩的源泉，是唯一的盼望所在。”[316]

路德的人生决策建立于对基督救恩的强烈的信靠上，他经受自身心灵和外在境遇的极大压抑，但他的得胜是来自于他紧紧抓住圣经的应许。上帝也藉着他周遭的人事境遇让他在危难中保存性命，得以叫他成为教会的领导者，做成改革的决策。

在 1518 年 8 月 7 日，教廷通知路德去罗马受审，必须两个月内到达，当时政治势力也以虎视眈眈的态度要以军事手段执行教廷的判决来对待路德，但路德却在九死一生之时，得到当时德国的领主的保护。

> “情况也许并非偶然：在路德前半生这最为要紧的日子里，从圣奥古斯丁看到‘统辖万物的神秘秩序’——神意的地方；有两个守护天使被差遣给路德：一个守护他的灵魂，即他的老师施陶皮茨，另一个守护他的肉体，即他的领主智者弗里德里希。”[317]

教会领导者决策，不能是自我主体所然，而是上帝的拣选，并以整个的境遇来塑造并护理他所爱的人。因路德所要对抗的是整个罗马教廷及其掌握的政权势力，他甚至要对抗的是“教会”本身，但就是他的决策，竟动摇整个“教会”而成为教会的领导决策。

> “教会的安稳就在此一真正的败坏之中，就在此等不安稳以及无根基之中，它们驱使教会不断返回它的源头，返回成为破碎肉身的圣道。”[318]

---

[316] 詹姆斯·基特尔森（James Kittelson），《改革家路德》，李瑞萍 郑小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8。

317 梅列日科夫斯基，《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杨德友译（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9），99。

[318] 罗云·威廉斯，《知识的伤痕：从新约到路德与十架约翰的灵修学史》， 286。

梅列日科夫斯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引用路德自己的一些回忆片段写下路德的生命关键转折点：

> 他有过三次突如其来的、决定性的宗教经验，三个把人击倒在地、把他的灵魂化为灰烬的“雷电”。第一个实在佐特海姆村暴风雨中，来自圣父：“落在活的永生上帝手里是可怕的”；第二个来自圣子：“我仰望十字架时……看到了光明”；第三个来自圣灵：“如果圣子不向人显示圣父……他们对他也一无所知。”[319]

东正教传统的神学家如此敏感地从圣三一对教会领导者的引导，来论述生命的塑造必然要来自圣父、通过圣子，并在圣灵的见证中。路德诚然赞同，他的生命决策都在圣三一上帝那里，在基督的十架救恩中，他唯有因信称义，他在自我的努力中毫无功劳可言。

四、当代中国教会领导者

从教会历史中的两位教会领导者典范进入当今华人教会领导决策的访谈分享。因本文以中文写作，写作的宗旨主要也是针对华人教会，因此，我访谈的是华人牧者，大多是在中国大陆处境中牧会。

读者从以上篇章的论述中已经清楚论文特征及方法，很显然的，本文并非要建构较受欢迎的实效型决策形式的方略，而是从更趋向于本体论神学谈论上帝、人性、领导者和教会。因此，我对教会领导者的访谈，主要是针对领导决策的本质性问题；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牧者们对神学本质与领导决策结合起来思考的甚少，如圣三一的决策对教会领导者的决策有何光照？牧者们几乎不理解这样的问题。

我在访谈中最大的感受是：教会领导者的决策特点与经济行为决策的特点几乎差异不大。教会领导决策依然存在种种“启发性偏差”，对境遇和目标的理解依然是“不确定性”的。当我们谈论圣灵引导决策时，教会领导者习惯以经验性的直觉或感受来描述——“我觉得这是圣灵的感动”或“我感受到圣

[319] 梅列日科夫斯基，《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73。

灵的引导”。当然，教会领导者确信上帝的存在和眷顾，也深信最终的结局，但在世的教会就如企业一般，在充满不确定性中做出各种不确定的决策；在教会面对当下处境的领导决策时，上帝的旨意似乎并不具体显明。

诚然，正如以上篇章的决策研究表明，上帝藉圣经和教会教义神学的表明并非可以具体化为每一事件的模式性引导，而是需要教会领导者整全的认知上帝启示的旨意之同时，成熟的建立一种人与上帝、人与境遇、人与未来的交互之爱，学习确定性和灵活性的“决策”。在圣灵引导下的人性之“直觉”也要发挥其正确功效。就如教会领导者当初以非理性的“直觉”或“情感”决定成为传道人，最终结出奉献自我而侍奉主的果子，这必是正确的决策，乃是上帝的拣选和圣灵的感动，信仰的关键决策之直觉功能可以是来自上帝借助人心当时无法理解的动态对领导者的生命塑造，且成为在成长过程中习得的恩赐。[320] 尽管正确决策之情感和直觉的非理性功效，也可以作为圣灵的工作，因没有任何善美的决策能脱离圣灵而产生，是全然有赖于上帝的保守；但这种“直觉性”决策不能成为教会领导决策的典范。教会领导者谈论圣灵引导决策时，绝不能忽略圣灵在真理范畴中更为确定性的引导。在教会领导者的信主初期，对“圣灵感动”的理解可以用简要的“直觉”来表述，但随着对上帝的旨意在圣经真理和神学的研究中认知更多时，来自圣灵感动的决策需要更为确定性和深切整全的理性表述，尤其在教会领导决策运用于侍奉于上帝国的事工上。

圣灵的引导是可言说的真理，而非仅仅是经济行为学的判断启发性的决策——选择策略的适应性，就是在信息量不足或信息不可靠时进行快速决策。[321] 情感与直觉常常引发一种缺乏认知资源的迅速判断启发式的决策。这种方式的习惯性使用导致许多选择都是建立在依靠经验情感的非理性基础上。教会

---

[320] 约翰・麦斯威尔把领导的直觉总结为天生与后天经过培训训练两种层面；参约翰・麦斯威尔，《领导力 21 法则》，101-102。

[321] 雷德・海斯蒂 (Reid Hastie)、罗宾・道斯 (Robyn M. Dawes)，《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谢晓非、李纾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224。

领导者的生命决策显然不在于境遇如何，不在于是否聆听到特别的“声音”呼召，而在于价值观念的转换；是确定性的决策。

> “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 12：1）

路德解释保罗的意思是：“按照新律法而论，你们欠上帝一个合理的祭物……就是献上你们合理的服事，就是你们的身体作为活祭。”[322] 身体代表全人的献上，为了更充分地说明从内在的心思意志体现于外在的身体行动上，我们既知道自己是归耶和华为圣，就在善举上有正确的开端，因此，我们必须停止只为自己而活，这样我们才能把生命中所有的行为都奉献给神。[323] 教会领导决策的宗旨不见得一定要成为全职传道人，但必然是按照上帝在每个人身上的恩赐和境遇的安排，在人生决策上以最为全心全意的方式去侍奉主；或许此时的心意无法决定做出全然献上，但必然是在进程中朝向上帝喜悦的旨意。在无神论的价值观中，个人的立场和价值观很容易发生改变，选择的准则很难绝对性的确认，对预期前景的未确定性都导致决策的复杂不确定性；但对于基督教会的领袖来说，人生与世界的整体性真理的越加明确，未来延展的终极信仰，都能使决策趋于越发的明朗。虽然在具体事情发生时，千头万绪是难免的，但是运用的简要决策图表进行梳理是很有帮助的，如决策科学的决策树在世事上常用来分析各种决策的概率胜算与利弊，对事情进行辨析力分析，分清不同立场的差异对错。[324] 而对于教会领导者就更加可以把决策明朗化，除非在真

---

[322]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罗马书讲义》，李春旺译（新竹：中华信义神学院出版社，2006），3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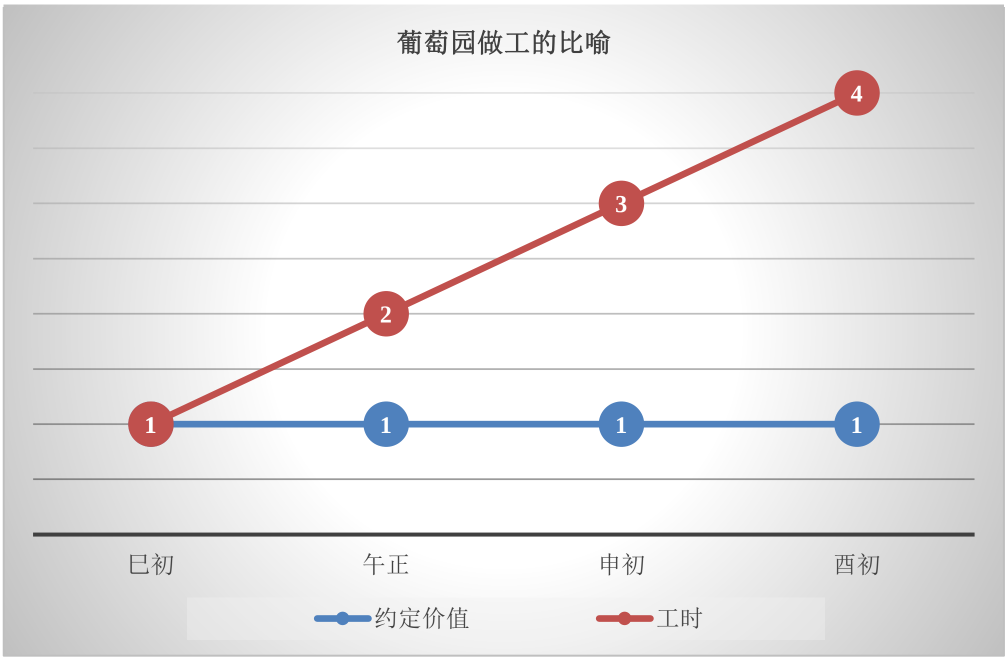
[323] John Calvin and John Owen,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Paul the Apostle to the Romans* (Bellingham, WA: Logos Bible Software, 2010), 451.

[324] 大卫・亨德森 (David R.Henderson) 、查尔斯・胡珀 (Charles・Hooper)，《决策的智慧》，侯君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29。

理认知上缺乏和偏差；要么教会决策基本可以在真理中解除任何不确定因素的扰乱。

《新约》的福音书有许多简明的决策图景为范式，耶稣反复论述人要在天国临近时做出毅然决策，是极简要且富有迫切感的呼吁。可以图表对事件分析的方式谈论耶稣三个有关天国的教训：葡萄园做工比喻、青年财主事例、拒绝一切罪的诱惑的教训，表明了基督徒生命决策的要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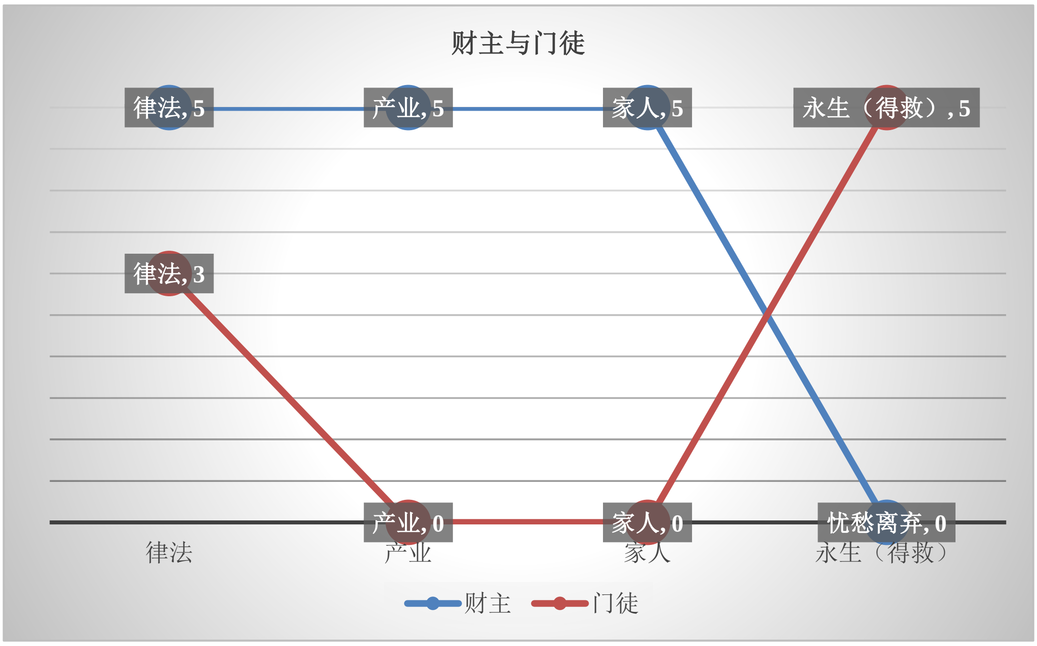
图 A（太 20：1——16 葡萄园做工的比喻，行动、价值感与情绪）



耶稣的天国比喻中，严重地挑战了世界的经济价值观，市场的等价交换的规则被打破了，当然家主并没有不公义，他并没有违背协议，他把讲定的银钱发放给做工的人，只是他却是依然把同样的金钱发放给最晚招来的工人，这样付出最长时间劳力的人与付出最短时间劳力的人得到的报酬就一样了，导致付出长时间劳力的工人的心理失衡，他们的情绪因此被激发并产生不满。正如浪子回家故事中的大儿子，他因父亲厚待放纵自我的、挥霍家产的回家浪子而不悦。家主施恩之决策是天国内涵之一，恩典的决策场景既给受恩者分外的喜悦，也激发局内人对价值判断的重新思考。恩典法则超越了律法的行为经济学

的交换法则，教会领导者必须从劳力的算计决策及其经济投资的情绪中逃逸出来，重新衡量家主的价值观，这才是天国决策的要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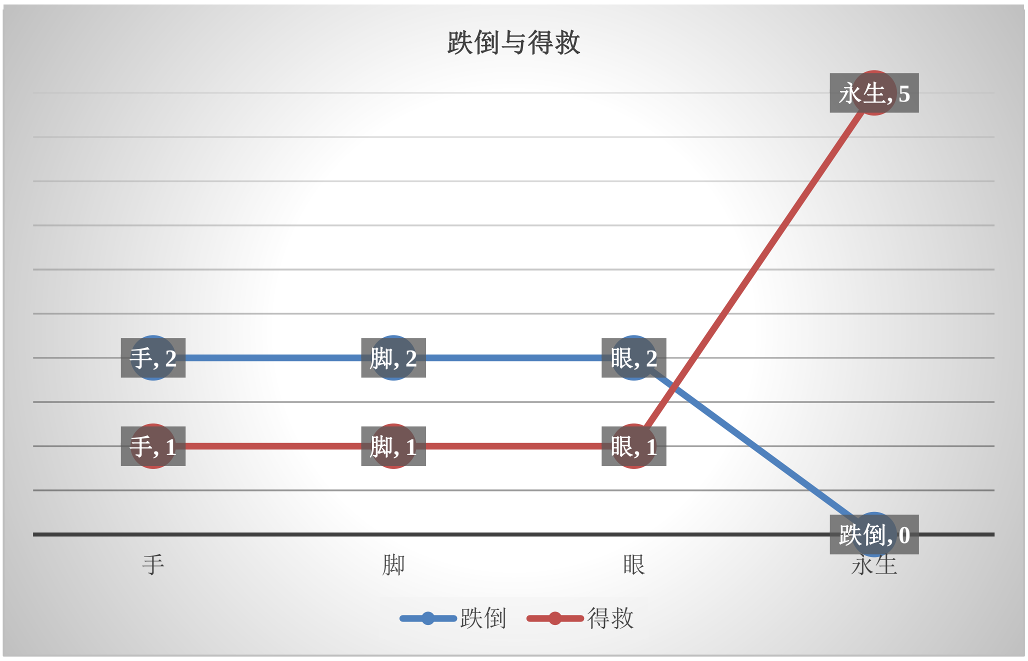
图 B 青年财主（太 19：16——30；可 10:17-31；路 18:18-30）



青年财主拥有遵守律法的崇高道德标椎、产业的丰富和家庭的幸福，这是世俗成功人士的标配了；但耶稣基督却要以永生与这一切交换，这似乎是不近人情的刁难。他的决策挑战是在于人性的三大领域：宗教道德、世界资产、情感依托。耶稣并非要否定这一切的价值和意义，而是要否定这一切成为生命决策的依靠。教会领导者学习的决策的价值判断是：永生前景的预期之确定性，不必在于世上的宗教道德行为、产业丰富和美满情感，而在于敢于放弃对这些价值标准的崇拜。崇高的整理法则，甚至贯穿于决策科学之普遍法则：合理评估价值，能够帮助判断，仔细思考价值，才能做出明智决定。[325]

图 C 拒绝一切罪的诱惑（太 18：6-9；可 9:42-48；路 17:1-2）

[325] 大卫•亨德森 (David R.Henderson) 、查尔斯•胡珀 (Charles L.Hooper)，《决策的智慧》，侯君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54。



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哲学及其价值判断必然专注于——永生；就是三一真神创造和救恩之功效的全然意义所在，这并非仅仅关乎宗教道德中“舍”与“得”的经济行为学之决策，而是关乎——从自我生命的内在关系到群体的关系中，因为群体罪恶的牵连且羁绊，宁愿做出“肉体”的割舍之疼痛的决策，也不能丧失生命的本质。教会领导者的决策是保全生命（永生）的决策；是以自我身份的决策，走向永恒生命主的十架救赎中，是充满“伤痕”的十字架走向复活真实的决策。

第五章 当代中国教会的治理决策

教会领导者的生命决策是教会事奉的根本，而教会群体中的领导决策就是果效；教会群体决策不仅是个人生命决策的反映，更是在圣三一的引导中践行生命团契的见证。好的教会体制能制约教会领导者个人产生的决策偏差，声称个人受圣灵感动的决策必然在教会长执群中得到印证。圣三一的独一共契的本源引导下的教会体制，必然排斥教会领导者的独断专行，基督的仆人领导力引领教会领导者决策时的心思和态度，服侍者不可能以高姿态和专制的方式决策。

一、中国教会的治理决策

在我访谈的华人牧者中，呈现三种华人教会建制的形态，第一种是决策建制声称反对教会建制，他们反对圣职，也反对宗派传统；特别强调教会真正的“头”是基督，每位信徒都是上帝的儿女，因此认为教会体制和牧者职分并非来自圣经，而是对圣经的误解和人的遗传；既然每位弟兄姐妹都是上帝儿女，那么教会决策是否每位弟兄姐妹都要到场商议决定呢？这种议会决策是否就是公理会方式的信徒投票决策呢？当然不是，乃是“有生命”的“带领弟兄”来决策教会事务，他担当“领头羊”的使命，而“生命较小”的弟兄姐妹必须学习顺服，当然必须声明不是顺服领头弟兄，而是顺服基督。他们尊重圣经、唯独基督，也行事严谨。但却把释经和决策职分全然交付给“有生命”的“领头羊”，其无形中呈现基督代言人的“权威”。然而，这种教会决策建构在华人教会的越来越受到新兴教会的冲击而减少。

第二种教会决策建制是在第一种教会建制的基础上改革而成的，是新一代教会领导者经过神学院学习后而产生变革（第一种教会决策体制对读神学比较

反感，认为神学是人的学问），他们开始有按立圣职，教会也形成同工会，有些教会决策体制更呈现公理会模式，鼓励受洗信徒参与到教会的决策中，如在侍奉的小组中倡导让弟兄姐妹提出建议，并表决决策，当然教会重要决策还是由人数较少的“核心同工”进行表决。但有些教会尽管设立同工会，却还以“家长制”方式决策，同工可以提出建议和参与决策讨论，最终拍板决定的依然是教会首要的牧者或长执。

第三种教会决策建制目前在中国大陆慢慢形成影响力较大的模式，就是直接使用西方传统宗派的体制，主要是新一代的神学留学生到西方神学院留学，在神学院或比较有影响力的宗派性教会中参与侍奉后回国，基本全然按照西方教会整套的教会建构实施于大陆的家庭教会中，并实际上也使本地教会成为西方宗派性教会的分会了。目前在中国大陆，有北美改革宗长老会决策建构模式、改革宗浸信会决策建构模式、信义宗决策建构模式、圣公会决策建构模式等。这是中国大陆教会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因年轻的教会领导者在本地缺乏强有力的教会建制传统，但在短短几年的神学学习和教会实习阶段，根本无法从自我传统和西方传统中整合出符合中国大陆处境和文化的教会决策建构来，当然只能是拿来主义了。

在新教传统上，教会论上依然缺失建制上的成熟，导致教会领导者决策上的单边主义和随意性；教会决策论要回归圣三一论的根本上进行反思和改进，圣三一在经世的秩序中行进和展现，教会决策必须有秩序规范的要求。当今教会领导者在决策上的误差和偏执常常表现在两种极端：过于集权，或过于松散民主的教会领导决策，都是缺乏在圣三一上帝引导下之独一性的爱和共契的秩序；教会领导者需要在整个的“肢体”关联中教导“尊荣”和“差遣”；教会领导者的决策“权力”的制约及其分享是源自于生命决策对独一上帝的敬重，而充满活力的团契是本于圣三一的爱。

当代教会领导者谈论圣灵与圣经的关系及如何引导教会的领导决策时，牧者们在把握圣经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如敬拜独一上帝，传扬基督救恩的福

音使命。但在较为情境化的教会事工决策就颇有争议了，如当前中国大陆的政教关系，教会是否可以在政府部门登记受管理？政府干涉并逼迫教会时，教会应对的真理尺度是什么？这类问题牧者们坚持的原则就很有差异。有一方强调圣经的教导是：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无神论”政权就是圣经中的“敌基督”权势，是抵挡上帝者，教会决策必须在宗教政策上宁死抵制；另一方认为按照对圣经理解，任何政权来自上帝，哪怕是恶的政权，也要如顺服上帝一样学习忍耐顺服。当然，双方也认识到并非全然抵制和全然顺服，但如何把握其中的决策尺度呢？圣经引导教会领导者的决策，追根到底还是需要整全地、正确地诠释圣经，秉承福音传统的牧者都异口同声地坚称回归圣经，高举圣经，但却对真理原则性的坚称是这般的彼此矛盾，并引致个人和集体之间的“政治性”之论断和攻击，这显然是沦落在一般决策科学研究的普遍“有限理性”和以情感的、直觉的“启发性偏误”的陷阱中。当然，世上的圣徒和教会不可能实现对真理理解的完满性，但藉神学的决策研究，教会领导决策应该在基督里朝向谦卑的、公义的、契合性的标竿前进。

在对教会领导决策的访谈中，我们最常讨论的简要决策问题是：为何做出这样的决策？大多回应是：“教会的迫切需要，我必须去做”、“这是上帝的旨意和带领”、“我所看到的教会都这么做”、“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加好的决策吗”……但进一步谈到这项决策在本质上的圣经依据是否足够？教会历史和神学论述是否有支持时？大多教会领导者还是表现出礼貌性的不耐烦，其意是这不是明摆着么？现实中，诸多教会领导决策深受境遇和他人的影响，要比慎思明辨来自于圣经和神学思考多得多。如目前中国大陆建立的宣教为导向的决策，几位重要的牧者都谈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教会开放后接触到的海外牧者几乎都是宣教士身份，他们极为重视跨文化方面的宣教；二是、情感上深受宣教士舍己见证的激励，当然圣经也有这方面宣教的描述和教导。但圣经中整全的宣教意涵及其方式是否包含的要比这方面的宣教理解更广博呢？关乎宣教的解经和神学问题，在教会领导者的决策时，常常被片面化了。商业决策的

普遍法则都意识到，最好的决策要比决策的理由更受重视，“许多人都在为自己的行动思考理由，而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做出最好的决策。”[326] 个人及其团体必须常常超越自我决策的偏执，去查验更为广博的真理。

人更喜爱依赖自己既定传统与习惯，形成简便式的思维模式，这就是受制于有限知识的判断，而对于更整全的专业知识的认识缺乏全面性认知。教会领导者有必要谦卑地学习商业团队的某些正确的决策方法，如经验与专长能帮助自我更好的决策，必须不断反思自我的过度自信，以团队参与决策胜过个人，训练统计方法，这些法则对决策减少偏差都是有用的帮助。[327] 对于教会领导决策来说，专业专长就是借助整个教会的大传统，对圣经要有更为整全的理解诠释，越发认识上帝的全部旨意，越发发现自我的渺小，这是最有力克服自信偏执的根本方法，而把自己放在众教会的神学讨论中，并在教会领导决策团队中培训有真理认知的同工，能充分体现共契决策的力量。

在当今华人教会的领导决策中，牧者们共同意识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教会中的“成功神学”，有牧者认为这是教会受到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也有牧者认为华人的文化根深蒂固是实用主义的，就如流行于中国几千年的民间宗教一般，信众对神明本身不需要深刻认知，只要能保平安福气的神明就值得崇拜；也有牧者认为这是灵恩运动的影响。

其实，除了那些很明显的传讲“信耶稣，就平安、发财”的成功神学，在许多缺乏释经和神学之深度和广度的教会决策中，都会潜在或直接表现于“决策的短视症”，就是“由于远期很难预测，因此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利弊权衡会导致偏好和偏见的产生”。[328] 有些教会决策中的这种偏差不易被觉察，教会似乎很有真理性的教导，讲道中都是圣经经节的堆砌，教会不仅倡导热切祷告，更倡导读经，还以殷勤行动力带动信徒传福音；但教会信徒无法深广地

---

[326] 大卫·亨德森、查尔斯·胡珀，《决策的智慧》，4。

[333] R. P. Larrick, Debiasing, In D. J. Koehler and N. Harvey（Eds. ）,*Blackwell Handbook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Oxford，England：Blackwell 2004).

[328] 詹姆斯·马奇，《决策是如何产生的》，168。

感悟到圣三一上帝的内涵和实质，而唯独感受到的“读经”的教条，经文的一遍遍诵读并不意味着“被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 119：130）。而“祷告”中充满着我的生活中对上帝的种种诉求，我爱上帝，但我无意去认识上帝更多。除了“信耶稣，得永生”的基本认识之外，信徒认为只要读经祷告、做“好人”就是好基督徒，哪怕常常高呼“唯独基督”、“唯独圣经”，但基督和圣经却依然那么深奥和遥远，真理教义被固化为获取“得救”的形式和道德行为，难道这不是另一种潜在的“成功神学”吗？

再论宣教导向的教会，教会决策都是围绕着宣教，鼓励信徒奉献，激情洋溢地激发信徒奉献成为宣教士，把教会资金大比例的奉献给前线的宣教机构，这当然具有美善的宣教爱心。但大多教会仅仅关注宣教前线的效应，却缺乏对宣教的全面神学装备之重要性的认知。宣教士经过匆促短期的培训就被送往跨文化的地方去了，因没有充分准备，而最终导致他们深受精神压力之苦。还有以教会植堂之拓展导向的教会，教会领导者的决策焦点主要在于事工的可量化价值上，牧者衡量教会决策的正确准则，想当然的以教会的人数增长、事工规模大小，奉献收入和堂会建设等紧密关联起来，这类决策被理解为一种“效应方案”，这类教会领导决策的性质几乎与世俗商业成功学的决策无异，只是把金钱和公司规模换做受洗人数和堂会规模。其实，教会领导决策基本无关乎人数，关乎的是教会中的每位信徒的“生命所是”和“生命所事”，关乎的是对上帝深切认知且热爱和践行全备的真理，哪怕教会在暂时的受逼迫境遇中是极“软弱且卑微”的小众，却终将要颠覆这世界。

领导者之惰性的决策，表现在满足现状、按照已有形态任由发展，尽可能规避变革所带来的风险，而走向固化后的形式主义，对按部就班的偏好，是人的安逸感所然。这种决策偏差是看不到已有情况的缺陷，就如法利赛人固守僵化的遗传，而面对耶稣基督宣讲的天国福音，以及所带来的一系列本于传统却充满活力的运动时，他们感到无法接受，他们在面对变革的决策上是愚昧无知且顽固的。

教会领导者务要警惕那些错误却被群众性欲求而强化的决策，如“成功神学”必然带给罪人群体及领导者极佳的感受，这种群体的合力偏差必定会产生顽固且巨大的信念。许多获取高支持率和民众拥戴的领导者，他们受到过分的激励而自信满满，并把这些靠直觉的决策归因于直接来自圣灵的感动。

对于世俗的决策者，通常的好决策是遵循逻辑学和概率论规则，因他们意识到自身有限的计算能力、信息缺失，要面对混乱且“不稳定”的情景，尽可能的做到理性决策是重要的，要确立自我的价值观以及对情绪强度有恰当的衡量是理性决策的要素。面向 21 世纪的决策学的前沿研究是如何知晓我们的所喜欢和期待的事物——就是判断个人价值观和效用的心理研究。[329] 而对于教会领导者来说，决策的人与决策的价值和效应之统一关系已经是古老又常新的确定性真理了，只是其过于精深宏大，要贯彻于教会领导的决策践行中，需要付出更加真切、殷勤的释经与神学学习。叶松茂的《101 间香港教会经验分析》充分呈现着这些教会决策的有效性，其中的案例分明证明了本文的研究结果，任何决策及其应用都来自于圣经理解和信仰价值观，作者引用香港牧者苏颖智牧师的牧养信念和自己的服侍见证说明了这项根本原则。[330] 就如拯救灵魂、吸引更多人加入教会、造就主的门徒是圣经启示的大使命，一切决策行动都是为了显明此使命目标。书中展开列举各种践行大使命的方案，如造就门徒的三步曲：吸引、留下、委身，提到以实际性的生活关怀切入的关系性的布道的有效。[331] 作者虽然提出诸多的策略和方案，但表明任何策略对教会本身的有效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教会的有效，这都需要教会本身在处境下寻求合适自己的决策并坚持去践行。但是，教会领导者的生命决策准则并非以事情来衡量，而是以在上帝的命定中成为何等样的人来衡量，确认自身的恩赐，量定自身的标竿

[329] 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43。
[330] 叶松茂，《101 间香港教会经验分析》（香港，基道，2004），22—23。
[331] 叶松茂，《101 间香港教会经验分析》，30。

是最要紧。或许就是做最小的事情，也是合乎是上帝心意的决策；恰恰相反，如果模仿成功案例来套用自身的领导决策中，必然在上帝国中毫无建树可言。

在 2019 年，中国大陆教会面临的是更加严苛的政局，前些年，浙江省政府在对“三自”机构管理下官方教堂拆十字架的政策应用到了基督徒人数最多的河南省，并且在某些县镇对教堂进行合并，强行使两到三个堂合并为一个堂点。而“不合法”的家庭教会却受到强制关闭，成都著名的“秋雨之福”教会的牧者和执事被抓捕并监禁，购买的聚会场地被充公，其余的传道人和同工被遣散到各地并监视起来，一个尝试用福音影响政治文化的有影响力的教会完全失去具体的生存空间，尽管其可歌可泣的故事依然会流传一阵子，但必然要淹没在繁杂的集体记忆中。紧接着，北京大型的家庭教会之一——锡安教会被强制关停，牧者被监视；广州的历史悠久的林献羔牧师创立的教会被强行关闭，信徒只能以小组形式分散聚会。

而在三自机构领导下各地教会在国庆七十周年之际，纷纷要预备献上歌颂党和国家的欢庆聚会。[332] 在极权统治下的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如何把握福音的真谛呢？这并非容易的事情。由福音派基督徒管理的平壤科技大学，学校要在北朝鲜展开任何工作，必须按照国家明令的方式，设立对领袖崇敬的各种雕像在校园中，绝不允许任何传教的言论，学校的美国籍的基督徒教师也经常被各种理由拘捕，成为朝鲜政府与美国谈判的筹码；当校长到南韩为学校募款时，常常遭受严重的质疑，如圣韩网(Holy Korea Network)领导人李浩（Lee Ho）牧师说：“搞了半天，韩国教会在这里建了一个崇拜偶像的神庙。”但作为该大学的创始人金镇庆（Chin-kyung Kim）到韩国的教会筹集资金时，要求会众为了朝韩统一，为了他们在北方受苦的同胞而“出钱”，这种呼吁引发了很多韩国基督徒的共鸣。 这位作为基督徒领导者的学校校长，其奉行的决策理念是：和解是实现朝韩统一的唯一途径，基督教之爱有助于培养和解的态度。他

[332] 中国基督教官方网站的国庆网页专栏中各地教堂唱红歌庆祝场景，http://www.ccctspm.org/special/30，2019.9.24.

喜欢说："我不是资本家，我不是共产党人，我是主张爱的人。"[333] 教会领导者经常也犯有"经验启发式"决策的错误，没有足够整全的上帝国知识，就没有对自我认知的"真理"标准的反思能力，因此，不经意就按照自己既得的经验标准做出判断。

在当今世界上，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准则常以短期效应来判断，这是经济行为学的决策标准，教会在面对政治压制的社会的情景中，教会领导者要思量的是福音效应的长久性及其实在的意义。在这些案例中，教会领导者需要反思决策中的前景蓝图是否符合上帝国的统治标准；基督的君权统治策略并非是表面上应用于对政治的抗争和居高临下的宣教。在耶稣的上帝国事工决策上，卑微才是他的荣耀，软弱才是他的大能，顺服至死才是他要显明复活的能耐。

教会领导者应该反省是否停留在经济行为学的成功范畴和决策偏执中？教会决策不以商业性的成败论英雄，教会领导者热衷于到超大型教会学习决策策略和方法，这的确可以从他人的决策方略上反省自己的欠缺，从牧养方法上得到提升。但不见得学习成功教会的方案精髓，就能复制出另一个成功教会来。教会的决策根本要素还在于上帝所命定旨意及贯彻于信徒群体的组成结构，任何教会领导者团队和情景状况的变化都可能决定着整个决策的变化，这并非一套固定方案可以比拟的。教会的决策的根本不在于一整套方案（尽管这也重要），而在于有否朝向上帝，并对上帝国的整全认知。"整全"并非是教会面面俱到的做出行动，而是从真理的整全性光照，教会不做出偏颇的决策和偏颇的论断，教会决策要在"整全认知"的范围内做出符合上帝命定的这般情景下符合自身身份及恩赐的"肢体性"决策，为成全整个基督"身体"。

教会论是教会亟需深刻认知的核心教义神学之一，"教会"对作为基督身体的认知似乎是陌生的，"教会"沉浸于自我的个体经验，对真理与教义认知

---

[333] 参考颇有质量的微信公众号：圣经语文 中的一篇文章，CHOE SANG-HUN，"在禁止宗教信仰的朝鲜，一所教会大学如何生存？"
https://mp.weixin.qq.com/s/cAmkwGWp3yAYJIHTFWSx-w，2019.9.24。

的肤浅残缺；异象和宣教事工的片面化，对分裂和教派纷争冠以神性的正义且层出不穷， 这都是对这神圣身躯的毁谤和撕裂，政教关系议题，福音与社会，生命与神学，真理与文化，难道都要被二元分化而撇弃么？不，一切“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要被更新且和好了！

二、以一家城市教会为例

笔者从 2001 年开始牧养一家在上海的“家庭教会”，目前由七十位左右的信徒组成，教会大多数为高学历的知识青年，教会在中国情境中不断要提醒保持如基督一样的卑微，并确定教会的身份和恩赐，但教会的决策充满对上帝及其国度的热爱，不断培训上帝国的精兵，走向各处的“禾田”，在其教会异象中可以看出：

> **教会异象：**我们看到 一群彼此相爱的基督门徒，在圣灵里以圣经真理为本、与圣教会及其传统相通（释经与神学），全心全意地爱三一真神（崇拜、祷告与灵修），厉行神国使命、光照被造世界（以基督福音更新人性、光照社会文化）。
>
> 核心价值：圣三一，圣经、圣教会（整全福音及神学）、圣道光照世界（整全宣教）。
>
> **异象诠释**
>
> 圣三一：在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消费宗教、成功神学的诱惑中，重归对圣三一上帝本身的认识和热爱。
>
> 圣经：在以偏概全、谬解圣经的混淆中，重归对圣经之正确和整全解释。
>
> 圣教会：在因无知而骄傲和宗派主义的纷争分裂中，竭力保守圣灵在众教会中合而为一的心，追求圣而公之教会的正统及圣徒相通。
>
> 神国使命：看到三一神在万有中的旨意，以神国的权柄和使命彰显神在万有中的统治、在万有中的公义审判、在万有中的慈爱救恩。

根据以年轻知识分子为主的教会形态，教会决策是以真理根基性的牧养为目标，教会领导者对大陆教会所面临的政治压制的形势并不乐观，教会不应该在这种情景下以大型教会的建构为目标，而是要在信徒生命的“质”上下功夫，他认为要为教会无法多人聚集的情况下多多益善的培养能独当一面的教会领导者，哪怕教会必须分为两三人聚会的情况下，大多数信徒的生命状况和对圣经真理的认知，都能足够起到传道人的功能。因此，教会定下的决策目标是，每位教会信徒要有圣经真理及神学研究的装备，在查经班中，每位信徒都要轮流操练主领查经分享，对圣经经文的章节进行研读和讲解，除了勤勉读经外，还要具备查阅释经书的能力和习惯。并全面鼓励信徒读神学，如推荐教会的在职同工参加神学院的密集课程或网路课程。

同时，教会领导者感受到当前教会最为紧迫性的危机是：教会内部的分裂和外部异端的侵扰。他认为教会在面对两方面扰乱的失败原因皆因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忽视真理知识的深而广的认知。教会中的纷争结党之根本症结是对真理原则的判断片面性偏执，教会无法抵御异端是因为教会真理认知上的浅薄。因此，教会领导者的核心决策是对圣经中真理知识的重视，教会领导者认为先知指向弥赛亚国度统治的有关“知识”的经文可以代表整本圣经中，从律法的敬拜传统、智慧传统到新约的上帝国福音的概论：

>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 11：2—9）
>
>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 2:14）
>
> 以弗所书 1：7——10 “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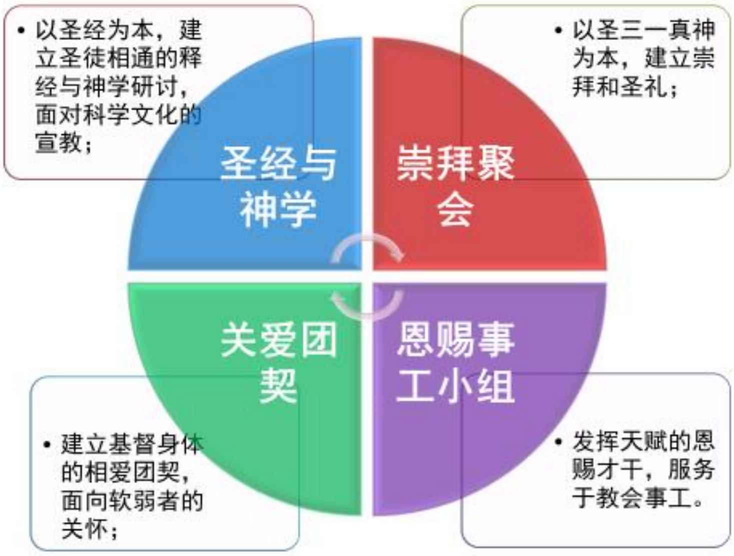
因此，教会设计了代表教会异象的 logo，向每位教会信徒以图像的方式宣明教会的前景决策；下图是教会崇拜场所中显示着教会的 logo 标识：



教会的圣三一论的运用，首要是“一”，敬拜独一真神是教会的崇高原则，从主日崇拜、查经班到生命生活，教会决策朝向至高上帝，尤其是对神学的重视研讨，为的是见证基督福音之真理的原则性和唯一性，除他以外，别无救法，他是独一真神。“三”的方面，是体现群体的多样性与爱，尊重不同的恩赐、不同侍奉的职分，不同的功用，但必然是在彼此相爱中合“一”。

“知识”就是上帝自身的荣耀、性情……圣三一的内在本性和经世决策模式，这乃适用于教会决策的践行。教会的侍奉建构图，表示教会领导者的决策是以崇拜三一上帝为根本，以圣经与神学作为教会论及圣徒相通和面向文化宣教的基础，且把彼此关爱和恩赐事工作为教会建构的决策内容。

福音教会侍奉建构：



在中国的超大型城市中，“家庭教会”多则一到两百信徒；而这是一个仅有七十人左右的小教会，教会有一半以上的信徒有研究生学历；因此这是教会对圣经与神学研究为异象的决策之恩赐基础；为强烈的对抗世俗潮流之知识的技术性和功利化，而重回圣经中上帝要求子民对上帝本身的爱，就是全方位的去认识上帝本身、在上帝的创造和救恩中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性情和工作内涵。因此，教会建构的决策是以查经班为小组单位，是信徒生命关系的团契核心，并围绕着圣经的研读，培训每位信徒参与查经班的主持和研讨，充分让每位信徒参与到与上帝的认知关系中；而查经班的开放性讨论，不仅激发信徒热爱上帝的话语；也能在群体中互相牵动彼此在圣经诠释上纠错；而且防备各种解经上的错误而不至于落入异端。教会培育大多数信徒的真理追求并非误入理性主义的表面文章中；教会领导者激发信徒在情感与意志上的投入一样重要，爱上帝与爱人息息相关，教会的关爱的行动力和真情实感必然带动年轻弟兄姐妹的奉献精神，因此，教会这些年有五分之一的信徒报读了神学院的进修课程，有四位在职同工报读了北美工人神学院在大陆办的教牧硕士班的密集课程，而一年要请假两次，一次两周，这对他们来说是冒着随时失去工作的风险。但他们毅然决定坚持读下来，并且打算继续深造；在上海如此忙碌高节奏的工作境

遇中，他们要参与教会服侍，负担家庭的责任，竟然还要努力研读神学，除非有确定性的奉献自己的目标，那么谁会做出如此付出心思和时间的决策呢？教会中有高比例的信徒进行研究神学课程，应该是普遍教会鲜有的。“培养跟从者，得到相加的效果；培养领导者，得到相乘倍增的效果。”[334]

随着中国大陆在2019年对基督教的管控越发严重时，大量超过百人的教会纷纷被强制关停，教会领导者匆忙做出小组型分化教会的决策，但教会面对的难题是小组分别聚会时，牧者根本无法顾及牧养，培养小组长充当牧者职分迫在眉睫，有些教会只能用速成课程培训小组长，或者让各小组使用视频方式聆听牧者讲道，但这些都不是良好的教会建造模式。这时候，教会亟需多多益善的、有深厚神学基础的信徒领导者，在受外部环境严峻考验的教会，并非需要外在的大型可观，而是需要卑微且有生命内涵的建造。教会领导决策不在乎轰轰烈烈的外显成绩，而是确认上帝在会众中的身份及其恩赐，在查验当今世界境遇的形态处境中，以活泼的自由抉择，朝向确定性的终极前景；并培育生命深刻印证“我之所是”的真理，从而天然地结出“我之所事”的果子。

[334] 约翰 • 麦斯威尔，《领导力21法则》，219。

第六章 教会宣教之领导决策的研究

教会宣教决策是教会领导者最为重要的决策实践，也是这些年来中国大陆教会领导者放在教会核心见证的行动，这一章便以宣教决策作为教会领导决策的例证研究。

一、宣教决策与社会文化境况

从初期教会始，城市宣教是教会的重要决策，城市是社群及文化的综合性据点，是人们最为频繁的集散地。宣教赢得城市，就是赢得福音阵地的制高点。从《使徒行传》叙述中看到，使徒的宣教中心都设立于当时罗马的重要城市中。庄祖鲲博士在《宣教历史》一书中谈到："保罗传教的基本策略有两个：(i)以大城市为中心，(ii)以犹太人聚集的会堂为起点。他宣教的脚踪大多停留在大都市。"[335] 教会的宣教决策必然要为福音与文化做出区分，同时，福音无可避免地必须以文化的形式来表达。文化是传达福音的工具，有时福音需要从一个文化传译到另一个文化，而这种传译的过程称为"本土化"或"处境化"，而福音的目标是呼吁所有文化都需要被更新。[336] 因为人之罪性的缘故，所有文化都免不了在结构和运作上参杂了邪恶成份。崔亨根教授提出，福音、教会和文化的关系是：福音要挑战世俗文化，并重造世俗文化，教会和文化不是割裂的，文化是教会使用的必要工具。[337] 教会是福音的代言者，教会假如没有福音，教会就会迷失，成为世俗文化迷惑人的孳生地——就如成功神学，乃是世俗文化披上真理的外衣。假如仅仅有福音而排斥社会文化，教会就无法担待宣教使命，因为宣教失去了道成肉身的见证。因此，社会文化乃是福音和

---

[335] 庄祖鲲，《宣教历史》，http://www.hrbenlu.com/book/book/cnBook1/bookfulltext.php-nid%3D742.htm，2016 年 1 月 20 日。

[336] 庄祖鲲，《宣教与文化》，第一章 宗教与文化之关系，http://www.godoor.com/book/library/html/theology/xjywh/content.html，2016 年 1 月 20 日。

[337] 崔亨根教授，"福音和文化：全教会、全备的福音、全世界"，歌顿康维尔教牧学博士课程，2015 年 10 月 16 日。

宣教的必要载体，且不仅是载体，还是宣教的对象。而城市作为社会文化的中心，城市必然是社会人群和文化精英的聚集地，城市代表并呈现社会文化各项要素和指标之重要据点，因此，对城市宣教的研究就能明白福音对社会文化之宣教的能力，这项研究也成为建构教会模式的决策基础。

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在其《基督教的兴起》(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一书中，他运用量化分析和历史文献的双重证据，以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论及基督教兴起的原因。罗德尼・斯塔克的研究从早期基督教会的宣教开始，说明基督福音不仅仅在弱势群体中受欢迎，也吸引社会上层，甚至身居高位者。[338] 而这些社会精英和上流阶层都居住于城市中。 正如毕尔麦尔（Bihlmeyer）在其《古代教会史》中提到基督教扩展的原因，也认为基督教会很长时间是一个“城市宗教”后来才逐渐进入农村地区，而基督教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宗教乃是到了二世纪末，富裕人和有学问的人数在基督徒中越来越多，甚至来自罗马高级贵族的人，有官兵成为基督徒。[339] 从两位作者所提供的史料中，可以确信基督教会在初期的宣教决策及其成果是涵盖了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基督福音的宣讲在罗马社会中可以发挥全方位的影响力。城市作为社会文化最为交织复杂的据点，使徒却选为宣教的重镇，宣教决策乃是挑战直面社会文化，从而降服这些社会文化中的精英来为福音服务。罗德尼・斯塔克进一步提出宗教运动的兴起常常是在最世俗化的社会环境中产生效应，并且是在文化上有承接点，在可信任的家庭和社会网络上展开，作者以公元二到三世纪中，犹太人大流散时代大量归信基督教为历史性例证证明了以上结论。[340] 庄祖鲲博士在《宣教历史》第二章的使徒时代中，总结说：

> “基本上，这个时期基督教的宣教策略是采取「适应」的模式。也就是说，如果当地习俗与基督教的教义不相抵触，

---

[338] 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基督教的兴起》(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黄剑波、高民贵译 (上海古籍，2005)，56—57。

[339] 毕尔麦尔（Bihlmeyer），《古代教会史》，雷立柏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34。

[340] 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64—68。

> 教会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如果有冲突，则教会也绝不轻易妥协。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整个罗马帝国大致上是以希腊文化为主流文化，「同构型」很高。因此在宣教过程中，因为文化差距太大而造成宣教的障碍情况还不多。……这个时期一个文化适应的范例，乃是《新约圣经》中的《约翰福音》。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三本耶稣传记相比，《约翰福音》有明显的希腊色彩。他以希腊哲学家所熟知的「道」(希腊文是 logos)，来介绍这位成为肉身、活现在人面前的基督，可以说是匠心独具，而且贴切地将希腊人和犹太人对神共有的概念表达出来。因此，《约翰福音》和使徒保罗的书信，都可以说是文化适应的最佳范例。”[341]

在初期教会的宣教的决策典范中，无论是在圣灵特殊保守下的圣经书写，还是使徒及其门徒之城市植堂策略，宣教都是深入社会文化的骨髓，道（福音）成了肉身（社会文化），道不仅取了社会文化的形式，同时也有力地更新了社会文化。圣言的书写典范也成为后来神学传统发展的书写准则，道的宣讲和道的表达方式需要在社会文化的处境化中完成，并影响和改变那时代的人们。在城市为据点的宣教决策典范中，正是标志了福音对社会文化的高地（城市）之强有力的影响力，城市常成为异教思想和邪恶势力的重灾区，而福音在城市的有力传播，标志着基督福音的宣教得胜，宣教策略显然不是随意性的直觉决策，宣教决策乃是建立于智慧和知识基础上，是“道”以知识向全民教育展开。

从早期教会的城市宣教决策范例中，当代的宣教运动不能忽略以城市据点的决策。当我访谈中国大陆的多位大团队的教会领导者时，他们谈论到的宣教模式几乎都是偏向于关怀社会弱势群体，这的确有利于情感直觉的行动并显明爱的感人见证，中国教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各大型教会团队的宣教方针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因为农村弱势群体的归信更具有情感的热切性，这可以让宣教避开更多复杂的社会文化之挑战而在践行上简约有效，在中国教会经历过的艰难时代中尤其如此。随着中国大陆农村大量人口走向城市务工后，教会也紧随着到聚集务工人口的工厂区附近植堂，教会依然是针对农村人口进

---

[341] 庄祖鲲，《宣教历史》，第二章，使徒时代，http://www.hrbenlu.com/book/book/cnBook1/bookfulltext.php-nid%3D742.htm，2016 年 1 月 20 日。

行牧养，因针对社会文化精英的宣教却难以用行动事例来激发激情的归信，城市宣教需要全方位的知识性谋划决策，尤其是福音要融汇于社会文化的理知中来产生整全的说服力，这对教会宣教的真理教义根基之深厚要求及其文化内涵更富有考验。就如初期教会的见证一般，赢取城市的宣教决策才是福音针对顽固理性的社会群体、针对世俗文化的得胜，才能真正意义的体现教会领导者来自上帝国度的权柄能力。

诚然，宣教并非缺乏爱的激情的理性，宣教决策是在社群和个人人生的种种危机及苦难中产生无尽的爱的能力，基督之十字架的真理有力地解释了苦难的来源和意义。基督徒并非消极的面对生命危机及其苦难，而是积极的以行动向苦难宣战，基督正是在十字架的“软弱”中彰显了莫大的救赎力量。罗德尼·斯塔克对比了历史中大瘟疫时期，基督徒和异教徒面对苦难的两种决然不同的心态和行动，从非基督徒地带之死亡率远远高于受到基督徒照管下地区的死亡率，认定基督教信仰所产生的道德和行动指标及其产生积极效应要高得多，异教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决定性较量，分明是在于灾难性时期最为明显。[342]
基督福音的见证并非是强势者的见证，基督福音绝非采取强制性的统治和压迫，从耶稣基督以十字架作为其救赎的重大记号开始，福音就宣告了教会是走向对社会苦难者和软弱者的服侍群体。基督福音的能力在于舍己的爱，基督徒敢于直面苦难和创伤，并富有担待性的安慰能力。罗德尼·斯塔克以城市社会学家常用的研究方法，用一组关于公元 100 年时希腊——罗马世界中 22 个最大城市的资料进行定量研究，他研究发现，基督教的兴起与当时城市的文化混杂与解构大有关系，城市秩序混乱，社会的动荡不安，疾病与贫穷，文化底蕴的抽离和失落，但却是基督教会充分发挥其无穷的影响力的良好机会。[343] 韩国长老会神学院朴教授(Bokyoung Park)在“韩国的宣教历史”讲座中也论证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后韩国社会百废待兴的困境中，韩国教会在一无所有的

---

[342] 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116。

[343] 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125。

情况下依然派出宣教士到东南亚宣教，教会正是具有这种强烈的意志和舍身精神，才成就信仰复兴，因此，她的主题都围绕着“弱者的宣教”来表明基督教会宣教的原则。[344] 几乎所有严肃的教会历史学家都认同，初期的基督教会比各异教团体更有强烈的规范决策。他们以崇高的道德素养、坚韧的真理信念，为人处世的忠诚和原则性，最大的牺牲精神，亲情友谊的良性关系，以及哲学文化的理性重建是构成一种群体性的整全强力的见证。正如庄祖鲲博士所总结的：“总而言之，基督教与当时的其它宗教相比，她的优越性在于它的「合理性」及「伦理性」”。[345] 基督教会分明可以成为良好的社会和良好的文化的稳健基石，苦难时代的“软弱者”宣教见证福音的能力，福音的光明胜过了境遇的幽暗，福音能温暖无助冰冷的心灵。

“弱者宣教”绝非仅有舍己精神的情绪化宣教决策，而是富有对福音与文化深刻整全认知之智者的宣教。韩国前线(Frontier)总干事李亨利（Henry lee）在“穆斯林宣教”一课中谈到，从神的视角看穆斯林，必须有穆斯林信仰及其文化的深度认知。[346] 宣教是福音与社会文化的深度接触和交流，真理没有进入社会文化，便不是宣教，也不可能有成果。庄祖鲲博士在其“卫斯理的社会关怀”一课中，谈到约翰卫斯理强调信仰与生活的结合，对社会结构性的罪恶也严厉地斥责。在他不屈不饶的努力下，监狱制度得以更人性化，劳工的生活及工作环境得以改善，孤儿寡妇也得到照顾。他最大的贡献之一，是鼓励年轻有为的基督徒政治家持续不断地在国会提案立法，以彻底废除不公不义的奴隶制度。[347] 庄祖鲲博士进而论及宣教双重使命的决策，其精辟总结为：

---

[344]参长老会神学院朴教授(Bokyoung Park)，“韩国的宣教历史”，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2015 年 10 月 14 日。

[345] 庄祖鲲，《宣教历史》，http://www.hrbenlu.com/book/book/cnBook1/bookfulltext.php-nid%3D742.htm，2016 年 1 月 20 日。

[346] 参韩国前线(Frontier)总干事李亨利（Henry lee），“穆斯林宣教”，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2015 年 10 月 15 日。

[347] 庄祖鲲博士，“卫斯理的社会关怀”，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2015 年 10 月 22 日。

> “福音宣教是收割的工作，文化宣教则是松土、培土与撒种的工作。要能达到文化更新和社会改革的目标，必须借着传福音得到更多、更好的信徒。传福音是每个人无可推卸的责任，文化宣教却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文化宣教是治标，传福音才是治本。但是在实施时，往往却是先治标，才治本。”[348]

《基督教的兴起》一书中反复强调“一个新的宗教如果与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宗教有文化上的延续性，则为人们所接受。”[349] 文化的延续性也可以拓展理解为文化上的认同点和共通点。对异教徒传福音，寻找到在文化层面的认可度至关重要，这也是道成肉身的真理运用于宣教的原则吧，并且从普遍启示的神学教义入手，宣教的合适载体是值得探究的课题。从《基督教兴起》一书中的社会学研究结果可以引伸到宣教运动的方法论，人际关系和情感纽带是有效的可行性策略。因此，当代许多新兴教会转以社会文化及其人际关系作为宣教决策的重要议题来对待是值得考虑的。就如华理克（Rick Warren）在其畅销书《直奔标竿》中讲述马鞍峰教会的决策故事，其教会建构不仅仅在于形式和方法，而更把心力放在人身上，形成一个勇于改变的教会文化。[350] 但是，在讨论如何建构适应于人性心理和社会文化的教会决策之前，福音真理的原则性不能妥协的范畴是首要需要厘清的。魏尔斯（David Wells）在《勇守真道》一书中却从另一面严厉的批评了商业社会对教会领导者的严重影响，领导者过度切入社会文化进行教会决策时，就拍卖了基督教。[351] 魏尔斯重点列举营销型教会领导者的决策没有坚守真道，而是为取悦现代人的需要，只要把福音营销出去，不惜放弃教会本有的内涵和严肃，而是过度的投其所好。对于今天泛滥成灾的销售市场，破坏信任的罪魁祸首乃是产品的低劣和急功近利的心理所形成的欺骗结果，而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性和无私性将会使决策形式和人文关怀

---

348 庄祖鲲博士，“卫斯理的社会关怀”，宣教双重使命的实践， 2015 年 10 月 22 日。

349 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131。

350 华理克（Rick Warren），《直奔标竿》序言，http://book.edzx.com/Book/B1259N2883.aspx，2016 年 1 月 25 日。

351 魏尔斯（David Wells），《勇守真道》陈知纲译（台北：改革宗出版社，2010），41。

回归服福音真理的原则并重塑其在教会建构中的有效性。教会宣教决策中建立亲密的信任关系，坚持真理及无私的爱便是必要原则。基督信仰的真理性及其无私精神对宗教中消费群体及其功利心态有最强烈的防备作用，并有效的促使公平和信任。一个市场化的教会领导决策，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而讨好各种群体及其心理，其丧失的便是其核心价值，一味的多样化损毁的是真理的原则性，市场供给的泛滥只会让产品价值贬低。

低成本和快速型的教会领导决策是没有内涵和归属感可言的，庄祖鲲博士在课程“韩国教会的借镜”中提到，韩国教会普遍有“成功神学”的影响，看重数量—无论是教堂大小、信徒人数、奉献金额、宣教士人数等，都成为比较的指标。“增长”成为教会与牧者的口号与指标，而“异象”则是其代名词。”[352] 崔亨根教授在“福音和文化”讲座中也提到：当你行走在韩国首尔的街头上，看到好多建筑物上挂着十字架，但十字架的能力却丧失了，因为韩国信众都专注于财宝金钱上，基督徒忘记了主耶稣曾经教导的福音与世俗的对立关系。[353] 当“成功神学”的指标成为教会决策的准则时，就会产生过分讨好罪人的肉体需要的启发性偏差，其“福音”不仅未能洗净社会文化的糟粕，反而融入虚浮的社会文化潮流中。宣教决策仅仅从社会和人性的普遍索求中去寻找满足和答案就永远没有答案，宣教决策要从社会和人性的矛盾和错谬中去寻找来自福音真道的解救，才是上策。真正的信仰需要对社会文化进行深度和广度的剖析和反思，从社会群体到个体的悖论中去寻找真理原则性的保障，基督教会的建造决策必须来自三一神的启示和救恩，从道德要求和神学理性的要求都是高投入的，这种要求塑造了理知的深度及其信念。因此，城市宣教决策乃是要求更多有影响力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委身于教会，就如使徒保罗一样。尽管基督教是面向所有人宣教的，但教会的宣教决策典范有必要在城市中产生，教导高傲者成为卑微的“软弱”者，去服侍苦难的人们，福音要洁净并征服社

---

[352] 庄祖鲲博士，“韩国教会的借镜”， 2015 年 10 月 13 日。

[353] 崔亨根教授，“福音和文化：全教会、全备的福音、全世界”， 2015 年 10 月 16 日。

会文化，显明福音真理的圣洁和能力。宣教决策要产生严格委身的社会精英，他们具有充分的真理认知能力和重生见证，有力证明福音在其生命的实质里，不仅仅是情感皈依，也是偏差记忆及其经验的彻底改变，他们更要甘愿成为背负十字架的宣教“软弱者”。

二、宣教决策的本体论与教会教义传承

宣教决策仅仅研究其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性是不足的，宣教决策的本体论的主要课题是追索教会历史中教义的传承性，宣教决策的智慧是建立于洞察圣灵在教会历史中的作为基础上，因为宣教是福音宣讲和教会建构的结合体，宣教决策无法轻忽教会本质和宣教内涵的正确性。

毕尔麦尔（Bihlmeyer）之《古代教会史》的重点在于论述正统教义的建立，如三一论和基督论在公会议中得到确认的曲折和艰难的过程，在异端和正统的对抗时，那些重要的神学家起到决定性决策的作用，在诺斯底主义等异端猖獗时，二、三世纪的教父们奋起抗争，古教父为基督教义的建立做出极大贡献。第四、五世纪也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圣经的汇编完成、重要神学家的涌现的时期，毕尔麦尔提出这段时期是“基督教神学的古典时期或黄金时期”[354]。曾经被世俗政权迫害的教会团体终于成为政治的指挥者和控制者，教会拥有权利去发挥全方位的影响力，一般人以为这是教会宣教决策的最有利时机和境遇。但从君士坦丁的开始把基督教特权化后，历代的世俗政权者，只要有机会总要从教会的影响力中谋取政治上的益处，这是人性私欲之所然，而教会中的诸多神职人员在这权利诱惑中，不至于失脚跌倒者可畏寥寥无几。地上的政治利益是一种诱惑，强权并不能成就十架救恩，更非福音的良好载体。

然而，政治与公会议的决议有着交织的关系，历史上最重要的公会议核心是有关“三一论”、“基督论”和“救恩论”，第一二次的尼西亚大公会议

[354] 毕尔麦尔（Bihlmeyer），《古代教会史》，雷立柏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34。

建立了对抗亚流主义的正统“三一论”；第三次的以弗所会议、第四次的卡尔西顿公会议对抗各种对基督两性混淆和割裂的说法而确立“基督论”，在各大公会议举行的同时，以奥古斯丁为首要的基督教神学家也驳斥伯拉纠主义的神人合作说，强调救恩是来自于神的主权。毕尔麦尔论及教会的组织决策时，对于神职人员在中世纪的规范、特权及其神圣性都有详尽的论述。罗马教宗的地位一直面对挑战，特别是东方教会的质疑。多任杰出和有影响力的教宗倾注精力在稳定教会的合一、宣教，处理政教关系。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分明看到，公会议和整个中世纪的教务事工，都离不开“政教合一”的决策力量，其中也自然产生种种的困难和争执。教宗格拉修一世（Gelasius I，公元 492—496）所宣告的政教关系原则似乎成为后来的典范，“主要有两种力量统治这个世界，一个是主教们的神圣权威，另一个是国王的权力，但这两个权威中，第一个有更大的份量，因为它在上主面前也要为国王们负责任（照顾他们的得救问题），反过来，在公共秩序方面，就是在世俗的事务方面，宗教的首领们也必须顺服皇帝的法律。”[355] 但教会对世俗政治的依赖是危险的，正如莫菲特（S. H. Moffett）在其《亚洲基督教史（一）》中，论及教会在中国的二次消失，都是太依附于政治集团的决策，就如元朝的最后十年蒙古人大势已去时，当时依赖元朝政府的基督徒家族便改信了儒家和道教，而元朝政府灭亡后，基督教也就消亡了。[356] 因此，教会的决策建构有其政治意义，正如福音不应脱离文化一般，教会建构及其决策也不应该脱离政治法则及其领域，但教会领导者的决策绝不能依赖于政治，尤其混合于世俗政治中。

关于礼仪和圣事的教会决策，除了洗礼和圣餐，忏悔和补赎，告解的做法显明了教会赦罪的神圣权柄，以及神职人员和信徒犯罪后的一系列行动确实有警戒作用，如守斋剃头、穿上隐修者衣服，放弃商业活动等，专心祈祷和禁

[355] 毕尔麦尔,《古代教会史》，249。

[356] 莫菲特（S. H. Moffett），《亚洲基督教史（一）》，中国神学研究院编译（香港：文艺，2007），496。

食等。节日和守斋日的活动在中世纪教会中也成为繁琐且必要的教会活动，但日久未免流于形式而僵化，但对于培养信徒的崇拜意识并非是毫无意义的。而对圣徒和圣物的尊敬以及产生的种种习俗却引来了极为负面的情况，如这些圣徒及其圣物的崇敬日后演化为各种迷信以及圣徒物品的商业性炒作。无论如何，毕尔麦尔在史观上提供另一角度，其文本数据详尽和充实，书中记载教会在历史上之教义的重要建树，以及教会体制建构、礼仪和政教关系等。最要紧的是，中古世纪的教会也有值得探究认识的宣教典范，正如在庄祖鲲博士在《宣教历史》一书中的评论：

> “西方教会站在中世纪的门坎前，面对的是一个野蛮的异教世界，教会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把基督教的信仰介绍给他们，另一方面还要教育这些人。但是教会已失去了罗马帝国的保护，教会本身也有一些腐败的现象，只是教会仍有健全的教义、强大的组织和一批热诚的福音使者。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千年中，他们在这双重使命上，有辉煌的成就。在蛮族倾覆罗马帝国后五百年，欧洲的新兴国家几乎都成了基督教国家。再过五百年，即公元 1500 年左右，这些新兴国家也都已发展出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所以，在中古世纪，教会不仅是宗教的捍卫者，也是文明的缔造者。”[357]

显然，神学教义和教会体制是中古教会建构的核心和重点，而教会的宣教运动基本来自政教交织性的推广，当然，教会在文化和教育等领域更是有莫大影响力。

《古代教会史》论述教会在建构和拓展中，有关神论的争议成为教会的核心，如三一论和基督论。同时，教会的组织制度、教义、礼仪和圣事也深受重视，因此，教义和圣事是教会论的核心内涵。而改革后的教会强调的却是唯独救恩、唯独圣经、唯独信心，教会论内涵剔除好多形式的神圣性。居普良的名言：“教会之外无救恩”，“谁不奉教会为母亲，谁就不能奉上主为父”

---

[357] 庄祖鲲，《宣教历史》，第五章 基督教在欧洲：中古世纪前期(500-1000 AD)，http://www.hrbenlu.com/book/book/cnBook1/bookfulltext.php-nid%3D742.htm，2016 年 1 月 20 日。

对于中古教会来说，教会领导者决策包含属灵内涵和外在体统。[358] 圣经表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合一性和神圣性在保罗的《哥林多书前书》和《以弗所书》中有清楚论述，而改教后的传统更是以教会的属灵意义来诠释，而撇除大部分中世纪教会传统的有形结构。在以下论及十九世纪后的各种复兴运动时，信仰教义的核心性与宣教中采用各种形式的介入之争议，就是对形式的神圣可行性是否有损于教义内涵的争议，这争议亟需在传统和神学上找到真理原则来解答。教会决策中的属灵内涵与形式体统的关联与建构的原则性，可以延展并应用于政教关系的梳理与分析，也应用于信仰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处理等。就如天主教会和新教有关教会与圣经的关系的决策争议中，是教会产生圣经还是圣经成为教会的源头，这些争议的本质也就是“道”及其肉身的关系性问题，是内涵及其彰显的关系。我们以上的圣灵论篇章中已经论述过了，圣灵才是教会形态和人事及其产生的神圣性事工的源头，圣灵不仅仅运行在真理和教义上，也运行于教会的体统和形式里。

从教会的教义历史说起，主要是要论及教会宣教决策的本体论，教会宣教决策在原封不动地推出信仰的核心真理时，是否需要外在形式的载体呢？抑或福音真理本身就是载体？真理本身是否排斥形式上的谋划？前韩国宣教联盟主席姜胜三教授（samuel）在其“世界宣教的潮流与韩国宣教”中提出宣教的主体便是上帝自身。[359] 宣教决策要重归神性本质和信仰的教义基础。宣教学常被认为是偏重于宣教策略、文化和人类学的研究和实践，但近年来的另一股宣教学研究思潮却提倡宣教学要重归上帝的本体论思考。正如莱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所言：“把宣教神学与实践建基于上帝的宣教、建基于我们对上帝属性与作为的敬拜，是何等地重要。从这角度来看，我们必须

---

[358] 毕尔麦尔,《古代教会史》，33。

[359] 参姜胜三教授（samuel），“世界宣教的潮流与韩国宣教”，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2015 年 10 月 19 日。

先维护上帝，才能维护他人”。[360] 他赞同并引用以前宣教神学家的话：“宣教的这种三一基础理应清楚显示，宣教的首要主体和源头是上帝，不是教会。教会的宣教必须始于敬拜，不然一切将沦为社会激进主义及缺乏目标的计划。”[361] 莱特正确地提出宣教决策必须以三一上帝及神本研究为根本点。当然，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宣教的上帝之主题也未必要排斥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重要性，宣教决策的形式和内涵是一样的重要和彼此紧密关联的。前洛桑运动的主席崔亨根教授在主题宣讲“福音和文化：全教会、全备的福音、全世界”论及上帝的宣教，宣教就是从上帝的本性而来的：“上帝的宣教源自于上帝的爱，上帝子民的宣教源自于我们对上帝的爱，并且向上帝所爱之所有人的爱。世界的福音化是上帝的爱流向我们，并且通过我们流向世界的结果。”（《洛桑开普敦信约》第一部第一章），他谈到宣教决策的根据可在三位一体中发现，也就是说：宣教是圣父、圣子、圣灵把普世教会（所有基督徒）向世界差遣的行为。（约 20：21—22），他甚至提出宣教比教会更为本质性，因先是有了宣教才有了教会。[362] 因此，宣教决策绝非仅仅形式和策略的研究，宣教决策的是一项本质性的神学，宣教决策是三一上帝在他所造的世界的彰显教会的宣教应该回归宣教的教会，宣教决策的本体论就是上帝的本体论，是对圣经和教义的深刻且慎重地思考。

姚西伊博士在歌顿康维尔神学院中文教牧学博士课程中总结“宣教的上帝”之主题时，他精确地提出：“宣教的上帝”之命题把宣教研究提高到三一上帝的本质中，使教会成为宣教器皿，而非主体；“宣教的上帝”的正面性是让宣教成为信仰的核心，是上帝论和三一论之教义性的教会实践，让宣教神学追溯到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本源，而其负面性是解构教会在其中的核心性，

---

[360] 莱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宣教的上帝》，李望远译（台北：校园出版社，2011），32。

[361] 引用 carl . E. Breaaten, “The Mission of the Gospel to the Nations, ” *Dialog* 30（1991）:127. 另见 Lesslie Newbigin, *Trinitarian Doctrine for Today’s Mission* （Edinburgh: Edinburgh House press, 1963; Carlisle , U. K. : Paternoster,1998）.

[362] 崔亨根教授，“福音和文化：全教会、全备的福音、全世界”， 2015 年 10 月 16 日。

宣教决策并非可以超越教会而产生。[363] 是的，三一上帝与教会的关系并非分割的关系，教会及其领导者的决策乃是上帝的创造和救恩的见证。博许（David J. Bosch ）也提出“教会的宣教不能与上帝的宣教分割”，宣教的决策基础、决策目标和决策本质是必要回到宣教学的耶稣典范和圣经诠释基础上，并以历史传承性和各教会形态的宏大整合，同时也考证文化处境的特殊性，作者提出“脱颖而出的普世宣教典范”就是整合性的活泼有力的“更新变化的宣教”。[364] 莱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也更加鲜明地提到，上帝更伟大的宣教领域就是大地及人类，宣教必须包括全世界，与人类整全的生命及需要互动，因为在智慧文学中就可以分明的看见一个包括全受造和全人类观点的世界观。[365] 保罗书信提出，复活的全能主“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弗 1:22、23），教会作为复活主的身体，其深广的使命就是面对被造的万有，而非某种超然狭隘的层面。因此，宣教神学要追索教会历史的传统，圣经和教义，三一本体论，但宣教的本体论并非要排斥教会（基督身体）的形式，也就是说，本体内涵要与外在模式充分紧密地关联起来。三一论要与教会论结合，真理教义要渗透并延展于文化人类学中去，整全宣教学要回归教义的本质性，并要涵盖如此广泛的诸多课题，对现代的宣教学及其教会模式来说是增添了精彩的同时，也提高了相应的研究及建构难度。

三、宣教决策的实践焦点：从复兴运动到教会模式

以上篇章是从教会传统的教义教会学到宣教决策本体论来看真理的整全性，信仰的内涵，教义和实践。宣教与教会的实质和形式，都有必要重新整合起来看待。接下来的篇章是以教会历史中的宣教复兴运动为例，来探讨教会决

[363] 姚西伊，“当代宣教的议题”，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2015 年 10 月 23 日。

[364] 博许（David J. Bosch ），《更新变化的宣教》，白陈毓华译（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1996），10。

[365] 莱特，《宣教的上帝》，524。

策模式的确当建制。在庄祖鲲博士之《力挽狂澜的约翰卫斯理》一课中，以约翰卫斯理在十八世纪的西方教会中为典范，[366] 复兴运动必然成为教会决策的重要转折点，但复兴中所面对的问题是教会决策如何建立合乎圣经的模式？而复兴运动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可以表明其教会论的正确性，教会决策模式的标准乃是教会面临变革中所要量定的尺度。

伊恩•默里（Ian H. Murray）描绘历代圣徒的复兴事工，他首肯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是各宗派决策中体现出的包容和接纳，他强调这是圣灵浇灌下爱的见证，也是基督教会复兴的印记。[367] 作者书写复兴运动的正面之处，乃信徒敬虔祷告，产生言行一致的牧者，谦卑和竭力地做工，加尔文宗、圣公会、浸信会和循道会之间的求同存异，共谋上帝国事工。[368] 我赞同作者强调复兴不仅是教会领导决策所产生的一种表面运动，而是信徒的属灵品格重塑，对主的教会高度委身，复兴中注重神学教义，教导纯正的真道。但作者更多是剖析复兴中的虚假之处，如人数上的浮夸，复兴后充斥假信徒的教会形态。尽管作者反复强调，圣灵在复兴中的工作必然显明为基督身体——教会中的合而为一。[369] 当伊恩•默里论及加尔文主义和循道会的阿民念主义之间的纠葛时，书中对阿民念主义神学的呈现颇为客观。[370] 而现在华人改革宗在网络平台上的文章对阿民念主义的攻击就显得火药味十足且狭隘得多。无论如何，彼此相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重要命令（参约 13:34、35；15:12，17），也是教会决策最要紧的见证（弗 2:14，4:3）。钟马田（Martin Lloyd Jones）论及复兴乃是本来沉醉软弱的基督徒经历的属灵苏醒，从而使那些本来对基督信仰漠不关心的人

---

[366] 庄祖鲲博士，“力挽狂澜的约翰卫斯理”，歌顿康维尔教牧学博士课程课堂笔记。

[367] 伊恩•默里（Ian H. Murray），《真正的复兴》(Revival & Revivalism)，张宇栋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28。

[368] 伊恩•默里,《真正的复兴》，67。

[369] 伊恩•默里,《真正的复兴》，80。

[370] 伊恩•默里,《真正的复兴》，156。

悔改信主。[371] 他一方面批判天主教会、圣公会中没有出现历史中的复兴；而历史中真正的复兴，如莫拉维拉弟兄会的复兴，约翰韦斯利的复兴，爱德华滋和怀特菲尔德的复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在福音的原则上，教会必须破除宗派的分裂，要有合一的见证。“对我而言，最令人作呕的事，或是最远离《新约圣经》精神的事，莫过于党派精神。”[372] 宗派主义、教会内部的纷争恰是教会中属灵低潮的表现。但这两位作者在批判复兴运动中的错误时，其对教会决策的标准还是难免具有宗派前设。钟马田反对教会决策推行政教合一，他指出借助政治手腕来推行教义和教会意志绝非基督和圣经中教导的做法，要以宣讲纯正的福音为核心，在福音中不能有任何打折扣，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守圣经福音的纯洁性。和伊恩·默里一样，钟马田把芬尼的奋兴运动作为复兴运动的负面范例；作者强调的观念是：“复兴并不是因为传道人付出任何特别努力而有的结果。复兴不是由人兴起的，而是在教会正常的礼拜过程中突然发生的。复兴不可能预先计划或宣告出来，经历过复兴的人都知道，只有上帝才能决定复兴的时间。”[373] 祷告和讲道是伊恩·默里认为复兴的教会体现，任何人的决策作为都是仰赖上帝的恩典，彰显上帝至高的计划和作为，是圣灵的权能工作。他认为复兴运动就是教会领导决策无需过多的决策方式，唯有放在传讲真理上即可，圣灵的工作便出人意料的浇灌下来，形成感召力。并非祷告带来复兴，而是祷告乃复兴的明证。

我赞同作者对于复兴运动的必要提醒，教会领导决策就是教导纯正的圣经真理，让信徒们有坚实的信仰基础，当代教会领导决策的复兴运动中，各种引导慕道者进行匆促认信的行动确实具有破坏性，教会内部的负面事件都源于教会复兴中的浮夸，许多假信徒涌入教会，没有得到生命的更新，这只会成为教会的破口。作者所揭示的那些狂热现象，如大声的哭号、呻吟和尖叫，这些

[371] 钟马田（Martin Lloyd Jones），《清教徒的脚踪》(Puritan Papers)，梁素雅、王国显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217。

[372] 钟马田，《清教徒的脚踪》，177。

[373] 伊恩·默里,《真正的复兴》，181。

宣泄情绪的体现并不能代表真正的认罪悔改，更不应该把其作为圣灵重生或充满的凭证，圣经中的崇拜，常是安静严肃的，而非一味的喧闹和狂热。伊恩・默里批判美国布道家芬尼所主导的布道“新措施”，他指责其“是采用圣经以外的方法来引起听到福音者的响应……为引导听众注意而说一些危言耸听的话、公开评论某些特别的人、提名为一些未信主的人祷告，及使用慕道友聚会的方式迫使个别人祷告或顺服等。”[374] 布道者借助群体聚会的特殊环境来点燃激情之火并非违背真理的行为，任何组织者或宣讲者掌握某些方法来激发情绪的宣泄是群体的普遍现象，在激情洋溢的政治运动和歌舞会场都能达到这种情感效果。但值得探讨的是，这些决策方法是否可以被真理的圣灵所运用呢？这些情感决策规则和情绪表露是否就归于邪恶的范畴呢？当然，情绪的煽动不是教会决策的复兴根本和关键，教会的复兴绝非人为的产物，这是教会复兴的原则性所在。芬尼的复兴决策是否仅仅依赖于情绪和方法，作者的论证还是不足够的。芬尼注重人的决策作为，他或许在复兴运动的策划形式上产生意气用事的偏激，他的神学认知也可能不整全。但教会复兴的唯一正确模式是否就是人仅仅需要等待，而节制人的作为么？教会建构决策不应该漠视基督徒在复兴中的责任，对人的行动之强烈召喊充溢在整本圣经的教导中。决策方法和决策中激情不是复兴的关键，而教会决策模式所见证之人的作为、方法和激情充分反应了教会信徒的心志和使命感，更反映教会的教义和神学的整全性。伊恩・默里在书中两次客观的论述阿民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分野，[375] 作者认可两者核心教义的共同性，如上帝的主权，需要人的悔改和全然的救恩，而加尔文主义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人无法用任何的方法和努力博取救恩和信仰复兴，但阿民念主义更强调人的责任，认为人的自由意志在对神的救恩中起到重要的响应作用。伊恩・默里并没有过分批评阿民念主义，但他揭示复兴中的“新措施”和“新方法”是对传统教义的颠覆性，乃离经叛道。在《真正的

[374] 伊恩・默里，《真正的复兴》，212。

[375] 伊恩・默里，《真正的复兴》，156，303—305。

复兴》一书的最后篇章，作者再次申明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整体来说，撇除宗派之争，成就基督国度的合一性何其重要，但作者也警示合一不能以折损真理的原则性为代价。我对整书表明的立场的理解是，作者竭力坚守真理的原则性及其教义内涵，却在批判那些人的情感和形式的决策尝试时，也排斥了人的决策行动及谋略的重要性。

人的决策方法和措施并非产生救恩的原因，而是救恩临到的见证，即便在救恩现象临到的前夕，那些决策反应和行动都是在向仇敌夸胜。布道会中走到台前的呼召，决志祷告，是否可以断定为人为的因素来掩盖圣灵的工作呢？这些布道“新措施”是否更助长那些生性冲动者的自信行为呢？难道圣灵从未在人的实时的情感和直觉的决策行为中工作么？从初期教会的归主运动到如今，信以致知，靠赖神恩和圣灵工作的信心必然是本于由上而下的超然工作，而显明于日复一日地渐渐对圣经真理及其教义的认知。圣徒都是从婴孩般的本能投靠到成熟的理知委身。教会领导者的决策模式中的“新措施”及聚会中信徒决策的身体反应，甚至口中的任何宣信都不能成为重生得救的凭据，这是不言而喻的。采取决志祷告和布道中鼓励走到台前行动的复兴运动也非一味的倡导悔改行为而不注重成圣的过程与认识真理。或许在复兴运动的某个阶段，采取“新措施”决策的复兴运动有所偏颇，但决策的方式和方法本身的意义和重要性并非必然与上帝的主权和救恩教义对立起来。真正需要防备的乃是救恩重心的偏离，教会领导者决策要提防的是对教义的误导和人本主义的侵入。因此，复兴运动的牧者决策亟需整全的福音真理的认知和正统神学的装备。我认为争议的焦点不是“新措施”的决策本身，而是神学和教义的核心性，是牧者决策判断的真确性所在。复兴需要的是祷告、决策激情和认知真理的整全。假如仅仅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者的作为还不如行动者来得更接近圣灵。复兴并非透过人的某种既定的决策方法，但也绝非出于人的无所作为的决策。正如作者警示那些过分人为的、急功近利的教会领导者的决策模式，但人的懒惰和懈怠也很容易从另一极端面找到借口和掩体。

卡森（D. A. Carson）在其《认识新兴教会》一书中，他批评那些自夸超越宗派主义的新兴教会领袖们，当他们否定其他教会的决策形态，并竭力倡导一种教会新模式和新格局时，他们已经在破坏教会的大公性，并成为最偏激的宗派分子。[376] 如何在教会领导者的决策中把握真理的原则性呢？是回归圣经？是正统神学？但正确的圣经的诠释和正统神学的厘清依然是历史中教会的重大议题和回归认识三一上帝的核心。教会复兴的决策依然是要传讲来自圣经和历代圣徒所传讲的，就是三一上帝的本性和基督的救恩，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决策来自救，也不能以道德决策换取救恩。在人的整个悔改和生命的重生中，全赖于三一真神施行拯救。但在上帝国事工中，人必须尽上全然的心志智慧、意志和努力做出生命决策。教会领导者在复兴事工中，必须重建正确的、本于圣经的教会观。但基督教会，必然有基督身体的内涵和形式，必然带着十字架之创伤的印记。如果一面高举基督福音的信仰，一面践踏基督的身体，在教会中挑起争斗分裂，那是何其荒谬的事情。尽管钟马田曾提出阻碍复兴的因素是，现代神学的兴起和更正教神学的衰微，神学训练和知识的加增反而使灵性减弱。[377] 但钟马田更是认为知识对牧者的牧养不可或缺的重要，[378]《清教徒的脚踪》一书以一个篇章来论及真假知识，这对于今天的读神学的教会领导者尤有启发性，他注重知识的重要性和意义，但也提出知识是为了爱上帝和热爱上帝话语——圣经的良好辅助，特别警示那些把知识本身作为追求目标的学术人，还有那些似懂非懂的“半吊子学问”的危险性。[379] 在今天教会领导决策的乱象中，纷争大多缘由于骄傲的入门者，这种情形如同刚懂得一点知识的小学生热切地要表现自己的认知一样热烈和自我显露，使其争论情绪高涨且决策充斥着各种偏差。因此，知识的神圣性、整全性何其重要，这也是教会领导决策的合一性

[376] 卡森（D. A. Carson），《认识新兴教会》，潘秋松译（美国麦种传道会，2007），218。

[377] 钟马田,《清教徒的脚踪》，219—220。

[378] 钟马田,《清教徒的脚踪》，304。

[379] 钟马田，《清教徒的脚踪》，255。

基础，正是保罗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腓 1:9）。

以上谈论的是教会历史复兴运动中的决策方法论之争议，接下来乃是探讨新兴教会的决策情况。魏尔斯（David Wells）指出当代福音派在真理立场的不坚定，导致教会在教义上的萎缩之危机。[380] 他批评新兴营销型教会兴起只是利用了古典福音派的资本，却是为了偏离正道的目的，市场性的商业社会对教会决策的严重影响就是各种新潮的电子产品的大量使用，对消费决策需求的调查和敏感，教会事工的市场化运作的决策，都是作者对营销型教会批判的材料，而新兴教会更是站在福音派的殿堂之外，以开放与对话作为他们的决策特色。[381] 我赞同魏尔斯竭力提出教会要为以圣经为基准，教会持守绝对真理才是唯一出路，新兴教会模式实行后现代的推崇自我确实是教会领导决策的错误之举，后现代的虚无感和无中心性是教会领导者决策的挑战，罪把人带入虚无主义中去，上帝的救恩确给予个人和社会重归决策的真实核心，罪与律法，十字架救恩和上帝必然的得胜揭示了人的决策责任。在分崩离析的现代社会和人性中，回归上帝救恩的重生基督徒，必须见证圣洁和痊愈的生命光景。魏尔斯说得好：基督，基督徒与异教徒有着迥异之途，后现代之世俗化却又重灵性的情况叫人混淆，自然法则不能代替救恩，唯信靠耶稣基督才是除罪得永生的法门，更是教会唯一宣讲的真理核心。[382] 基督耶稣的教会必须与罪恶世俗社会分别为圣，并叫人得到生命的更新。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必须坚持圣经真理，教导教义，实行护道和圣礼，警戒信徒远离恶事，让基督徒完全降服于上帝的统管下。

新兴教会与营销型教会的决策模式弱化了教义和神学是解构教会核心的危险之举，但教会借助世俗潮流的音乐和电子产品是否意味着向世俗化社会的

---

[380] 魏尔斯，《勇守真道》，25。
[381] 魏尔斯，《勇守真道》，33—36。
[382] 魏尔斯，《勇守真道》，208—209。

妥协呢？以吸引慕道友作为教会目标的教会模式是否都已经偏离正道呢？魏尔斯提到柳溪教会和马鞍峰教会是营销型教会的代表，这两个代表性教会都采用现代电子产品，也以慕道友作为教会事工决策的目标，但他们的整个事工的决策核心依然是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核心，两位主任牧师都共同强调基督徒的生命改变才是教会最重要的见证。他们在决策形式上是适应了现代社会，但在福音真理上并没有妥协。我非常赞同魏尔斯的警惕性，他充分剖析后现代文化的迷惑性和渗透力，以及人的罪性，他告诫教会领导者在决策上必须站稳立场，不应该向世俗社会妥协是正确的。教会决策的使命是让人归回上帝的救恩中，这是责无旁贷的，任何教会的策划及其形式都不能取代或者淡化圣经的核心真理。但教会是否有必要在不违背真理为前提的策划和形式上去更充分的渗入社会文化的处境呢？我想福音并非可以纯粹的脱离文化形式，教会不可以让善与恶、正与邪、真理与异端混杂，但教会的纯正教义必然要透过充分的人性作为践行于时空下的群体氛围中，而教会的可实践的决策建制、文化表现形式，策略和技艺的呈现，不可能都是圣经性的无误和纯净，哪怕是教会信条也是对圣经的归纳及诠释而已。当然，教会紧扣圣经的主题，越多教导教义和真理，越少发挥各种教会决策的策略和方式，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少，但教会领导者以减少做出决策的决策是否有足够的活力来对抗教会架构的僵化和刻板呢？在真理的核心教义和圣经诠释中，所隐含的教会决策之充分开放性之激发也叫教会不得不朝向的奔放的活力，真理的内涵呼召决策形式的呈现，神性的宣教使命要求教会领导决策要向世界开放。

卡森在《认识新兴教会》的批判就审慎的多，他提出新兴教会的决策模式有诸多可欣赏之处，“新兴教会运动是一个关心福音事工的运动。而且，新兴教会所涉及的族群是其他教会未能接触到的，我们应该为圣灵在这次运动中所结出的真诚果子向神献上感恩。”[383] 卡森深入剖析新兴教会一方面提倡回归教会大传统但却不得要领的拼凑传统；另一方面对真理叙述的确定性没有把

[383]卡森，《认识新兴教会》，71。

握，从而没有勇气承认圣经本身文字及其叙述的确定性并折损圣经是唯一权威。[384] 他以《宽宏大量的正统》、《耶稣失落的信息》两本书为例，从书中的表述中进行有力的论证和批判，这是很有说服力和有效的论证说明，关于教会决策模式持守真道的劝勉：卡森说的很中肯："通往长大成熟之路，并不是摇摆钟摆的简化主义，而是尽我们所能地确定神的整个计划，包括在神学与实践中。"[385] 多元抑或单一，合一或排斥，正义或邪恶，在上帝的创造中富有多样性，生命体的活力所在也是其充分的施展空间，恰恰是这种多样化和自由活力及人性堕落后的迷失和放纵境遇，对善而恶的决策判断才变得如此艰难，地上的教会就是这种对抗邪恶的实践场。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及其宣教模式的实践，都是建基于真理核心的认知和把握，圣经真理的解读，也绝不能避免教会历史性传统的螺旋。因此，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生命决策工程，是一个复杂的时空群体的善恶角力执拗的过程。卡森提出正确的教会决策模式应该是：

> 充满教导（教义的、伦理的、历史的、灵性的），严格训练信徒，并公开而忠实地行使敬虔的惩戒；同时，在教会里的信徒知道如何与非信徒沟通，教会的公众聚会虽然可能满有教导和纪律，却在所做的所有事上是真实可信，对陌生人热情欢迎，而且将经文仔细应用在生活的所有方面，在探究当代议题时，既忠于圣经又能透视文化。[386]

华理克（Rick Warren）在《直奔标杆》中也提出"对于世俗的人，是接纳而不认可"，这是重要决策原则，信徒的生命被改变，从而取得人们的注意，就是教会最好、最伟大的广告。

无论是阅读魏尔斯的《勇守真道》，还是研究卡森的《认识新兴教会》，在两本书中都能看到对教会新兴决策模式的深刻的剖析和强烈的警告，以及不断重申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必要固守教义和真理性的正确性和原则性，但两本书并没有提供教会决策形态的活力建构。以华理克的马鞍峰教会为例，却在其教

[384] 卡森，《认识新兴教会》，199—206。
[385] 卡森，《认识新兴教会》，265。
[386] 卡森，《认识新兴教会》，215。

会决策模式中，分明看到有效的决策策略和方案，并从各方面的教牧实践中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华理克《直奔标竿》一书首先谈到教会的复兴不是靠人的聪明和努力，而是如同冲浪者借助风浪的能力，教会的决策建构及复兴是乘上圣灵的浪潮。[387] 华理克的教会决策模式的关键是在于确立异象和目标宣教。华理克非常强调教会决策必须确认目标，清楚的目标不仅定义要做什么，也定义不做什么。马鞍峰教会的五项目标是：赞美；宣教；成员；成熟；事工。教会决策建构成为目标导向的教会，有目标的新成员同化；有目标的节目；有目标的教育，就是小组、同工聘雇、组织、讲道、预算、行事历、评估都要围绕教会目标来实施。[388] 标杆教会往小区发展，认定传福音的对象，因教会的增长得越大，接触面就越远越广。在传福音和教会发展决策上，作者提出其遵照耶稣的教导，耶稣问人："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常以人的需要来开始。因此，让福音的对象决定教会的接触方式是最好的方案指导方针。 华理克强调爱的见证，他说："伟大的教会是建立在对神、对彼此以及对非信徒的爱。"因此，他提倡，教会要制造接纳的气氛；牧师必须慈爱；在慕道聚会有三个要素是不可缺的：（1）以爱与尊重对待慕道者，（2）聚会要能符合他们的需要，（3）以一种实际易懂的方式来分享福音。[389] 华理克建立一套同化新会员的计划，他强调教会能够提供人们在世界别的地方绝对得不到的利益，就是敬拜神并借着神的话语强化信心，并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在生活上。[390] 总的来说，华理克的教会牧养事工是竭力策划目标性的模式，富有感染力的敬拜，浅显易懂的福音真理教导，帮助信徒发现并建立恩赐，并且使用在服事别人上。华理克并非如批评者所认为的一味取悦于慕道友，他也批判教会成长的迷思是，如教会光

---

[387] 华理克（Rick Warren），《直奔标杆》，序言，http://book.edzx.com/Book/B1259N2883.aspx，2016 年 1 月 20 日。

[388] 华理克，《直奔标杆》，第二部 目标导向的教会，http://book.edzx.com/Html/Book/1/1259/22534.html，2016 年 1 月 20 日。

[389]华理克，《直奔标杆》，第四部 招聚群众，http://book.edzx.com/Html/Book/1/1259/22538.html，2016 年 1 月 20 日。

[390] 华理克，《直奔标杆》，第五部 建立教会，http://book.edzx.com/Html/Book/1/1259/22543.html，2016 年 1 月 20 日。

顾量而放弃了质，在真理的教导上打折扣，教会必须避免以组织、管理与营销来造成教会的增长，因教会不是企业。当然，华理克分明更强调教会的牧养和建构技巧，但也要留意神的能力乃借着人的技巧和努力而使教会增长。马鞍峰教会以福音对象的需求来指导传福音的方式的“慕道友”中心导向，我认为正是教会发展的可行性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淡化教会纯正深厚的教义传统，也不意味着教会必须采取肤浅的教导。华理克认为敬拜能成为见证，信徒一起敬拜是很具说服力的见证，慕道者的聚会规模越大，传福音的效果就越好。人在强大的环境中，可以在情感上被激动，这无可厚非的敬拜场景，但真正意义的说服力还是要长期的真理教导，这才能做到有根有基的效果。作者谈到技巧是“灵命”成长中“如何”的步骤。他提醒教会常避讳和忽略的牧养方法和技巧，尽管他从没有忽视真理和救恩的实质性，但这些方法和技巧在牧养上取得果效，诚然是不可或缺的。

我赞同作者所提倡的符合圣经的领导决策方案，教会的事工要有目标导向，事工要更加专注，教会模式要吸引人投入侍奉，并能够清楚评估的标准，教会树立清楚明朗的异象，透过圣经经文、记号、口号和故事，详尽清楚的传达异象和目标。今日教会决策模式有必要在事工和策划上，以异象及其激情洋溢的行动来见证教会的活力，整全的圣经基础和深厚的教义神学完全有必要与有效可行的策略方法结合起来。教会决策模式建构符合圣经且更全备、更多样化的形式必然激发信徒的活力，也充分克服人性的懒惰和推诿。

教会领导者决策对于慕道者需要的敏感，设计吸引慕道友的音乐和聚会。对于聚会策划及各种敬拜的音乐形式，圣经和教会传统并非有固化的标准，而是富有活力及其开放性。关于教会的布道聚会，华理克不采用走到台前的方式，也没有决志祷告，而是采用“灵命调查”调查方法：

> “你们知道，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与你们每个人有一次个人的谈话，谈关于你们的属灵生命。我很希望能一一邀请你们一起去喝个咖啡，吃块蛋糕，让你们谈谈你的生命里的事。可借，我们教会这么大，不可能这样做。所以，我

> 请你们帮我一个忙，参与一个个人的调查。我要你们把刚刚填过的欢迎卡翻过来，根据我所解释的写上 A，B，C 或 D。”，“如果你已经把你的生命委身给基督，请写下 A；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决定相信基督，请写下 B；如果你说：‘伟恩，我还没有做这样的决定，但是我正在考虑，我要你知道我正在考虑。请你写下 C；如果你觉得你不想要委身基督，我珍惜你的坦诚，请写下 D。”[391]

这是叫人耳目一新的教会领导者决策的布道方式。

从神性本体论的三一真神之奥秘关联，到教会论的本质和形式、福音与世界境遇的文化关联。基督救恩借着教会在基督徒生命的内在导引系统，对于人性的兴趣所向，人的欲求、满足与成就感，这些有关人性天然的本质性的探究和分辨，都应该成为教会决策之创建建制和宣教形式的支持。华理克的教会决策模式并非完美，更不是教会决策模式的标准，但其决策方式可以激励教会领导者更加有活力地倡导教会各种活动及其主题，因为教会领导者在宣讲基督救恩的纯正福音时，也不能忽视上帝对人性创造的天然实质功能。假如以为坚持真理而否定上帝创造人性中的天然因素，那就是愚昧；假如教会建构中过分的剔除社会文化中上帝创造的美善成分，如艺术和治理法则等，也限制了教会决策中面向人类的使命。属灵成长和建造与人天生的兴趣息息相关，吸引人进入教会，并最终令人接受耶稣基督，生命得以改变，用各种合适的、吸引人注意的崇拜形式和音乐，让人感受到关怀和爱，都是必要的。韩秋侯（Chulhoo Han）谈到福音永不改变，但福音在宣教决策和方式是变动的，他以韩国教会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为例，当时的军统政治转化为民主后，社会形态发生变化，教会决策也亟需在这种社会形态下转型，教会决策的模式建构就必须遵循“回想过去，总结经验，再做出行动”的方法来行动。[392] 教会决策范式的开放性正是信仰内涵的生命活力所在。

---

[391] 华理克，《直奔标杆》，第四部 招聚群众，16、向未加入教会者传讲信息 http://book.edzx.com/Html/Book/1/1259/22542.html，2016 年 1 月 20 日。

[392] 韩秋侯（Chulhoo Han），“韩国的宣教”，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2015 年 10 月 14 日。

第七章 结论

圣三一上帝就是决策的上帝，在圣灵和圣经启示的真理光照下，教会领导者在基督里回归生命的所是，人生决策不再是面对境遇之风险中，一场追逐名利及享乐的博弈，而是接纳上帝的神圣召唤，在世界境遇中负起使命。教会是上帝的儿女——世界境遇中的卑微领导者之生命团契；上帝国要藉着教会在世界中开展传扬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使命；这是上帝儿女之人生决策的中心。

詹姆斯（Jennifer James）指出，适应于多元化才是未来的领导必备的条件，因为未来必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393] 多元主义成为后现代文化的标签之一，这种文化思潮不断冲击着真理启示的原则性，但多元主义已经在普遍的社会形态中演变为“快餐文化”，电子时代带来娱乐、消费和交往通讯的极高便利化，如中国大陆的微信和微博随时随地的填满人们的生活，片段杂碎的稀奇文化产物泛滥成灾，大众吸收过多残缺的理念和残疾的知识。在如此杂乱无章的外部社会境遇的冲击下，教会内部且普遍被潜在和显明的“成功神学”所沾染，当然，坊间常有各种高举圣经和教义旗帜对其严加的批判；但这批判只能显出法利赛式的自我清高和教条主义而已，针对克服人性对幸福感和世界境遇的强烈习惯性依赖，光靠笔伐口诛毫无用处，而是需要教会领导者引领普遍信徒发见并经受源自上帝自身之神圣知识和情感的无比美善和活力。教会领导决策正是要重新认识生命的唯一源头——敬拜独一真神，对圣灵藉圣经启示的尊崇必然是领导决策的价值标准。

要在教会中截断当代社会的肤浅文化的污浊横流，以及根除自我中心的宗教消费主义心理，唯有让每位基督徒真正查验到上帝国的宏大和宝贵。“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393] Jennifer James, *Thinking in the Future Tense: Leadership Skill for a New Ag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6),214.

买这块地。”（太 13：44），“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太 13：45、46），基督耶稣多番阐明那深奥的宝贵天国的主题——记载的经文文本分明突出“宝贝”、“珠子”的极贵重价值，智慧买卖者“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倾其所有换取这宝贝。天国的典范乃智慧的决策者察觉到极为贵重的珍宝，就把现有的东西都卖了；用全部价值去换取拥有珍宝。基督徒的信仰决策就是领导者之魄力四射的重大“投资”决策，智慧和勇敢的自我舍弃，正是为了拥有世人看不到的“宝贝”，这乃人生决策的最高价值。福音书对有关天国投资决策的经文编排并非偶然，有关天国比喻的重复，显然指向价值的核心目标，强调智慧决策者发现宝藏时，他为了获得而甘愿做出放弃其他一切的决策。[394] 教会领导决策的要诀就是真正洞察到上帝国度的奇妙珍贵，为其倾心，甘愿放弃一切，这就是本论文倾向于教会领导决策的本体论研究之缘由，盼望更多教会牧者和神学生可以在上帝国的本体论之决策范式上有更多的拓展及文本呈现。

本论文之决策的根本理由是：上帝乃决策的上帝，在其圣三一本体的活泼动态的生命统一及共契的爱中，其决策富有唯一性的真理和关系性的爱；这启示赋予上帝形象的人性在归回真理唯一性和爱的教会生命团契以本质性的指导；上帝的决策本性及其启示是教会领导者的决策本然，而被拣选的人性也有其决策的活力所在；正是在耶稣基督之“神而人”的决策范式中生发对有罪生命的死而复活的建构；基督徒领导者从上帝所赐予的人生故事中开始描绘愿景、拥有异象、塑造品格，这都是其生命做出重要决策并建构正确的侍奉哲学的因素。

上帝所拣选的教会领导者因为神圣身份的转变并确定，其人性的决策本质就不再以短暂个体记忆的偏见去构建散乱无度的欲求前景、也不再以情感冲动或直觉判断去面对不确定境遇而做出赌注；而是在崇高的“生命之所是”的身

[394] Ulrich Luz, *Matthew: A Commentary*, ed. Helmut Koester, Hermeneia—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2001), 277–278.

份上完成崇高的“生命之所事”（福音使命）；生命之真正意义将会指向上帝所应许的终极完美。

上帝的引导之于人的决策是全方位的，从对人的内在心智之接触感化到外在境遇的萦绕，人常以为平凡生活中的日常感受似乎没有上帝的“声音”，人也常误解为上帝的引导仅来自于神秘因素的经验；或是聆听内在那细微的声音；或是强烈的意念或催逼感。其实，上帝对基督徒的决策引导更为纯全、广博和友爱；当儿女认识天父的所是，认识自我生命的所是、依归和所事，必然在随时随地中，无声无息中，聆听上帝的声音：

>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
>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
>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
> 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诗 19：1—4）

教会领导者的决策在于认识自我及自我的在世价值，而认识自我之本源必然在于认识圣三一的本性，任何决策的偏差都因为人的自我认识的偏差。“我到底是谁？”“我当作什么？”——惟有打开灵性的眼睛，望见创造生命的主的显现，一切生命中的疑难皆能解答了。从圣三一的广博创造上，人认识到万事万物都有知识和意义，而不必纠结于肤浅的得与失的感受；从基督的良善的拯救上，我认识到舍己的决策富有大能；从父的自我差遣和荣耀上，我认识到生命的秩序是一种灵动的美；从圣灵的“智慧和聪明”、“谋略和能力”、“知识和敬畏”上，教会领导者明白一切真理、生命恩赐、爱的团契，当圣三一的内在与经世藉圣经与创造启示于人心中，人必然开启了生命决策之朝圣。

决策的真理内涵是在圣经与圣徒相通中；“圣经”与教会教义神学是上帝与众圣徒互动的话语典范，圣经与历代圣徒的关键性生命决策诚然是当代教会领导者的关键性生命决策的写照。

无论如何，教会领导决策并非仅仅是教会牧者、或长执的权力，而是每一位上帝儿女至关重要的事情，基督徒的生命决策就是在教会中成为教会领导者的决策；而圣三一上帝就是决策的上帝，上帝的创造、拯救与终末的审判与更新都是在真理启示中显明其广大无比的决策。

本文探索教会的领导者在上帝引导下的决策，并非是应用于经济行为学的决策理论和投资决策理论。基督教领导者的决策并非一种经营估算或博弈技能；而是要寻问“我到底是谁？”（我之所是）、“我当作什么？”（我之所事）；也就是说：我为何存在？我存在的本质和终极目的是为什么？当我确信是永生上帝就是作美善决策的上帝，他创造我、拯救我，感动我成为他的儿女，教我承受他的产业，成为他国度——及其教会中的门徒；我的生命中惟有一个决策目标，就是决定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明白他的旨意，照他而行。论文的决策目标就是回归圣三一上帝、圣经与圣徒相通。

参考书目

英文书目：

Anderson, Ray Sherman. *The Soul of Ministry: Forming Leaders for God's People*. 1st ed.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7.

Anselm, St. *Basic Writings*. tran. S. N. Deane.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72.

Athanasius. *"Four Discourse against the Arians"*. trans. J. H. Newman & Robertson, *Nicen and Post-Nicene Father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7.

Augustinus, Aurelius. *The City of against the Pagan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 W. M. Green. Cambridg,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Augustine of Hippo. "Lectures or Tractates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in St. Augustin: *Homilies on the Gospel of John, Homilies on the First Epistle of John, Soliloquies*, ed. Philip Schaff, trans. John Gibb and James Innes, vol. 7, A Select Library of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First Series .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Company, 1888.

Babcock, L. G.. Loewenstein，Explaining bargaining impasse: The role of self-serving bias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1），1997.

Bailey, Randall C.. *Exodus*, The College Press NIV Commentary. Joplin, MO: College Press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Barth, Karl. *Church Dogmatics* I/2,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Part 2, trans, G. T. Thomson and Harold Knigh.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6.

Baxter, Richard. “A Treatise of self-Denial,” *in Practical Works*. Ligonier, PA: Soli Deo Gloria,1990.

Beker, J. C., *Paul the Apostle*.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0.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With Werkgroep Informatica, Vrije Universiteit Morphology; Bible. O.T. Hebrew. Werkgroep Informatica, Vrije Universiteit. Logos Bible Software, 2006, Ex 3:14.

Bockmuehl, Markus, *The 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 Black'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 London: Continuum, 1997.

Bolman, Lee G. and Deal, Terrence E., *Leading with Soul: An Uncommon Journey of Spiri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5.

Brown, Raymond E.,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XIII-XXI):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vol. 29A, Anchor Yale Bible.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Bruce, F. F., *The Book of the Act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8.

Calvin, John and Owen, John,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Paul the Apostle to the Romans*. Bellingham, WA: Logos Bible Software, 2010.

Calvin, John and Pringle, William.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vol. 2 . Bellingham, WA: Logos Bible Software, 2010.

Clinton, J. Robert. *The Making of a Leader: Recongnizing the Lessons and Stages of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olorado Springs: Navpress, 1988.

Cole, R. Alan. *Exodus: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vol. 2,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73.

Conzelmann, Hans. *Acts of the Apostles: A Commentary on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ed. Eldon Jay Epp and Christopher R. Matthews, trans. James Limburg, A. Thomas Kraabel, and Donald H. Juel, Hermeneia—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7.

Cover, Stephen R.. *Principle-Centered Leadership*. New York: Summit books,1991.

Cox , Victoria. *Translating Statistics to Make Decisions: A Guide for the Non-Statistician* . Salisbury: acid-free paper, 2017.

Cruikshank , Jeffery L. and Malcolm, Clark. Miller, Herman.. *Buildings and Beliefs*. Washington,D.C.: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s Press, 1994.

Davenport, Thomas H.. Make Better Decisions, *HBR's 10 Must Reads：On Making Smart Decisions.* 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3.

Dunn, James D. G.. *Romans 1–8*, vol. 38A,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 Dallas: Word, Incorporated, 1998.

Durham, John I.. *Exodus*, vol. 3,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Incorporated, 1998.

Fee, Gordon D.. *Paul'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Wm.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5.

Joseph A. Fitzmyer S.J.. *Romans: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vol. 33, Anchor Yale Bible.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Ford, Leighton. *Jesus: The Transforming Leader*.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1.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London:Tavistock,1972),227.

Foucault ,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1972.

Friesen, Gar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will of God*. Portland: Multnomah, 1980.

Fuhs, H. F.. "רָאָה," ed. G. Johannes Botterweck, Helmer Ringgren, and Heinz-Josef Fabry, trans. David E. Green,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Cambridge, U.K.: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Gladwell，M.. *Blink: 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 . New York: Little，Brown，2005.

Goodpaster, K. E.. *Ethical Frameworks for Managemen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 Services, 1983.

Gregory of Nazianzus. *On God and Christ: The Five Theological Orations and Two Letters to Cledonius orations*. Tran. Williams, F. & Wickham, L..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e，2002.

Gregory of Nyssa. "*An Address in Religious Instruction*"，trans. C. Richardson，in Edward Hardy ed. *Christology of the Later Father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54.

Gregory of Nyssa. *Gregory of Nyssa: The Life of Moses*, ed. Richard J. Payne, trans. Abraham J. Malherbe and Everett Ferguson, The Classics of Western Spirituality. New York;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1978.

Guthrie, Donald. *Hebrews: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vol. 15,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83.

Cornu, H. Le and Shulam, J.. *A Commentary on the Jewish Roots of Acts*. 2 vols. Jerusalem: Academon, 2003.

Hamilton, Victor P.. "167 אֶרֶץ," ed. R. Laird Harris, Gleason L. Archer Jr., and Waltke, Bruce K..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 Chicago: Moody Press, 1999.

Hammond, K. R. & Steward, T. R. Eds. *The essential Brunswik.*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Hauerwas, Stanley. *" Jesus: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in The Peaceable kingdom: A Primer in Christian Ethics*. Philadelphia: SCM, 1983.

Hennry, Carl F.H.. *Frontiers in Evangelical Theology*. Waco, Tex: Word, 1966.

Holloway, Paul A.. *Philippians: A Commentary*, ed. Adela Yarbro Collins, Hermeneia—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17.

Hybels, Bill. *"Finding Your Leadership Style: Ten Different Ways to Lead God's People ," Leadership*. winter 1998.

James, Jennifer. *Thinking in the Future Tense: Leadership Skill for a New Ag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Jones, Laura Beth. *Jesus CEO: Using Ancient Wisdom for Visionary Leadership*. New York: Hyperion, 1995.

Kahneman, Daniel.. A perspective on judgment and choice：Mapping bounded rationality，*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3.

Kahneman, Daniel..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Kahneman, Daniel.. Lovallo, Dan. Sibony, Olivier. Before You Make That Big Decision . . . ， *HBR's 10 Must Reads ：On Making Smart Decision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3.

Kahneman, D., Wakker , P. P., Sarin, R.. Back to Bentham？ Explorations of experienced util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Kise, Jane A. G. and Stark, David, *Life Directions*. Minneapolis: Bethany House, 1999.

Le Peau, Andrew T.. *Paths of Leadership: Guiding Others toward Growth in Christ through Serving, Followong, Teaching, Modeling, Envisioning*.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1983.

Lerner, J. S., D. A. Small, G. Loewenstein. Heart strings and purse strings：Carryover effects of emotions on economic transact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15（5），2004.

Lienhard, Joseph T. and Rombs, Ronnie J., eds.. *Exodus, Leviticus, Numbers, Deuteronomy,*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1.

Lull, Timothy F.. *"Underachievers Or Reformers Lutherans Exercsing Daily Life Leadership"*.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Traditions in Leadership, De Pree Leadership Cemter, Pasadena, Calif., June 1999.

Luz, Ulrich. *Matthew: A Commentary*, ed. Helmut Koester. Hermeneia—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2001.

Mankins, Michael C. and Steele, Richard. Stop Making Plans; Start Making Decisions. *HBR's 10 Must Reads：On Making Smart Decisions.* 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3.

Mankiw , N. G., Taylor，M. P., Ashwin，A.. *Business Economics*. Cengage Learning EMEA, 2013.

March, J. G., Simon, H. A.. Organizations. New York：Wiley，1958.

Martin, Francis and Smith, Evan eds.. *Acts,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Downers Grove, IL: Inter Varsity Press, 2006.

Martyn, J. Louis, *Galatians: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vol. 33A, Anchor Yale Bible.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Moltmann, J.. *God in creation : An ecological doctrine of creation*. Gifford lectures ; 1984-1985. London: SCM Press, 1985.

Moltmann, J..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 The doctrine of God*. London: SCM Press, 1981.

Moltmann, Jurgen. *The Crucified God* . Vendor: Fortress Press, 2015.

Moltmann, Jurgen. *Theology of Hope*. trans W. Leitsc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7.

Moo, Douglas J..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 ed. Ned B. Stonehouse et al.. Second Editi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Mouw, Richd J. *"Leadership and the Threeford Office of Chris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Traditions in Leadership.* De Pree Leadership Cemter, Pasadena, Calif., June 1999.

Nash, Lanra L.. *Believers in Business*.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94.

Nickerson, R. S.. Confirmation bias：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many guise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98.

Nisbett, R. E., Ross, L.. *Human inference：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 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 Hall，1980.

Nolland, John. *The Gospel of Matthew: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Carlisle: W. B. Eerdmans; Paternoster Press, 2005.

O'Keefe, Mark. *"The Benedictine Abbot: Creative Tension in Leadership"*. unpublished paper for the De Pree Leadership Center, Pasadena, Calif, 1999.

Piper, John. *Desiring God: Meditation of a Christian Hedonist,*3rd ed. Sisters, OR: Multnomah, 2003.

Propp, William H. C.. *Exodus 1–18: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vol. 2, Anchor Yale Bible.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Rahner, Karl.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Fa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dea of Christianity*. trans. William V. Dych. New York: Seabury, 1978.

Ringgren, Helmer. "אָח," ed. G. Johannes Botterweck. trans. John T. Willis,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Cambridge, U.K.: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Schwartz，Barry. *The Paradox of Choice: Why More is Less*. HarperCollins, 2005.

Sigmund, Freud. *Moses and Monotheism*. tran. Katherine Jon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39.

Moisés Silva, e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and Exegesis* .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4.

Skinner, B.F., E.g., *Walden two*.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Stogdill, Ralph M.. *Handbook of Leadership: A Survey of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e , 1974.

Swanson, James. *Dictionary of Biblical Languages with Semantic Domains : Hebrew (Old Testament).* Oak Harbor: Logos Research Systems, Inc., 1997.

Tenbrunsel, A. E., Messick, D. M.. Ethical fading: The role of self deception in unethical behavior.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7（2），2004.

Thaler, R.. From homo economicus to homo sapie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0. Thaler，R. , Unrestricted teaching files, faculty Web site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School of Business：http：//gsb.uchicago.edu/fac/richard.thaler/.

Torrance, T. F.. *Transformation and Convergence in the Frame of Knowledge*. Belfast，1984.

Torrance, T. F.. *Reality and Scientific Theology*. Edinburgh，1985.

Torrance, T. F.. *Thelogy Science*. Oxford，1969.

Tversky, A., Kahneman, D.. A vailability: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3.

Volf , Miroslav. *After Our Likeness: The Church as the Image of the Trinity* . Grand Rapids，ML: Eerdmans，1998.

Wenham, Gordon J.. Genesis 1–15, vol. 1,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Incorporated, 1998.

Will, Garry. *Certain Trumpets: The Call of Leade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Williams, Benjamin D. and Michael, Mckibben T.. *Oriented Leadership: Why All Christians Need It* . Wayne, N. J.: Orthodox Christian Publications Center, 1994.

Wragg, Jerry. *Exemplary Spiritual Leadership: Facing the Challenges, Escaping the Dangers*. Ministry Mission. Leominster: Day One, 2010.

Wright, Tom. *Acts for Everyone*, Part 1: Chapters 1-12.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2008.

Zizioulas, J. & Meyendorff, J.. *Being as communion : Studies in personhood and the church* . Contemporary Greek theologians. no. 4. 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85.

中文书目：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Alister E. McGrath），《基督教概论（第二版）》， 孙毅、马树林、 李洪昌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阿利斯特 • 麦格拉斯（Alister E. McGrath），《基督教神学导论（第 5 版）》, 赵城艺、石衡潭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艾力克森（ M. J. Erickson），《基督教神学 (增订本)卷二》,郭俊豪、李清义译, 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2000。

埃伦•兰格（Ellen J.Langer），《专念：积极心理学的力量》, 王佳艺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社会学》, 赵旭东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安妮・杜克(Annie Duke),《对赌：信息不足时如何做出高明决策》,李光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巴刻（J. I. Packer）,《活在圣灵中》, 陈霍玉莲译, 香港：宣道出版社， 2007.

巴刻（J. I. Packer）、凯奈斯（Carolyn Nystrom）,《保守我、引导我：在抉择中明白神的旨意》, 伊妙珍译, 香港：天道，2010.

巴里・施瓦茨 (Barry Schwartz),《选择的悖论》, 梁嘉歆、黄子威、彭珊怡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班克斯，莱德贝特（R. Banks, Bernice M. Ledbetter）,《领导学大检阅》, 吴丽恒译, 香港：天道书楼，2006.

保罗・休梅克（Paul J. H. Schoemaker）,《做最好的决策》, 王昭力译, 中信出版社，2013.

贝考维（ G. C. Berkouwer）,《罪》, 刘宗坤等译, 香港：道风书社，2006.

毕尔麦尔（Bihlmeyer）,《古代教会史》, 雷立柏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伯龙（J. Baron）,《思维与决策（第四版）》, 李纾、梁竹苑译, 北京：轻工业出版社, 2009.

伯特兰 • 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幸福之路》, 傅雷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柏文（Lawrence A. Pervin）,《人格科学》, 周榕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报社，2001.

博许（David J. Bosch ）,《更新变化的宣教》, 白陈毓华译, 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1996.

卡尔·斯佩茨勒（Carl Spetzler）， 汉娜·温特（Hannah Winter），珍妮弗·迈耶

（Jennifer Meyer）,《斯坦福商业决策课：如何做好一个决策》， 张源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

陈学明等编,《痛苦中的安乐——马尔库塞弗洛姆论消费主义》,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大卫•诺格尔（David K. Naugle）,《世界观的历史》, 胡自信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戴维 • 迈尔斯（David G. Myers）,《直觉：你所不知的潜力与危害》, 章崇会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大卫 • 亨德森 (David R. Henderson)， 查尔斯 • 胡珀 (Charles L. Hooper), 《决策的智慧》， 侯君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莱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宣教的上帝》, 李望远译, 台北：校园，2011.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主编,《选择、价值与决策》, 郑磊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编,《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 方文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但丁（Dante Alighieri）,《神曲》, 朱维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道格拉斯•哈伯德（Douglas W. Hubbard）,《数据化决策》, 邓洪涛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德席尔瓦（David A. deSilva）,《21 世纪基督教新约导论》, 纪荣智，李望远译, 台北：校园，2013.

狄拉德（Raymond B. Dillard）、朗文（Tremper Longman III）,《21 世纪旧约导论》, 刘良淑译, 台北：校园，1999.

格雷厄·阿利（Graham T. Allison）,《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古德恩（Wayne Grudem）,《系统神学》, 张麟至译, 香港：更新传道会出版，2011.

古伦（A. Grün）,《价值领导，勇敢决择：领导的素质决定企业的生命力与决策力》, 郑玉英, 台北：南与北文化，2012.

贵钩利，丢尼修等,《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东方教父选集》, 上海：基督教两会，2009.

韩国前线(Frontier)总干事李亨利（Henry lee）,“穆斯林宣教”, 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2015 年 10 月 15 日.

韩秋侯（Chulhoo Han）,“韩国的宣教”, 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2015 年 10 月 14 日.

亨利•克劳德（H. Cloud）,《收尾学 : 开启未来的决策力》, 何明珠译, 新北市：校园，2013.

华尔基（B. K. Waltke）,《寻求神的旨意：岂有此理（Finding the Will of God：A Pagan Notion？）》, 顾荣翔译, 香港：从心会社有限公司，2009.

华尔基（B. K. Waltke）， 俞明义,《华尔基旧约神学（上）》, 香港：天道，2013.

华理克（Rick Warren）,《标杆人生》, PD 翻译组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黄蔚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姜胜三教授（samuel）,“世界宣教的潮流与韩国宣教”, 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2015 年 10 月 19 日.

卡尔•巴特（Karl Barth）,《罗马书释义》, 魏育青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卡森（D. A. Carson）,《认识新兴教会》, 潘秋松译, 美国麦种传道会，2007.

卡斯培（Walter Kasper）,《现代语境中的上帝观念》, 罗选民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凯利·克拉克（Kelly James Clark）， 安妮·包腾格（Anne Poortenga）,《伦理观的故事：人性完善的探究》, 陈星宇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赖建国, “摩西五经中神的灵”，《圣灵古今论》, 许宏度主编, 台北：华神，1999.

莱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宣教的上帝》, 李望远译, 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11.

赖特（ N. T. Wright）,《新约与神的子民》, 左心泰译, 台北，校园，2013.

李大卫（J．L. David Lyle）,《圣书的子民》, 李毅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罗伯·柯林顿（J. Robert Clinton）,《圣经与圣经领导价值：圣经逐卷分析》, 佘亚弘译, 创欣神学院教牧学博士班阅读资料.

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基督教的兴起》(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黄剑波, 高民贵译 , 上海古籍, 2005.

罗伦·培登(Roland H.Bainton), 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 陆中石，古乐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

罗云·威廉斯（Rowan Williams）,《知识的伤痕：从新约到路德与十架约翰的灵修学史》, 邓元尉译, 台北：校园， 2015.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马丁路德文选》, 马丁路德翻译小组,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罗马书讲义》, 李春旺译, 新竹：中华信义神学院出版社，2006.

马浩。《管理决策：直面真实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马克斯·巴泽曼（Max H.Bazerman）,《管理决策中的判断（第六版）》, 杜伟宇，李同吉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梅列日科夫斯基, 《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 杨德友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9.

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 隗仁莲、苏资贵、宋炳延译, 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1999.

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当代的基督》, 曾念粤译, 台北：雅歌出版社，1998.

莫菲特（S. H. Moffett）,《亚洲基督教史（一）》, 中国神学研究院编译, 香港：文艺，2007.

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系统神学（卷一）》, 李秋零译, 香港：道风书社，2013.

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系统神学（卷二）》, 李秋零译, 香港：道风书社，2013.

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伦理学》, 胡其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普罗文（I. Provan）、朗（V. P. Long）、朗文（Tremper Longman III）,《圣经以色列史》, 刘智信, 刘林蕴琴, 黎静仪, 谭达峰译, 香港: 天道，2010.

雷德 • 海斯蒂 (Reid Hastie)，罗宾 • 道斯 (Robyn M. Dawes),《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 谢晓非、李纾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斯科特 • 普劳斯（Scott Plous）,《决策与判断》, 施俊琦，王星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悉尼·芬克斯坦（Sydney Finkelstein），乔·怀特海（Jo Whitehead），安德鲁·坎贝尔（Andrew Campbell），《避开错误决策的 4 个陷阱》, 景婧、郑赛芬译, 北京：后浪出版公司、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汤姆•拉思 (Tom rath)，巴里•康奇 (Barry conchie), 《现在,发现你的领导力优势》, 薛妍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托马斯 • 阿奎那（ Thomas Aquinas）,《神学大全 <第一集 论上帝>》, 段德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托马斯 • 萨蒂（Thomas L. Saaty）,《创造性思维：改变思维做决策》, 石勇、李兴森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臧仲伦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

魏尔斯（David Wells）,《勇守真道》, 陈知纲译, 台北：改革宗出版社，2010.

威廉•范甘迈伦（Willem A. VanGemeren）,《救赎进程：从创世到新耶路撒冷的救赎故事》, 吴剑秋译, 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8.

沃夫（M. Volf）,《拥抱神学 : 有关身分认同, 异己性与和解的神学探讨》, 王湘琪译, 台北: 校园，2007.

夏罗默・麦特尔（Shlomo Matial）,《决策——管理者决策的十大工具》, 杨介棒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杨牧谷,《狂飙后的微声》, 香港：明风出版社，2003.

杨庆球,《灵风起舞：圣灵教义与灵恩现象剖析》, 香港：宣道出版社，2009.

姚西伊博士, "当代宣教的议题", 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2015 年 10 月 23 日.

叶松茂, 《101 间香港教会经验分析》, 香港: 基道，2004.

伊恩・默里（Ian H. Murray）,《真正的复兴》(Revival & Revivalism), 张宇栋译,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

以禄 (Jacques Ellul),《存在的理由 : 从传道书看科技社会的虚空与盼望》, 孙芥石 & 郭秀娟译, 新北市: 校园，2017.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基督教要义（上）》, 孙毅、钱曜诚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约翰・麦克阿瑟（John F. MacArther）,《舌音运动的迷思》, 台湾：提比利亚出版社，2004.

约翰 • 麦克斯维尔（John C. Maxwell）,《领导力 21 法则》, 萧欣忠、林静仪译, 台北：基石文化公司，2000.

约翰 • 麦克斯维尔（John C. Maxwell），《中层领导力》, 施铁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约翰•麦奎利,《二十世纪宗教思潮》, 何菠莎，周天和译, 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1999.

约翰•麦奎利, 《基督教神学原理》, 何光沪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7.

詹姆斯 • 基特尔森（James Kittelson）,《改革家路德》, 李瑞萍，郑小梅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詹姆斯 • 马奇(James G. March),《决策是如何产生的》, 王元歌，章爱民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领导学》, 常健、孙海云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长老会神学院朴教授(Bokyoung Park),“韩国的宣教历史”, 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 2015 年 10 月 14 日.

钟马田（Martin Lloyd Jones）,《清教徒的脚踪》(Puritan Papers), 梁素雅，王国显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庄祖鲲博士,“韩国教会的借镜”, 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 2015 年 10 月 13 日.

庄祖鲲博士,“力挽狂澜的约翰卫斯理”, 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2015 年 10 月 13 日.

庄祖鲲博士。“卫斯理的社会关怀”,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 2015 年 10 月 22 日.

CHOE SANG-HUN，“在禁止宗教信仰的朝鲜，一所教会大学如何生存？” https://mp.weixin.qq.com/s/cAmkwGWp3yAYJIHTFWSx-w，2019.9.24.

崔亨根教授,“福音和文化：全教会、全备的福音、全世界”, 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教牧博士班」, 2015 年 10 月 16 日.

第五条“圣经的尊荣和权威由何而来”，《比利时信条》；http://shu.kyhs.net/files/article/fulltext/0/301.html#6535，2019.9.12.

华理克（Rick Warren）。《直奔标杆》, http://book.edzx.com/Book/B1259N2883.aspx，2016 年 1 月 20 日.

罗马天主教利欧第十三在他教皇任内第十六年，即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颁布一道论圣经的研究通谕，拉丁原文名为 Providentis Simus Deus，第三十九节“论圣经的研究通谕”；http://shu.kyhs.net/files/article/fulltext/0/301.html#6544，2019.9.12.

在东正教取得权威信条地位的《非拉热（Philaret,1782-1867）信条》，http://shu.kyhs.net/files/article/fulltext/0/301.html#6543，2019.9.12.

这份透镜模型图片引之网页：http://www.engineeringandmusic.de/individu/kirlalex/kialfig1.GIF，2019.08.30.

中国基督教官方网站的国庆网页专栏中各地教堂唱红歌庆祝场景，

http://www.ccctspm.org/special/30，2019.9.24.

庄祖鲲。《宣教历史》,

http://www.hrbenlu.com/book/book/cnBook1/bookfulltext.php-nid%3D742.htm，2016 年 1 月 20 日.

庄祖鲲。《宣教与文化》,

http://www.godoor.com/book/library/html/theology/xjywh/content.html，2016 年 1 月 20 日.